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庄福龄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

本卷作者

- 绪　论、第四章　　庄福龄
- 第一章、第五章　　杨瑞森
- 第二章　　李振霞
- 第三章　　吕希晨、孙琰

目　录

绪　论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一门科学　1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1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容　5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任务　8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11
　一、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初步形成　11
　二、在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13
　三、在中国革命高潮中多方面应用和展开　16
　四、在胜利形势下的曲折发展　19
　五、在历史的暂时倒退中经受严峻考验　20
　六、历史转折后的新发展　21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特点　23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23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的历史　29

三、集体智慧结晶的历史 32
四、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历史 35
●第四节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方法论 37
一、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思想体系，不拘泥于个别词句 38
二、紧密结合革命实践和党的活动，不面面俱到地作学理推究 39
三、重点研究特色和贡献的形成过程，不简单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 42
四、重点研究集体智慧和发展规律，不纠缠于历史细节和个人活动 44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第一节 中国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47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48
二、资产阶级"新学"及其局限性 5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62
一、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意义 63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67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75
四、"三次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扩大 79
●第三节 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产生 91
一、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 92
二、由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97
三、在斗争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03

第二章　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112
一、《讲堂录》中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及唯物论辩证法因素　112
二、给黎锦熙等人的信及文章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对某些问题的合理思考　119
●第二节　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二元论思想　124
一、“精神不灭，物质不灭”　125
二、知、信、行“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132
三、“生死是对立统一，是有机界的必然现象”　136
四、“观念造成文明”　139
●第三节　毛泽东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148
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49
二、毛泽东的世界观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52
三、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的积极实践　161
四、新民学会政治方向的转变和对唯物史观的肯定　163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党和大革命中的初步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173
一、党创立初期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及其特点　174
二、李大钊、陈独秀的《史学要论》、《马克思学说》等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介绍　179
三、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较系统的阐述　184

四、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述　19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　199
一、陈独秀、瞿秋白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双方的唯心论观点的批判　199
二、瞿秋白、恽代英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206
三、恽代英、肖楚女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21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初步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220
一、党的二大《宣言》对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纲领的科学分析　221
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　225
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发表　231

第四章　大革命失败后对形势和革命道路的分析

第一节　对革命形势、性质和特点的哲学分析　238
一、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238
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革命重点转向农村的必然性　242
三、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特点的分析　245
第二节　毛泽东等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对托陈取消主义的批判　251
一、托陈取消派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　251
二、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系统批判　254
三、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258
四、托陈取消派观点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受

到的批判 265
第三节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红色政权理论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270
一、土地革命战争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270
二、中国红色政权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 274
三、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及其伟大意义 279
第四节 游击战术的初步总结和军事辩证法的初步形成 285
一、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毛泽东、朱德等对其战术经验的初步总结 285
二、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在反“围剿”战争中的应用 288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在开创民主革命新局面中的历史作用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292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工作指导上面临的主要任务 293
二、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302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主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 309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316
一、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和实质 316
二、艾思奇、邓拓等人对张东荪、叶青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批判 321
三、唯物辩证法论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

地位 326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开创我国民主革命新局面中的历史作用 331
一、深入开展农村调查，制定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331
二、总结反"围剿"的历史经验，从军事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336
三、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复杂矛盾的变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343

绪 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又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而承担这一伟大的继承和创新任务的，既有对中国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又有同他并肩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同时代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点、作用和意义，无疑对于总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积极的、深远的意义。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一门科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有它特定的对象和内容，它是一门有高度理论性的历史科学。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是经过革命实践长期检验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从它的继承和发展来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看，或从它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来看，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不仅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内容，而且有它具体的人物、著作和文献，是一部不可随意纂改和歪曲的客观的历史。

这样一部历史，如果加上它形成前的酝酿、孕育过程，和这一思想主要代表人物身后的继续发展创新，可以说，它的历史基本上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一致的。在七十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实现第一次飞跃的前三十年，是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地分析中国国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密切结合的；同样，在建国后四十年所发生的第二次飞跃，也是同邓小平等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地分析中国国情，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密切结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历史，体现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艰苦探索并取得重大突破的历史。因此，这部历史不仅联系着中国人民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长期奋斗的历史，包含着极其广阔而深刻的现代史的内容，而且同中国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从哲学上为总结无数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论断。

对于这样一部内容丰富、寓意深刻而又意义重大的历史科学，应当从历史、理论、实践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的系统的研

究。

从历史方面看，这一科学应当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要研究从孕育到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和历史特点，考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要研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考察它在理论上和解决实际问题上已经达到的深度和水平，考察它形成后面临的继续发展的任务；要研究它从形成到日趋成熟的发展过程，考察它成熟的条件和标志，考察它成熟后所面临的任务；要研究它在革命实践中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在多方面展开的，考察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进程，考察它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中的历史作用；要研究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发展，分析它在新形势下仍然行之有效的成功的历史经验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考察出现历史曲折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考察历史转折后它所面临的新任务和出现的新发展；总之，既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发展中的历史连续性，又要研究它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阶段性；既要研究它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和发生的历史性飞跃，又要研究历史上的失误和出现的历史曲折；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全面的具体的历史分析，要把它放到现代中国七十年的历史环境中作考察研究。

从理论方面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历史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外，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它本身的历史上，而应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上对这一科学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说明。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基

础，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的基本理论和理论水平，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发展中可能吸收的国内外研究哲学的成果；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考察它在解决不同问题和进行各种斗争中如何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考察它在新的实践中是如何作出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的，分析它在历史上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各种情况与历史经验；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应用和各个领域的展开，考察它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它所创造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各种不同的形式；总之，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和贡献，不研究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在哲学上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理论发展，就不能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

从实践方面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是在认识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发展道路方面不断深化，日趋正确的历史。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不应脱离中国的具体实践，要研究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进程，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演变的历史和现状，要研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物质生活，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的精神生活，要研究中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要研究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等等。总之，要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国情，对比它和其他国家的异同，分析它的特殊性，从而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得以传播、发展，并进一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也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结合。可见，深知中国国情，时刻保持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才是毛泽

东哲学思想强大生命力之所在。而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或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之所以总是相形见绌，其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因此，不了解中国情况，不研究中国实际，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历史。

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这门科学是集历史、理论和实践于一身的，是把三者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一科学时所必须注意的。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同许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又以自己特有的内容同有关学科相区别。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实际，为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道路而不断发展的历史，这一科学是以其特有的人物、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特殊的任务而构成其基本内容的。

这一科学所研究的特有的人物，主要指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一批革命家和理论家，指毛泽东逝世后继续坚持和发展这一科学思想的邓小平等。这当然不是把其他人物的研究一概排斥在外，而是要侧重研究他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研究他们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不同的作用，这一科学所确立的特定的时间，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而特定的空间，主要指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当然不排斥

在时间上作必要的上溯，在空间上适当地跨越国界。但那只是为了追本溯源，不割断历史，研究事物的联系和影响，而避免作孤立的考察，不及其余。这一科学所研究的特殊的任务，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运用于中国实际，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这当然不是把一切学术上理论上的研究都予以排斥，而是把这些研究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使其有助于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的任务。总之，只有把握这一科学的基本内容，才能分清主次，根据它的特点去进行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同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有密切的关系。从时间上，从革命运动的重大实践上，从必须涉及的历史人物、历史著作、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上，都有其共同的方面，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前者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科学，不象后者那样着重研究历史事件的推移和变化，研究历史运动的联系和规律，而是结合历史事件和具体实践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大作用。包括超越历史事件之前的预测和先导，也包括历史事件发生之后的沉思和总结，它不脱离历史实践，但又不停留在实践本身，而是透过实践去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哲学上进行分析和概括，给人们观察和解决问题以科学的思想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它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内容的哲学史科学。

如上所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当然也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都是以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哲学史为内容的，它们在现代中国众多的哲学思潮中都是以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为特征的。但是，两者又以自己的特点而互相区别。前者是在充分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基础上论述其他哲学思潮的，对于那些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关系较多者则

适当展开，对于曾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对立面进行过较量者则针锋相对地给以评述，对于那些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关系较少者则可略而不述。总之，这一学科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为主体，其他哲学思想概以是否有助于突出和说明这一主体而定取舍和详略。但后者则不同，它对中国现代哲学舞台上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都应作出恰当的评述，评述要注意各派自身的体系和特点，而毋须以某一观点是否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过较量来决定取舍；同时，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自然应当如实地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但也无须象前者那样用大部分精力去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部分，自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有极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且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也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主导线索的历史表现出来的，因此，离开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就不可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会使这种研究陷入抽象空谈的危险。但是，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并非完全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除了和时代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外，还会反映在众多的领域和方面，诸如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方法论的讨论，社会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哲学思想的论战，学术问题的争论，基本理论的讨论，等等。这些不可能要求处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有所反映，有所研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却应对上述诸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既要突出反映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的革命运动，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展开，也要反映汇成江海的涓涓细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方面的传播

和发展。两者对于如实地反映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姿多彩、奔腾向前的历史画面，都是完全必要的。

综上所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一方面要借助有关学科已有的成果和基础来充实和丰富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在自身所固有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做深入的开掘和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使它能科学地说明过去，清醒地分析未来，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任务

中国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国家。我们的坚持是以自己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为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它的科学性，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为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从历史的联系中、从形成和发展中去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地阐明这一思想的历史和现状、过去和当前之间的内在联系，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这门科学特有的任务。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作为历史科学，应当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尊重历史就要把一切思想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和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它的成熟和在多方面的运用与展开，它的每一次胜利与成功，它在曲折中的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许多重要著作和哲学思想，既要科学地分析它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要分析其中包含的

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意义；对于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哲学思想，既要分析其积极的有探索意义的思想，也要分析其违背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的论断，既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作出深刻的历史分析，也要对它的曲折发展作出深刻的历史分析，更要对它在历史转折后的创新和发展作出深刻的历史分析。尊重历史同时也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深刻的历史分析应当同科学地分析历史的主体和各种主观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总之，仅仅抓住毛泽东晚年失误的一个历史片断，否认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它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错误态度；而对毛泽东的言论和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顾历史条件地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晚年的失误，这同样也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错误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用错误的主观主义分析，来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从而取消了研究哲学史必须坚持的严格的历史性。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作为寓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现代史之中的理论性、现实性极强的科学，应当具体地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的联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之间的联系，科学地阐明它在当前和今后所具有的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本身不仅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阐明过的许多基本理论，而且包含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的许多新的内容，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要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结合起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要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用比较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发展和贡献作出科学的说明。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践中

的运用和发展，它既切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又有从实践中概括而成的理论结论和科学方法，对当前和今后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要终始不脱离中国的实践，认真研究中国的实践，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过去和当前、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不割断历史，保持历史的连续性。

科学地揭示历史的连续性，就要把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揭示出来，使人们从了解过去中有助于了解当前，从认识事物的重复性、普遍性中有助于把握事物的现状和未来，收到“鉴往而知今”的效果。了解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由来和发展，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它在今后的意义和发展趋向，而且可以从中学习到分析和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的历史科学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科学地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需要依靠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哲学诚然是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但是实际生活中的重大争论和是非，又往往是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或围绕某个哲学理论的斗争联系着的，归根到底又是同哲学上的世界观和认识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纠缠于枝节之论，往往解决不了问题，而抓住了世界观和思想认识路线问题，似乎“舍近而求远”，倒反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反对教条主义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都是从哲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范例。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也是一部在生动的历史实践中发挥哲学理论的威力，显示哲学能动作用的历史。也可以说，这是

一门具有极强的理论性的科学。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以后，它自身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进程。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挫折的考验中不断丰富和提高，日趋成熟，继续发展。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自觉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

一 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初步形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传播的，它的进一步传播和在较大范围的影响则是在同中国革命实践逐步结合的情况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成为考察中国国情和国家命运的工具，就会受到广大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重视，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同探索中国社会改造的途径结合起来，遂使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较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唯物史观的论文陆续问世，如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而且表现在围绕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所进行的理论上的争论也相继展开，其中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

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等。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朝着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继承了前辈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良传统，感受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明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赞成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并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随后，他一方面注视和研究着党内外各种思想分歧，另一方面又不断深入工农民众，进行调查研究，为继续探索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不懈地努力着。在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等等，认识上是很不一致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敢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从而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党内另一种错误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看不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也犯了忘记农民这个根本性的错误。毛泽东为反对上述错误倾向而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成果。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刚刚诞生后的一些年代里尚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都缺少正确的分析和认识，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而当时处在指导地位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也采取了同样错误的方针，主张放弃共产党对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

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便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一紧迫的问题又一次要求革命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和果断的抉择。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强调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清醒过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道路有重要意义。随后，毛泽东又以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农村根据地的革命行动实践了上述思想，并从理论上提出中国迫切需要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方式来实现。毛泽东正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发展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在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这是我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第一次飞跃，在这次飞跃中，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也正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在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而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认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在这里初步论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方面奠定了基础。

二 在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形成以后，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及其向抗日战争过渡的时期。其间，红军在军事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历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和重新组合，着重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人士在思想文化上也经历了“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革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特别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凡此种种，不仅表明党、红军和人民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规律有了更加符合实际的了解，而且表明中国革命正在出现一个转危为安、全国抗日、重新走向高涨的新局面。而在打开新局面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围绕着频繁而激烈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坚持从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研究战争，揭示战争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而且坚持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既切合实际，又高度灵活的战略战术，创造性地把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革命战争，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于革命军队，同样也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结合本身情况，加强建设的问题。既要看到它是在分散割据的农村根据地进行战争的，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又要看到革命军队高度统一的必要性，需要有严格的纪律和统一的建军宗旨；既要看到这支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组成的，客观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要看到这支军队所必需具有的无产阶级性质，只能统一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

上。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思想，是对过去革命战争的理论总结，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新的战争和进一步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围绕着“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紧紧把握住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这一基本变化，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的新变化，具体分析了随之而产生的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变化，精辟地阐明了分析矛盾、利用矛盾的策略思想，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理论上作了论证。在这里，毛泽东在历史转折时期以他驾驭辩证法和运用辩证法的创造才能，又一次把他先前提出的思想路线作了进一步发展，从斗争中粉碎了关门主义策略，通过统一战线这一历史车轮把中国革命引向一个有千百万群众和广泛的社会阶级、阶层参加的无比广阔的天地，使中国共产党担起了挽救民族危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重任，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崭新的局面。

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必然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要求在政治生活上作相应的变化，革命者应当善于全面地、具体地把握实际生活的复杂性，不失时机地捕捉历史发展中的特殊环节，推动历史前进。毛泽东以列宁为榜样，在上述历史过渡中，提出变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又及时地分析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的中心环节，把历史推向新的更高的目标。如果说，毛泽东关于揭示矛盾、分析矛盾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革命实践各个领域的具体运用，那末，把握历史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历史中的本质和现象，从发展中揭示历史的辩证法，则是从整体上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和发展。

围绕着党内频繁而激烈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刻

揭示了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分歧，都是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而来。从哲学上看，凡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结果，都是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结果；而错误的思想认识路线则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或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是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结果。毛泽东根据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深知不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就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因此，结合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开展一场哲学上的斗争和哲学基本理论的教育，对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胜利完成长征、革命形势较为稳定的情况下，集中力量研究哲学，从哲学高度去总结历史经验，系统阐发认识论和辩证法各方面的问题，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有极深远的意义。

作为上述研究成果集中表现的《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两论对中国革命经验从哲学上作出的概括和总结，两论在中国革命两条路线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捍卫和发展，两论从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论证和阐发，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发展中日趋成熟和系统化。

三　在中国革命高潮中多方面应用和展开

从抗日战争开始，历经解放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然是历史的巨大飞跃。革命力量不仅要战胜称霸世界的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而且要战胜由帝国主义支持和武装的国内盘根错节的反动统治，要把反动统治长期经营的大中城市解放过来建立人民的政权，要发动和团结亿万群众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奋斗。而完成如此等等的艰巨任务只用了十二年时间，其速度之快，发展之健康，成就之巨大，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上述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建国后的头七年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其成就也是极其巨大的。

综上所说，建国前的十二年和建国后的七年，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革命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始终是在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发展的。伟大的胜利当然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但也不能低估领袖们及其正确思想的重要作用。作为全党公认的指导思想、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活的灵魂，在恰当地分析国情，及时地掌握变化，科学地制定决策，正确地解决矛盾方面，树立了在实际工作中多方面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光辉典范。

其一，统一战线是作为推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并推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历史车轮把握的，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而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不仅具体地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出发，而且辩证地处理各种矛盾，达到革命的目的。

其二，武装斗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反动统治未推翻前是长期不变的，但是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又要求及时地实行战略转变，实行机动灵活的战

略战术。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思想，都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表现。

其三，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关系到能否夺取和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来武装党，从思想上建设党，并且把这一要求具体化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志。他通过整风形式统一党内思想，夺取革命胜利；他在胜利形势下提出执政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不同时期建党思想的继续发展。

其四，毛泽东在正确分析国情、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提出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指导着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实践，而且指导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其五，随着实践中应用辩证唯物论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从哲学上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总结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一般原则，不仅具备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也是革命事业日益发展与扩大的迫切需要。这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其六，革命高潮的不断发展把国家问题提上了日程，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总结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家学说，既要结合中国国情从理论上阐

明国家政权的实质和特点，又要针对有关思潮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为建国扫除思想障碍。从毛泽东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思想，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不仅反映了中国革命大踏步前进的足迹，而且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的胜利。

其七，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论从理论上实践上看都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毛泽东在继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深入研究新时期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总路线，制定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而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根本任务的变化，从总体上看都是适时的、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四　在胜利形势下的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固然可以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也可能成为严重的包袱使领导人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丧失对客观规律的虚心求索精神，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严重失误。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许多互相矛盾的估计和决策中曲折发展的。

一方面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而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他混淆了两类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一方面他要求在国家生活中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政治局面，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发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严重地损害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一方面他提出向自然界开战，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

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而另一方面又重提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并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一方面他要求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阶段，而另一方面他又轻率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如此等等。

十年来的历史就是在上述矛盾中，在成就和失误的交替中发展的，由于失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失误又往往被随之而来的纠偏所纠正，而纠正又往往是不彻底的。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既不象前一时期那样顺利地发展，唯心主义也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那样猖獗横行，正确思想是在错误思想的干扰中前进的，成就是在摇摆和曲折中取得的，成就远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那样巨大。

五　在历史的暂时倒退中经受严峻考验

所谓“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严重的内乱和倒退。作为这场严重灾难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他在指挥这场所谓“革命”的全局上，完全背离了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集体智慧——毛泽东思想，背离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

首先，他主观主义地估计了我国阶级形势和政治状况，不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主观臆测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作出了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结论。

其次，他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特定

的含义，错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内根本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发动全国规模的打倒“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其结果只能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制造了混乱，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

再次，由于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也日益严重。一方面，他的思想不能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不能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仍然习惯于沿用旧观点、旧方法和旧经验；另一方面他又脱离现实生活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为其“左”倾观点寻找“理论根据”，甚至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斗争。总之，他的错误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既包含着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也包含着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恰恰证明背离久经考验的毛泽东思想及其活的灵魂，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和灾难，即使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背离也不能例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灾难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表明这一科学思想是违背不得的，我们的民族要重新走上振兴之路，还是要依靠这一思想的恢复、坚持和发展。

六　历史转折后的新发展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开始了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标志着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转折后的十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重新得到恢复、发展和进一步创新的十年。其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伟大转折首先是从一场全国范围的哲学讨论开始的。讨论以批评窒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为一方，以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实践标准的科学观点为另一方，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逐步深入和展开。通过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进一步树立了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为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着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着重解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复杂的历史事变和评价历史人物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也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

坚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进行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改革工作，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有力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健全有深远的意义。

坚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还要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即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既要看到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又要看到经济文化的落后，既不能照搬书本的条文，又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只能走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党中央在上

述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最大成果，是继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的又一个理论上的重大发展。

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既要努力建设民主和法制，以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又要努力建设精神文明，以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探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到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揭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表明发展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社会主义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十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新恢复和发展，最根本的是依靠实事求是这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把它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并且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特点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特点，离不开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又必须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之中作历史分析。

一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看，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

---

①《邓小平文选》第64、133页。

主义哲学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后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体系、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就努力从理论上确立一个科学的历史观和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又把它们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使它们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到了晚年，他们又系统地总结了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成果，详细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半个世纪的努力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善的程度。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一百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和深刻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却在实践的考验下日益表现出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未能亲眼看到今天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许多重大突破，但是他们所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仍然是今天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发现自然现象的客观规律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也未曾面临过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但是他们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和科学预见，仍然是照耀着人类前进的灯塔。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继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而是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和发展也正在这里，离开了这一点去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

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没有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自己的特色。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自

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研究哲学的，虽然沉重的事务和频繁的斗争占去了他们不少时间，但是，他们毕竟还有较多时间在自己的书房里和图书馆里从事理论著述和科学研究。列宁是在沙皇残暴统治的条件下承担着革命任务的，国内从事理论研究的条件是极为艰难的，但是他毕竟有十年之久的流亡国外的生活，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自由，用来从事理论研究，撰写哲学著作。毛泽东则有所不同，他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在长期的残酷的革命战争和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在共产党部分地掌握政权和军队的条件下研究哲学的，或者说，他对哲学的研究是在一个极端闭塞、研究条件极差、研究时间和研究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然不可能对哲学的各个方面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更不可能撰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象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列宁撰写《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那样，而只能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从实践的需要出发，着重研究某一方面的哲学理论。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总是作为一定阶段主要任务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来的，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任务就有军事辩证法的思想；突出了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有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思想；突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就有关于实践、关于矛盾的哲学思想；突出了如何看待形势和任务问题，就有矛盾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思想，就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等等。超越时代的条件和历史的任务，去要求毛泽东哲学思想，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研究哲学的，他们可以较大胆地发

表意见，参与论战，即使在理论上产生了某些失误，例如对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的估计，对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形势的分析那样，也还不至于形成特别重大的影响和危害。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即使在民主革命尚未胜利、全国革命政权尚未建立之前，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且在日益巩固和发展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建立了革命政权的指导思想，它所处的这种特殊地位，即使发生理论上哲学上一点点失误，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因此，它更多地需要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严肃、谨慎。而且，象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长期地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中磨炼，在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磨炼，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磨炼，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很少经历过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把握时代的矛盾，推动时代的前进，而不是去仔细研究矛盾理论的每一个具体观点；主要是制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路线，而不是去具体研究认识论的每一个具体原理；主要是提出解决时代矛盾的方案，而不是去深入探讨唯物辩证法的每一个具体范畴；主要是研究时代的哲学，让哲学走向广阔世界，为千百万群众所掌握，在实际斗争中开花结果，而不是在课堂里或书本上作讲授或著述；等等。因此，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应当从革命家和战略家的身份提出要求，而不是单纯地从教授和学者的身份提出要求。

就中国革命的历史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逐步形成的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相比，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的历史作用。

从历史条件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

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俄国，而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的落后的中国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列宁在1919年论中国革命时曾经把它看作是一个困难的、特殊的和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这里主要的群众是农民，要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任务，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就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独创和增添新内容的一面。为了认识本国的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矛盾，就需要在哲学上着重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问题，因而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成为突出的哲学问题；为了寻找本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确定解决特殊矛盾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经验，研究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要求，因而群众路线问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建党建军建国中的哲学思想就成了突出的哲学问题。所有这些突出的问题，既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中增添的新内容，也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完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从哲学思想的斗争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学习和独创结合起来，把一般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路线办事，时时处处同那种背诵一般原理或照搬外国经验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党内的实际情况恰恰是，二十年代后

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照搬苏联和欧洲革命的模式，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以马克思主义和最革命的词句为外衣，以势压人，指挥一切，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这种教条主义气势之凶，形式之"左"，危害之烈，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空前的、罕见的，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等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所不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敢于顶住一切压力，破除一切迷信，不信神，不怕鬼，只相信科学，而又善于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情况。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地在一般原理和具体情况的结合上下功夫，在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上下功夫。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党内机会主义思想长期的、激烈的、反复的斗争中，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是以严重的代价和考验换来的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历史影响和历史作用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仅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它同群众血肉般的联系，休戚与共的命运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它已经渗透到亿万群众和干部的思想里和行动中。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问世后，只有毛泽东哲学思想才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力量。任何背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言论和行动、想法和做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都是通不过，行不通的，甚至毛泽东本人违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会逐步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疑问、思虑、抵制和反对。十年内乱的历史，是毛泽东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亿万群众逐

步抵制和结束这场内乱的历史。现实生活证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深深地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千百万群众所掌握，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永远不可逆转的根本保证。即使毛泽东本人自认为坚持马列而实质上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法和批示，以及毛泽东身后一度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方针，都不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改变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历史航程，动摇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信念。"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虽然持续了十年之久，然而它却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所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之所以没有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所以能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又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证明了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违反了毛泽东思想都将受到历史的谴责。真理必须坚持，错误必须纠正。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要求。历史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永远不会抹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功绩。历史也绝不会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领袖文过饰非。我们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科学地分析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重演。

二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的历史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只有真正懂得这一精髓，才能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全部历史，才能理

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特点。

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的准则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对它作出辩证唯物主义解释。他把“实事”解释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把“求是”解释为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把“实事求是”解释为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性即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响导。这一解释深刻体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旗帜鲜明地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路线对立起来。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他在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结合丰富的战争实践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认识的主体，其他一切客观实际的东西都是学习和认识的对象。随后，他又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重要区别归结为对待实践的不同态度，全面深刻地阐明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全党贯彻尊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又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路线的分歧，剖析了实际工作中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进一步在思想作风上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全党的思想路线，已经从理论上对它的基本点作了透彻而完整的说明。这就是从实践开始，即从实际出发，

经过实践和认识不断地循环往复，包括通过不断地调查研究，逐步掌握客观事物固有的规律性，并根据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又回到实践中去，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里，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又是认识的目的；客观事物是认识的对象，也是调查研究的对象；实践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人们的认识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也是《实践论》基本观点的深化和发展。

随着这条思想路线在理论上的完善化和实践中的深入贯彻，必将使辩证唯物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多方面的运用和展开，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进程是最好的见证，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解放战争又将胜利在望的时刻，他又一次结合新的历史经验重申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①

牢记这一历史教训，不仅使我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全国的政权；而且比较顺利地处理了建国后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了生产力，巩固和发展了已经取得的胜利。而胜利冲昏头脑，忘记了这一历史教训，则产生了十年曲折、两年徘徊的局面，尽管历史的曲折和徘徊，其情况各不相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在思想上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路线则是一致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沉痛的历史教训说明，实际工作中的失误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失误可以归结为思想路线上的失误，也是实际工作中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背离；而对长期失误必须进行的拨乱反正尽管千头万绪，但首要的却是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也正在这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我国历史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兴旺的最好时期开辟了道路。

综观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从它的孕育、形成，到它的展开和发展，而后经历曲折又重新得到顺利发展，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所经历的战斗。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的历史。

三　集体智慧结晶的历史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党的代表、领导集体的代表进行活动的。毛泽东思想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思想，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集体智慧既包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智慧，也包括党的领导集体中的许多卓越领导人的智慧，而群众的智慧往往是由能反映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领袖、特别是领袖的主要代表从理论上加以升华、概括、提高之后提出的。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既主要地表现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的哲学思想中，也表现在其他领导人、哲学家的有关思想和著作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

不能只局限于他本人的著作；而研究他本人的著作也不能把它同党的集体经验、集体智慧割裂开来，同同时代的许多革命家、哲学家的智慧和贡献割裂开来。

早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以前，它的孕育过程就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发展的。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在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的，而他随后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民众的大联合"、走"俄式"革命的道路，"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等思想，也都是同当时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在思想上发生共鸣的。他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在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对戴季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在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和发动农民运动、实行土地革命的思想，是和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的思想相配合和补充的。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不断深入，日益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要求，这就是实际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必需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初步论述和提出，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初步论述和提出，正是在上述要求下应运而生的。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孕育和产生。

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后的应用、展开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实践，离不开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国的革

命事业不是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大批革命者和亿万群众的事业，只有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根本上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人，才能代表群众、领导群众，成为群众的领袖和忠实的代言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什么“先哲”的思想和“天才”的创造，而是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例如，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无数次战争经验的升华，是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个方面军武装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是许多杰出的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集中和概括。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吸收了朱德等在井冈山时期的战术思想概括而成的，人民战争的战略原则是集中了解放区各个战场、各次战役的经验形成的，如此等等；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一部分的统一战线的辩证法思想，不仅包含着毛泽东本人对各种阶级关系的辩证分析，而且包含着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提出的许多政策思想和策略方针，如果离开了后者关于白区工作和统一战线的论述，那就不可能完整地、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特定的内容；同样，关于整顿思想作风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论述，不仅包含着毛泽东本人许多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思想，而且包含着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亲身体会，只有全面地把握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才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较充分的论证和较完整的说明；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那更是汇集了民主革命中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和研究的成果，诸如关于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关于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思想等等，都分别凝聚着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的心血和智慧，而毛泽东所创

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则是从理论上总其成，使之系统化和完整化，是对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科学总结。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他一个人的创造，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还说《毛选》不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同样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同时代许多革命家、哲学家、党和人民智慧的产物。

四　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历史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实践性，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学习和掌握哲学的目的在于应用，坚持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既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性的一种检验，又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发展的一种推动。纵观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从来是一部在实践中坚持按唯物论和辩证法办事，坚持在一切实际工作和革命活动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对革命事业不断开拓前进，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历史。

早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初期，革命还主要在较狭窄的山沟和偏僻的农村活动时，毛泽东就坚持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针对当时党内的思想倾向，提出开展科学的调查活动和贯彻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用前者去正确地了解中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用后者反对那种实际存在的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的错误思想，反对保守路线，而这一切正具体地反映了辩证唯物论有所总结、有所创造的积极进取精神，发挥了哲学在艰苦斗争和变

革现状中的巨大作用。

当中国掀起全民抗战高潮，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以后，毛泽东又及时地把辩证唯物论运用到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方面，从而出现了一个多方面展开和发展的情景。他针对中国革命面临着国际国内、敌友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务以及历史和现状等各方面的复杂情况，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针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别国革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态度，提出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一系列富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强调学风的重要性，鉴别学习优劣的标准在于能否应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创造了整风运动这一独特的形式，用以改造全党的学习，端正全党的思想作风；他针对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哲学上概括了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两个最一般的原则，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需要因事制宜、千变万化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高度，使其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为在一切工作中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还针对革命向着全国胜利迅猛发展的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一系列战略转移的思想，诸如在作战方法上从游击战、运动战向阵地战、大兵团作战的转移，在工作重点上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新形势下学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生产，学会各种新的斗争，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等等，在工作中树立了根据辩证唯物论把集中和分散、重点和一般、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典范。

毛泽东哲学思想一贯坚持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为基础的。毛泽

东认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也可以说，在革命实践中制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和指导方针，为实现革命目的而提出的正确的工作任务，都是从方法论上对开拓革命事业的经验总结。而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撰写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系列著作，则是党的科学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的集中反映。

坚持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对于革命事业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开拓作用，还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是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经验的总结，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应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哲学应当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的一切哲学著作都是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而写的，以他们为对象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就是以它紧密结合革命实践的鲜明的内容和富有中国气派的生动的表达形式，逐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形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历史。严格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践性、群众性相结合，恰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开拓创新的历史作用的关键所在。

第四节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方法论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要从它自身的特点出发，坚

持科学的方法论。

一　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思想体系，不拘泥于个别词句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已经形成了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们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根据。但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如果任意地加以割裂，抽取其中的某个片断，把它绝对化，那就会走向反面，把真理变成谬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两个凡是”的主张，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在新形势下把林彪、“四人帮”鼓吹的“句句是真理”的谬论继续下来，极大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显然，“两个凡是”的论调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杰出的领袖和伟人，都是人而不是神，都不可能不犯错误。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后来他又不止一次地说过，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并且说，他自已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

“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可见，“凡是”的论调，是神化个人、个人迷信的产物，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

“两个凡是”的论调也完全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把毛泽东的个别词句和论断同有关的上下文和整个思想体系割裂开来，这不是尊重而是歪曲毛泽东思想，是把一定范围、一定时间、一定条件对某个问题讲的话作超历史的、绝对的、抽象的理解，犯了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化、僵化的错误。这种论调也混淆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他本人晚年的错误，想原封不动地把后者坚持下来，从根本上违反了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是从本本出发，把本本上的一切作为办事的根据和不可移易的准则，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而不去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解决新任务，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可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切忌脱离它的思想体系，脱离历史条件，断章取义，随意曲解，而必须从历史发展中从整体上去理解它的思想，做到完整而不割裂，准确而不武断。

二 紧密结合革命实践和党的活动，不面面俱到地作学理推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来不是作为单纯的学术思想而存在和发展的，它一开始就反映出鲜明的政治哲学的特点，以观察和改造中国为己任。它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社会，而不是自然；主要是各种阶级关系和人民内部关系，而不是自然界的各种关系；主要是有关社会革命的问题、方法和规律，而不是其他方面的问

题和规律，等等。因此，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活动，就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能正确理解它的全部历史的本来面貌。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经验的哲学总结，自然要涉及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有最广阔的视野和最丰富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每一种具体形式都要承担哲学所具有的全面的任务。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具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面临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历史命运，会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任务。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逐步孕育而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承担着“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中国国情和解决中国出路方面的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自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上，放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上，放在围绕革命任务如何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斗争上，放在为更好地实现革命任务如何确立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能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革命活动特别是政治、军事活动为主要研究领域，以中国革命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为主要研究目的，而不应当也不可能关闭在书斋里和实验室里，或停留在书本上和课堂上，作学理推究。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确实出现过不少学理推究的作品或讨论。它们或由于国外某些哲学权威的推动，或由于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也有过令人眼花瞭乱的场面。但是，这些作品和讨论，或则远离国计民生的中心，不务实际，或则不顾明显的现实，粉饰太平，在当时就缺少必要的影响，难以引起

群众的注意和关切，而时过境迁，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被人们遗忘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历时久远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民族的命运，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无愧于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论历史的长河今后如何发展，人们总是可以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中了解历史的足迹，时代的变迁，群众的奋斗，其价值和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

当然，哲学本身也有自己的特点，它是通过对现实的沉思而后用抽象和概括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它看来距现实较远而实质上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这样同时代、同实践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中一些抽象的概念、范畴和哲学命题，而不研究其中所包含的时代的、实践的内容，那同样也会陷于学理推究和教条主义，而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

我们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代的实践的内容，同时更要强调时代和实践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把这些内容凝固化、神圣化。当着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民主革命实践为社会主义实践所代替，毛泽东哲学思想自然不能再以研究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而应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如果说，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任务和重大贡献，那末，探求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任务和研究内容了。内容的变化反映了实践的推移和变化。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永远注视实践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努力使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观念同这种变化发展相适应，同新时期的要求相适应。

三 重点研究特色和贡献的形成过程，不简单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部分。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什么其他哲学，但也不是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产生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历史，要着重研究它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研究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所独具的特色和特殊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特色和特殊贡献，经历了一个长期地艰苦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日趋成熟的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应当把这一过程深刻、具体地反映出来。它不仅要阐明这些特色和特殊贡献是什么，而且要阐明这些特色和贡献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能成为独具的特色和贡献。这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已经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根据和基础，也要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研究他们同党内外一些错误思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分歧；既要研究中国革命实践可能提出的问题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实践发展所反映出的特点和趋向，也要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的把握和理解，研究他们从哲学上对实践的反思和概括，研究他们对规律性的把握和对能动性的发挥；等等。总之，既要从哲学理论上研究，但又不停留在抽象的和一般的理论上；既要从革命实践中研究，但又不就事论

事、为事实所局限，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表现的特色和作出的特殊贡献。

历史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在实践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好，既有最大的理论勇气，善于突破，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总结，能够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论，及时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当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向土地革命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敢于突破马列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夺取城市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当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敢于突破马列主义对阶级矛盾和资产阶级的有关论断，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成功地把中国革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当中国革命接近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以敢于胜利和善于胜利的精神，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批判中间道路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坚决而稳妥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如此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总是以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深厚的功底，以高超的水平和艺术，把历史上一再割裂这种结合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使它们相形见绌。只有从各种哲学观点对待理论和实践的态度上进行分析比较，才能更突出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和贡献。

可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切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框架出发，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削足适履地纳入既定的框架，而不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出发，按照其特色和特殊贡献来阐明它的过去和现在，分析它的未来，

这样势必把一部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有特色的哲学史，变成一部罗列一般哲学原理和范畴的毫无新意的“教科书”了。

四 重点研究集体智慧和发展规律，不纠缠于历史细节和个人活动

既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它的研究自然应当把重点放在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思想上。就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它所代表的集体智慧主要是同毛泽东共事的领导集体成员的正确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从工作实践和群众智慧中作出的哲学概括，表现形式主要是他们的重要著作以及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议和重要文献。

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在领导活动中一贯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一切重大问题和关系全局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经过领导集体成员的充分讨论而后作出决定，一切正确的领导决策都必须遵循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命力正在这里，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也恰恰是违反了这些原则。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的成员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时期领导集体研究和讨论的重点也是各有侧重的。在抗日战争前，领导成员的变化较多，不够稳定，为集体智慧作出贡献的有瞿秋白、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他们注视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军事问题；从抗日战争开始，领导成员变化较少，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贡献的主要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他们注视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团结最大多数群众，加强党和革命队伍的建设，开展大规

模的武装斗争，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从社会主义时期开始，不论是领导成员的变化，和历史的曲折迂回，都带有新的特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关于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犯的局部性和全局性的错误，关于毛泽东过世之后的历史徘徊和邓小平的历史作用，也都必须从党的领导集体中作具体分析，既要分析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功过，分析领导集体应负的责任，又要分析集体智慧在纠正自身错误中的巨大作用。因此，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其集体智慧，要着重研究不同阶段各个领导成员的哲学思想和有关著作，研究他们为党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作出的贡献。当然，集体智慧并不是这一集体中每个成员思想观点的机械的总和，它同样需要有一个集中提炼改造制作的过程，而承担这一任务的又往往是作为这一集体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因此，研究他是如何集中领导成员智慧的，研究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其他成员的异同，研究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和哲学思想，对于研究集体智慧的结晶往往有更重要的意义。总之，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历史的研究，重要的是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同其他领导成员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同党中央的重要文献和重要决议结合起来，既不要只顾前者而忽略后者，也不要只顾后者而不重视前者。

集体智慧还有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群众的智慧。领导的智慧当然包含个人的才能和素质，但更重要的则是来源于群众的智慧，领导脱离了群众，势必也脱离了实际，其智慧的源泉就枯竭了。但是群众的智慧又往往是分散的、片断的、不系统的、朴素的、经验性的，需要领导人和理论家把它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从理论上和哲学上作出概括和总结，使其带有普遍性和理论性。这里同样需要把研究领导的智慧和研究群众的

智慧结合起来，并进一步研究群众的智慧是怎样上升到理论高度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所体现的集体智慧，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诚然，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主要侧重在政治哲学和社会革命方面，但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也涉及到许多理论上、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涉及到许多概念、范畴、规律的研究和探讨。因此，对于同时代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作出贡献的哲学家的论著和成果，自然也不应当忽视，例如对于李达、艾思奇等有关思想，就应当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关论述和分析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归根结底是要研究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哪些特点和内在联系，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其发展的规律性是什么。我们只有根据这样的思路去进行研究，不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和个人的活动，象写编年史和编传记那样，而是突出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用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去启迪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和未来，才能真正发挥思想史、哲学史的作用。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任何时代的哲学学说或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学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现代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这一“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须首先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现代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其中尤其应当着重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客观条件，以及这一传播给中国革命带来的重要影响。

第一节　中国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

封建的英勇斗争；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很长时期里都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理论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是，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遂使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潮流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亦相应产生。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并对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以及它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世人所公认的。可惜的是，由于封建制统治时间过长，近二、三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较之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大大地落后了，这就很难避免外国资本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欺凌。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的漫长途程中，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的一页；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说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

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①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长期封建制统治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制统治的历史上，有过它辉煌发展的时期。在七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唐朝和宋朝，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曾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至十八世纪，也即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中国却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应该指出，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即大约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比如，在江南的一些地区，如苏州的丝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等手工工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制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与此相适应，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斗争也时有发生。当然，从总体上看，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三、四百年间，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所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不但在数量上极其稀少，而且还很不健全，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孕育的资本主义幼芽或胚胎，倘若不受外部特殊条件的影响，使之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成长壮大，中国也势必同欧洲的许多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冲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上，一方面，外国资本列强入侵中国后，他们依靠其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倾销商品，从而破坏了中国原有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使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趋于解体，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这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资本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为了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便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攫取超额利润，从而又必然阻碍和扼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征。在政治上，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按其本意来说，都妄图全面占有中国的主权，把中国变为它们共同宰割的殖民地；另一方面，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特别是同中国人民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而近代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又已充分显示了在中国存在着不可征服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华既得利益，便相互合作来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使中国保持一个独立统一的外貌。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就由封建社会逐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正是由原来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历史。

第二，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遂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前所述，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某些萌芽。但是，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发

展得十分缓慢，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还处于封建阶段，当时还远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只有两个基本的对抗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办企业，以及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始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新兴的阶级。这两个新兴阶级的出现，使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为近代中国的革命增添了新的内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在近代中国，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等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勾结，它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合伙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愈演愈烈，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中心。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各自支持中国的一个封建军阀，挑起军阀战争，以致战争连年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可爱的祖国濒临危亡的境地。不难看出，在近代的中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近代中国成了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

从总体上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当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页。

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它们各自在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之后大约四、五十年期间内，近代中国社会虽然存在着上述两对主要的或基本的矛盾，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封建主义统治者和以农民阶级为主的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后来，随着外国资本列强对中国侵略和压迫的日益加深，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勾结和依附，即大约在1884年中法战争、特别是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遂成为近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必然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和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斗争，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这对于动摇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阻碍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以及促进人民的觉醒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当时我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缺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难以克服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最后都统统失败了。比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

争，由于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它们在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之时，却对帝国主义存在着某些幻想，未能识破中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以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实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向封建宗法制度和神权观念进行英勇斗争时，他们也同样打起了“拜上帝会”这样的宗教旗帜，并同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一样，实行宗法式的任人唯亲路线；他们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一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虽然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和实行严格平等原则的愿望，但是这些要求和愿望却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而不是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压迫和贫富对立。正因如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强大力量合伙镇压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终归于失败。又如19世纪90年代在我国北方各省勃起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它们在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帝国主义时，却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的关系，未能明确认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奴隶或工具，从而提出了“扶清灭洋”的错误方针和口号；它们在进行反帝爱国斗争时，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尚处在“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①，表现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反对和敌视一切外国人或外国东西，而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上则沾染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以贫苦农民为主的自发的反帝群众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群众性反帝爱国斗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和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相比较，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资产阶级革命。①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而言，就其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而言，是一个比农民更先进的阶级。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又存在着种种不可克服的弱点。一方面，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又必然具有不彻底性或妥协性。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弱点，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所确立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在这一纲领中，既没有明确提出彻底的反帝斗争目标，也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不可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而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则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遂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烈，需要用革命手段加以解决。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虽然谱写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光辉篇章，但是所有的斗争都统统失败了，而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到了1919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革命舞台，并在本阶级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7页。

革命的领导阶级。

二　资产阶级“新学”及其局限性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曾经产生了许多反映这一斗争并为之服务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农民阶级提出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与文化的落后，也由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于是，“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②这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时期内，学习“新学”即西学遂成热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③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1814—1864）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出世以前，洪秀全作为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不可能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搬到中国来，他所接触和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②③同上，第4卷，第1451、1406页。

受的只能是西方的某些思想资料。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考时偶然得到一部由中国基督教徒梁发编写的宣扬西方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引起了他的兴趣。1843年，洪秀全又重读了这部书，书中着重论述的只有上帝才是“独一真神”，而一切偶像均应废弃的观点，以及早期基督教中的某些平等观念，使他深受启发，从而萌发了新的宗教信仰，并认为只有新的宗教信仰才是医治社会黑暗和不平的“福音”。洪秀全把他的新的宗教信仰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他在1845年为准备农民起义而撰写的《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原道救世歌》这三篇作品，正利用了西方早期基督教中的某些思想资料，来宣传革命农民的朴素平等观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从而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也按照中国农民的需要利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成为团结农民群众进行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精神支柱。在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即1853年制定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和1859年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撰写、经洪秀全亲手批改并作为太平天国官方文书颁行的《资政新篇》，集中地反映了太平天国的革命要求和政治主张。其中《资政新篇》可谓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就应向西方学习，为此就应该象西方国家那样，鼓励私人投资，发展工业和交通，开采矿藏，创办银行，发行纸币，开设邮局报馆，奖励发明创造，等等。《资政新篇》中提出的这些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康有为（1858—1927）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

代表人物之一，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青年时期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从1879年起开始接触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潮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从而开阔了他的眼界。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之后，民族矛盾迫在眉睫，国内阶级矛盾亦日益加深，这就大大激发了康有为的救国维新的爱国热忱。毛泽东在论述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时指出，“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在康有为看来，要挽救民族的危亡，就必须象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和改良，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为此，他六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从速变法，挽救危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国外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并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写了《大同书》，提出未来大同世界将实现财产公有、无阶级、无压迫、生产力高度发展等社会蓝图。他认为，这种大同世界只有通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毛泽东曾经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②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严复（1853—1921）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和康有为是同时代的人物，都是力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理论，并依靠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实现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1408页。

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867年，他考入海军学堂，初步地接触到一些近代自然科学；1877年，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英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激发了严复的爱国热忱。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1895年向清帝上万言书，提出变法的具体纲领。在戊戌变法前后，他先后翻译并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名著，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并加按语，抒发己意。在政治思想上，严复力图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去反对中国的封建君权论，用进化论为中国的变法维新作论证，这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因而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同当时主张变法维新的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严复的政治思想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他赞同并积极宣传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主张建立“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却没有从中直接得出废除封建君主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结论，而是把天赋人权论作为论证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依据；他积极倡导资产阶级新学，并对传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现代自然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却又逐渐转向旧学，晚年成为顽固的复古主义者。严复一生的这些矛盾状况不但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资产阶级新学是不可能揭示和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

孙中山（1866—1925）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跨越了我国民主革命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他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运用于中国，创立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指导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他坚持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的政治路线，最后，终于领导人民用武装斗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不愧是一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①但是，应该指出，以资产阶级新学为理论基础的三民主义学说，并不能科学地揭示和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因而三民主义作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问题上也必然是不彻底的。孙中山并没有认识到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没有提出反帝的民族主义纲领，他甚至幻想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只是把目标集中到“推翻帝制”上，而没有把封建帝制的阶级基础即地主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真正目标，没有把反封建的斗争同满足农民获得土地、摆脱封建剥削制度的要求结合起来。正因如此，他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政权却落入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手中。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孙中山处在彷徨的歧途之中，他不知道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依靠谁改造中国。他手中没有武器，周围又没有群众，想依靠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方军阀，因此，他的理想总不能实现。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24页。

只是到了后来，在遇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后，他的思想认识才获得了很大发展，才由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才得出了“以俄为师”的基本政治结论。孙中山一生所经历的坎坷道路和他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充分表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用资产阶级“新学”来指导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决然不会成功的。

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①，它们以此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新学”的拥护者们力图用进化论的观点同当时统治中国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观念作斗争，并为变法维新和革新社会作论证。比如，康有为就曾经说过：“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②因此，他认为，“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是非美恶，随时而易义。”③他从“新则壮”这个“物之理”出发，得出“为治之道”必须“随时而易义”的政治结论，这就为变法维新提供了哲学根据。“新学”的拥护者们在理欲、名实、人性、知行等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上，也力图用唯物主义反映论去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以便为资产阶级谋取功利、寻求个性解放作论证。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8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③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

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观上，它虽然承认发展变化，却否认事物的根本质变；在认识论上，不了解实践的真正含义及其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常常割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在历史观上，则否认阶级斗争，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把少数英雄人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这种哲学思想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指明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七十年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未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固然，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的，而缺乏先进阶级和先进阶级思想的指导，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指出："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①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表明，在帝国主义时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他们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旧民主主义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们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乃是一种陈腐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要彻底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必须有先进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有彻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武器。这样，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存在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同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而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具备国内的和国际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历史条件，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自身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条件，已如前述，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同我国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条件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解放，它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而它的国际条件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一 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意义

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从1915年开始形成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之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深入发展的思想表现，并对近代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本身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所倡导的社会理论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学说；但是，就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就它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观念批判的彻底性而言，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先导：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斗争和后来的反帝宣传，才引发了“五四”运动这一群众性的爱国政治斗争，从而才揭开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新的一页；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思想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激起了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的热情，才在一定程度上为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促进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才使得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在五四时期产生。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他们一方面加紧向中国人民进行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进攻；另一方面又竭力宣扬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以便为复辟封建制度和反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舆论准备。比如，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准备恢复帝制发表了“整饬纲纪”的宣言，公开提倡“祭天祭孔”；与此相适应，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宣扬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封建余孽大肆叫嚣恢复帝制，“定孔教为国教”；早已堕落为复古主义者的康有为也公开撰文高唱“非复

辟不能救中国”的滥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述情况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意识到，要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展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斗争。于是，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就应运而生了。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但是，新文化运动所开展的反封建思想斗争，却比以往包括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在内的任何运动都更加坚决，更加彻底。大家知道，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较多地是介绍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而没有直接攻击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有的甚至还借用孔子的权威去阐发其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固然也是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性却大大超过了这两个运动，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集中地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思想和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当时的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武器，猛烈攻击封建专制主义，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合理性；他们宣传和颂扬科学和科学精神，借以反对封建迷信和保守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批判以孔学为代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时，还揭露了它在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本质。比如，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自古传来的种种教宗哲派，都认为宇宙有一个绝对理性、绝对意志之大主宰，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

足取的。应该说，这种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世界观上的揭露和批判，要比那些仅仅局限于在政治上揭露孔学不合时代潮流、不合共和制度要求的议论，委实是前进了一步。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革命。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乃是一定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反映，社会上进行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变革就必然要求文学的变革。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思想斗争的深入，文学上的革命就更加迫切了。从1917年起，《新青年》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积极主张改革文体，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应该说，胡适在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对于打破旧的八股文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然而，胡适并没有把对白话文的提倡同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把文学革命同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是陈独秀，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打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打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打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显然，陈独秀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已经不限于文学的形式方面即文体问题，而是已经深入到文学的内容问题了。由此可见，首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旗帜的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应该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坚持文学革命的伟大战士，他不但把文学革命同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以他的创作为新文学打开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作品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化运动还波及到中国的教育改革。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在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曾仿照西方对旧的教育制度作了若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提倡研究学术，坚持“兼容并包”的方针，积极宣传西方文化。他聘请《新青年》的编者们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开设宣传新思想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接受新思潮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遂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据点。蔡元培所坚持的“兼容并包”的方针固然反映了他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的积极作用，在学术上则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总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对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对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成就和偏向应该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估量。由历史条件所决定，在“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仍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所用来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只能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库藏中去寻找；它所倡导的新思想、新道德和新信仰，其核心内容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原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实际情况表明，离开了政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独解决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反封建任务并没有真正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① 新文化运动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就其反对封建文化、同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决裂的坚决性而言，就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斗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其对我国民主革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言，都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一次真正的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创造了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其中，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有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产生过某些严重的偏向。比如，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它却未能同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因而并未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剧烈震动；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运用新思想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和旧文化的斗争中虽具有坚决性和彻底性，但它所使用的方法却具有形而上学的某些特点，即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认为西方的一切文化都是进步的，东方的一切文化都是落后的，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民族遗产也当作封建文化一概加以否定。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这些缺陷或偏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后人自然不应当过分苛求或加以指责，但是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却值得我们后人加以认真总结和汲取。

二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十月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或兴起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通过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和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的。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容和本质的理解和掌握而言，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真正传播却始自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实现的。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即在我国报刊、文献中出现。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出现问题时说过，“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文注释：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①十月革命前，我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时，也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们在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时，也介绍过马克思学说的某些内容。从现已查到的文献资料看，中文报刊最早提及马克思名字的，可以追溯到1899年。这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的《大同学》（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的进化》一书节译，蔡尔康笔述）一文中，就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也提到了马克思，当时把马克思译为“麦喀士”。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曾刊有马君武撰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文中提到

①《“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6页。

马克思的学说："马克司（即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在文末所附马克思的论著中，曾提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系恩格斯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五部书。1904年2月1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刊上，发表了梁启超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文中谈及马克思的观点是认为"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内容所作的较为详细的介绍。与此同时，即在1902—1905年期间，由于留日学生逐渐增多，他们在日本也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因而在一些报刊和文章中也常常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日本的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读物也被译成中文。比如，1903年9月曾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1903年底、1904年初曾翻译出版了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述》一书，等等。应该指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些年代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虽然有过某些零星流传，但它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潮，它只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派别在中国加以流传的；这一时期我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时虽然也提及马克思及其学说，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非但不想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只是一鳞半爪，甚至往往是歪曲的和敌视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潮在中国传播，是伴随着近代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中国人民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进行

的。如前所述，在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要救国图强就只有维新，而要维新就只有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中国人民的这一认识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之后，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育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①，这就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及其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其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愈益尖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利益争夺而爆发世界性战争，等等。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其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压榨，作为战胜国中国的情况非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一天天地坏起来，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这样，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中国欲图民族之复兴，人民欲求彻底的解放，必须重新探求新的真正科学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适应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迫切需要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学说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其传播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来自俄国的，也有来自日本、法国和德国的，既有翻译和介绍马列哲学著作和原理的，也有介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发展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

历史和现状的。就马列哲学著作和原理的翻译、介绍的数量之多和系统性而言，当时的日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传播的主要渠道。这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从德国和俄国大量传入中国尚有诸多不便；而当时的日本，工人运动比较发达，对马列哲学的研究和著述也较多，而中国的留日学生也甚多，因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东方邻国日本这一渠道，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

但是，应当着重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正因如此，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突破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不能不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伟大历史作用，既有理论上的又有实践上的。正当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重新探求革命真理、寻找新的解放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已的问题”①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指明了出路，它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充分显示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强大威力。也正因如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的面目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①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被陆续地翻译过来，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革命胜利后的某些情况被介绍到中国。比如1921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同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有《资本论自叙》（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半部分）等。列宁的一些论著也在1920年开始流行，散见于各报刊的有《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1920年俄共（布）第8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的报告）、《旧制更新》（即《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等。与此同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刊物纷纷出现；在一些高等学校甚至还开设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课程，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并被一些人所接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集中在唯物史观的传播上。这一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的新颖的哲学理论，它同社会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败之后，正在探索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的方法和出路，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又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页。

从实践上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因此，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便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唯物史观的学习与研究上。1920年底，李大钊在谈到唯物史观在高校中的影响时说过，“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① 这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我国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一批先进分子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其中李大钊则是这批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李大钊就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凉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从1919年起李大钊开始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来阐发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比如，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新阐发，并且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把马克思主义诸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的“一条金线”。③ 又如，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中提出，十月革命之后在全世界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潮流，因此，十月革命之后的民主主义不是属于资本主

---

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选集》第339页。

②《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③《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上书第177页。

义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他在同年2月发表的《大亚细主义和新亚细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在同年5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还首次提出青年“应该到农村中”、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思想；同年10月，他在《国民》杂志社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五四”运动，指出“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运动，它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他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论述了亚洲各弱小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两大潮流汇合起来，必将冲决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应该指出，在我国五四时期，李大钊等一批先进分子所写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都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他们不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本身的理解上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上，都有许多不够准确和不够恰当的地方，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但是，在我国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观察和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在社会上掀起了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大事，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一页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之希望也正在这里。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在我国五四时期，在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研究系所办的报刊杂志上，如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

国日报》副刊《觉悟》、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民党创办的《建设》杂志、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等，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比如，戴季陶曾发表从经济上分析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长文，还从日文转译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胡汉民则专门研究唯物史观，并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和哲学史的一些问题。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研究系人员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亦应作全面的和历史的分析。一方面，他们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或者仅仅作为纯学术问题加以研究，或者为了“毕其功于一役”而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另一方面，他们大量发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现实问题所作的解释有些也是正确的。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表明，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潮流。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和世界观，是同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历史使命、利益和要求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现，须以中国无产阶级自身的产生、成长和壮大为阶级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发展，反过来又会大大促进中国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能力和斗争水平的提高。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

业和中国自身企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列强侵入中国，就开始有一批穷苦劳动人民在外国轮船、沿海口岸充当工人，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到了60年代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工厂的增加和官办工业与民族资本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840年至1894年这50多年间，中国产业工人发展到10万人左右。从1895年至1913年这近20年间，中国产业工人有了迅速发展，达到100多万人。从1914至1919年这5年间，中国产业工人的发展更加迅速，达到200万人。同全国人口相比，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固然很少，但是，它的出现却标志着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已经诞生。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所受压迫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而它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中国无产阶级很早就写下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记录。比如在1858年，香港就有两万多名市政工人和运输工人举行罢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曾去广州参加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的斗争。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规模亦愈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至1911年这四十多年间，我国工人罢工达105次；而在1912至1919年这短短七、八年间，工人罢工斗争即达130多次。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先进的革命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经历了一个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逐步发展过程。我国无产阶级在诞生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以前这二、三十年间，虽然曾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还尚未形成一个自觉的阶级，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政

治舞台，它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伙伴和追随者去参加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这一状况，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在五四运动期间，特别是在“六三”大罢工之后，我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第一次显示了它的政治威力；而在这一斗争实践中，中国无产阶级自身也受到深刻教育。毛泽东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的时期，他们还只是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① 五四时期是我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时期。在五四时期，我国无产阶级虽然尚未认识到本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对资本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组织程度还不高；但是通过五四运动的教育，已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凶恶敌人，感觉到本阶级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初步体现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随着中国无产阶级思想政治觉悟、组织水平和战斗能力的逐步提高，迫切地需要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充分显示巨大的阶级力量，这就使得一部分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从中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的结合。大家知道，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虽然认识到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反抗阶级压迫，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应当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并没有找到改造中国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和依靠力量，把改造旧中国的决定力量寄托在少数杰出人物或知识分子身上。十月革命不仅给先进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武器，而且又以活生生的现实向先进的中国人表明，工农劳动群众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伟大力量。而五四运动则通过中国自身的革命斗争实践向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深刻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同俄国的无产阶级一样，也是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样就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思想认识上突破了原有的陈腐观念，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改造中国的阶级力量。比如，青年毛泽东就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中领悟到，我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正在于没有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而只有以工农为基础的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才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力量。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成长壮大，并显示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作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深刻、有力，才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把

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阶级基础。

四 “三次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扩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实现的。十月革命至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者的极大恐惧。为了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北洋军阀政府采取逮捕进步人士、查封进步报刊等手段，用暴力加以文化镇压和破坏；另一方面，一批诸如胡适、张东荪、梁启超等右翼知识分子，则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样，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出现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著名论战。

其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争。这一论争是由胡适首先挑起的。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提倡“研究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为了反击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论点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在此之后不久，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24日）、《四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解。1919年8月底《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封闭后，“问题与

主义"的论战仍在深入进行。同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宣扬他的改良主义观点，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针对这一攻击，李大钊于1920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应该指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并不仅限于在李大钊和胡适间进行；实际上，这场论争影响到整个新文化界，当时在许多社团内部都在进行类似性质的讨论，而且讨论的时间亦延续很久。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实质，是近代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问题。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是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的背景下发表的，其明显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对此，胡适本人也供认不讳。他在1930年发表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承认，"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① 胡适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进行社会革命。在他看来，高谈社会主义，以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② 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应当从研究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比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卖淫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等等，这些都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十分清楚，胡适所说的反对"空谈主义"，实际上只是反对谈马克思主义。

---

①《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②《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从哲学上说，贯串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胡适其他论著中的基本思想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理论并不是胡适的独创，而是从他的美国老师杜威那里贩运来的。大家知道，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在19世纪七十年代由皮尔士首次提出来的；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詹姆士的倡导和宣传而逐步形成的，杜威则是继詹姆士之后的实用主义主要代表。[illegible]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否认客观真理，宣扬有用即真理的真理观；在社会历史观上则否认社会根本变革，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实用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因此，它在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广为流行。在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这两年多时间内，杜威应邀来华讲学，大肆兜售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美国的世界主义，并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五四运动，诬蔑学生反帝爱国斗争是“感情用事”。不难看出，正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和我国民主革命高涨之时，杜威来华、并同胡适一起，师徒二人一唱一和，紧密配合，大肆宣扬实用主义，是有其险恶政治目的的。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他来华宣传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是为了“补救修正现社会现政治”，以“免掉革命的危险”。

为反击胡适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方志敏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逐一批驳。李大钊首先批判了胡适把“问题”同“主义”绝对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错误，指出：“问题”和“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

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不悖的。”李大钊还着重批判了胡适反对用革命手段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社会改良的思想。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则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他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并进行经济上的彻底改造，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这次论争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宣扬的哲学唯心论和社会改良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广泛深入的传播。值得指出的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只是初步地回答了中国要不要革命、以及中国的革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同中国革命相结合，这只能在尔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加以解决。

其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

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我国思想文化界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也愈来愈多了。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后，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由此更掀起了学习苏俄和讨论社会主义的高潮。这一形势必然引起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恐惧，因而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新的进攻。在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我国思想文化界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规模论争，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发生的。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是由研究系政客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利用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来华演讲之机发动的。罗素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则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劳资调和，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实现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罗素应邀来华讲学，作了多次演讲。罗素在演讲中除了宣扬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外，着重兜售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值得指出的是，罗素在其演讲中不但公开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反对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且还把他的改良主义思想运用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在罗素看来，由于中国实业不发达，因而在中国就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差别，就不需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中国的当务之急应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从这一改良主义观点出发，他便公开反对中国革命和五四反帝爱国斗争。他认为，“今日的世界，最危险的两件事体，就是（一）爱国主义，与（二）阶级斗争”。①罗素在华的这一套改良主义暄嚣，受到了研究系分子的喝采。于是，他们配合罗素演讲，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张东荪在1920年11月至12月间先后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将来》两篇文章；梁启超则于1921年2月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与此同时，其他研究系分子也发表了一些类似内容的文章，在一个时期内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其文章中不但竭力吹捧罗素，系统兜售罗素的改良主义观点，而且还结合中国情况作了进一步发挥。他们一方面虚伪地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

①《罗素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第20页。

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肆意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说中国工人的痛苦并非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工头，中国农民的贫困不是来自地主阶级的剥削，而是来自天灾人祸。因此，他们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反对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研究系政客的这些论调，在当时曾引起社会主义宣传上的混乱，严重地危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论调刚一出笼，就立即受到当时在各地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的猛烈回击。当时在广东的陈独秀，曾连续发表了给罗素和张东荪的公开信，在上海的李达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在北京的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何孟雄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在法国的蔡和森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周恩来则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等文章；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汇编了《社会主义讨论》。这些文章，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种种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首先，他们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所谓中国没有阶级区分，不宜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能进行社会革命的谬论，坚持了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主张。指出，近代中国的工业虽然落后，但不能由此否定中国存在着无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广大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的雇佣劳动

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比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痛苦和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是改造中国的真正出路。其次，他们驳斥了张东荪等人诬蔑中国工农群众缺乏革命自觉性的种种滥言，论证了为领导工农革命运动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指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也必然会产生；只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中国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再次，他们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发展实业"的实质，论证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他们指出，发展实业，增加社会财富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实业，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梁的所谓先"发展实业"，就是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在帝国主义"万国竞争"的中国，想依靠绅商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去开发实业，或借助帝国主义的帮助来增加中国的社会财富，这完全是空想。中国要想获得自由、和平、繁荣、富强，就应该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难看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这场论争，是关系到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重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研究系政客之间进行，而且在中国思想界亦以多种形式展开，在一些进步团体内部也进行着类似的讨论或争论，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经过这场论争，暴露和戳穿了张、梁等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的伪善面目，澄清

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许多思想混乱，提高了革命知识分子的认识水平，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

其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在五四运动以后至建党前后的一段时间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影响的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以无政府主义为思想武器，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引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即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大论战。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属于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存在着滋长和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也由于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着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作用，因此，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实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无政府主义的某些观点和主张，早在18世纪即由英国人霍德文提出。然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则是在19世纪开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施蒂纳、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它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专政，因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无情批判。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开始传入中国。1907年，一些宣扬和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刊物正式在中国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师培、张继、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他们多是当时留日、留法的学生，较多地推崇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从总体上说，无政府主义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主要代表人物是刘师复。1912年，刘师复等人在广州组织“心社”

和“晦鸣学舍”，1913年还创办刊物《晦鸣录》（后改名为《民声》）；1914年，刘师复还在上海创办“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书，积极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其中主要是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活动和思想宣传。这时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已产生某些重要影响，但总的说来，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貌似社会主义的思潮，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并未占据优势。1915年3月刘师复病逝后，以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继续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系统地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遂有所扩大。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新的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兴起，无政府主义者则把斗争矛盾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在政治上，他们标榜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咒骂布尔什维克是“专制”、“独裁”；在经济上，他们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计划生产，主张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在哲学上，他们鼓吹个人主义人生观，宣扬“个人万能”，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套观点，比较适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胃口，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有着某些影响。正如刘少奇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国五四时期，在起初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流派，甚至还占据着优势。鉴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公开地反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鉴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产

生恶劣影响和危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奋起开展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则是不可避免的。

从1920年起，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达等人，便开始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接着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直接斗争，在建党前后这一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汇编了《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撰写了《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的论点和危害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全面揭露。首先，他们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便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建设共产主义。如果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既反对暴力革命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就不可能获得解放，也就更谈不到建设共产主义。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专政，这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因此，那些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是“有产阶级底好朋友”，是“有产阶级的恩人，无产阶级的敌人！”①其次，他们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理论，论证了这些理论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他们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破坏集中的大生产、把生产资料分散给个体小生产者，而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

①《夺取政权》，《共产党》杂志第5号，1921年4月。

产阶级所有制，实行集中的有领导有计划的生产，否则就会象资本主义那样造成生产上的混乱和危机。他们还指出，分配问题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即只有当“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①时，才能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即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只能把社会经济秩序“弄糟”。②再次，他们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个人主义绝对自由观，阐明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他们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个人自由总是同社会自由连在一起的，只有社会自由才有个人自由。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剥削阶级的自由，没有劳动阶级的自由；而劳动阶级要想获得自由，就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他们在批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宣扬事事均须“人人同意”才能实行的观点时指出，如果凡事要“人人同意”，“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吗？”③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人人同意”不论在任何社会都是行不通的，这种观点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和斗争，是十分广泛而激烈的。除《新青年》、《共产党》、《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先锋》（192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等报刊比较集中地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外，这场斗

①②《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

③《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争在一些学校、社团和留学生中也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论争和斗争的实质，是中国革命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之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机会主义根本区别的试金石。“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①正因如此，这场论争和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这场论争，使大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坚决地走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场论争的结果，大大地加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占据了优势。

五四运动后期，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开展的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争，实质上是近代中国革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在这三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应当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点和偏向。比如，这几次论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范围中进行的，尚缺乏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论争的内容较多地局限于一般性思想理论上，尚未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未提出改造中国的根本道路；在论争中，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理解和阐发尚欠准确和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揭露和批判也缺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乏鲜明性和彻底性。这些缺点的存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论争的成绩是主要的，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这三次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提高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第三节 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产生

在十月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我国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遂激剧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变成共产主义者。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恽代英、瞿秋白等人，尽管他们在年龄、出身和个人经历上有所不同，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具体情况和深度、思想转变的具体时间和途径亦有所区别，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都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个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和复杂的斗争过程，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同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同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准备过程一致的；与此同时，他

们的思想转变又是同他们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刻苦学习，以及同包括滞留于自己头脑中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清算分不开的。

一　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

由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无一例外地都是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同近代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相适应的，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实现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和必然的历史过程。

我国的民主革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发展过程，先进的中国人对我国民主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深化和发展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这八十年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辛亥革命这样的在比较更完全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比较彻底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这些革命斗争虽然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甚至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仍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也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满腔热情，意气风发，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对国家与民族充满热爱，对科学与民主无限向往，为救国救民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他们不愧是民主主义的英勇战士。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由于阶级的和思想理论上的局限性，即使当时的民主主义先进战士也不可能找到实现我国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正确道路。他们既不可能全面认清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真正原因的阻力是什么，也不可能真正认清如何扫除这些阻力，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正因如此，他们的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他们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内陷入了彷徨无路的境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于是，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也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飞跃。

在十月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实现了政治思想上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软弱性，他们在反帝问题上不但是不彻底的，甚至根本没有提出过反帝的任务，就连孙中山这样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长期未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的失败和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产生怀疑，在深入思考“老师为什么总是欺侮学生”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仍未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是“公理与强权之争”。在十月革命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在获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以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就逐步地改变了。比如，李大钊在《庶民

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就指出了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①所引起的，并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而是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初的巴黎分脏会议，特别是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从而加深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两周，李大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运用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巴黎和会，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指出：“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帮助下，还把中国人民的命运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比如，李大钊曾经指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不能仅限于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应该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为此，他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和“实行民族自决”的口号③，他明确指出：“此番运动（指五四运动——引者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决运动之一部分也。”④

①《李大钊选集》，第110页。

②《李大钊选集》，第212页。

③《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④《李大钊选集》，第255页。

这些情况十分明显地表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已开始认识和把握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其二，关于对中国的改造和中国前途问题的认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象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至于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在当时的先进中国人中有相当一批人主张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道路。于是，纷纷到西欧和日本去学习科学技术。比如 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就较多地倾向于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在他看来，只要明哲之士都“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① 但是，在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学习之后，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问题的认识，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从十月革命的伟大事件中感受和预见到了时代和革命发展方向的变化，认为20世纪的革命将是俄国式的革命，未来的世界将是赤旗的世界，俄国的革命开始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由此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和新世界。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几次论争的教育，初步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从而坚定了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的决心。正因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原来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李达、李汉俊等人，原来都是赴日学习理工科的，十月革命促使他们改变方

①《论民权之旁落》，《言治》月刊，1913年6月第1期第3页。

向，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宣传者。又如毛泽东、恽代英和陈延年等人，他们在青年时期都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影响，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学习，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几次论争的教育，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其三，关于对中国革命依靠什么力量问题的认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基本力量是资产阶级。虽然当时的一些先进分子也曾经提到中国革命要以"国民"为后盾，但这里所说的"国民"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很大震动，他们从中看到了无产阶级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在我国五四运动中、特别是六三运动之后，工人阶级以最坚决的战斗雄姿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充分显示了它的伟大战斗力量，这就使得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突破固有的阶级局限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正因如此，他们才提出了"到民间去"的战斗口号，才把同工农结合作为知识分子献身革命、改造自己的正确道路。

上面谈到的几个问题，即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问题，关于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道路的认识问题，以及关于对中国革命需要依靠什么力量的认识问题等，都是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亟待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历经千辛万苦、艰难探索之后，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回答上述重大问题的科学答案，从此即把眼光从西方转到东方，从法国革命转到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

折，是近代中国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的伟大事件。对上述有关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上的这一转变，既是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产生的显著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成果。

二　由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因而也是人们的一切政治见解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问题时，不能不思考和研究广泛的哲学问题，特别是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在十月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实现政治思想上的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个哲学思想上由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转变。

这里应该指出，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哲学具有同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更由于近代中国在哲学上面临的主要课题是怎样认识和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因此，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哲学思想上所实现的转变就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观的变革上。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其一，关于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同他们的政治思想一样，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在自然观上，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是心物二元论者，有的则是唯物论者；而在社会历史观上，则都是历史唯心论者。在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一历史观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由于阶级和历史的条件限制，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们都把思想意识看作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认识到社会意识是由社会的经济制

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他们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把辛亥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阻挠，因此，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彻底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的新文化运动。应当承认，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去冲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落后势力，并从思想上和知识上去启发广大群众对自然对社会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性，使他们获得从封建主义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武器，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深刻的政治意义。但是，新文化运动就其社会历史观来说却是唯心主义的，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可能真正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出路。

在十月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初步学习之后，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思想和道德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的或经济的变动引起的，而生产力则是促进社会变动的最高动因。李大钊认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恩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① 李达也认为，"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

①《李大钊选集》，第260、272、278页。

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样，便引起革命。①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一原理出发，进一步认识到要解决近代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经济制度入手。比如，李大钊在批判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时就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子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②不难看出，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认识上的这一转变，表明他们已从根本上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认清中国革命的目标和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二，关于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认识。与上述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认识相一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长时期里，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一直把少数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没有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大家知道，在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优秀的领导人都把变革中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幻想依靠青年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实现文化思想的革命和唤起民众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取名为《新青年》，其意义就在于此。也正因如此，当时的一批先进分子的革命活动只能局限于少数人的范围之内，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革命成果。

---

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30页。

②《李大钊选集》，第233页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实践中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力量的重要，从而对改造中国的动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庶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①；毛泽东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领悟到他多年孜孜探求的宇宙之“大本大源”正在于“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因而“唯有民众的力量最强”②；周恩来则从五四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中体会到群众运动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他坚信只要“‘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③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但开始改变了先进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看法，而且还引导他们进一步探讨劳动的意义和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并从中引发出劳工神圣和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结论。比如，当时的进步刊物《国民》在谈到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的关系时，就明确指出：“我们青年，现在要想使他们有觉悟，能自动，晓得劳工的地位和价值，只有和他们打成一片，灌输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成无数个精密完整的团体；一面我们做那劳动的生活，改善那般骗文凭、作高等流氓寄生虫的先生们的旧习惯。这是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与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政府，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④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在五四运动以后许多地区的平民教

①《李大钊文集》下卷，第64页。

②《民众的大联合》。

③《天津学生短期停课宣言》，天津《益世报》1919年10月14日。

④《国民》第2卷1号，1919年11月。

育演讲团才有了很大发展，演讲的地区由城市街头发展到工厂、农村，演讲的对象由城市居民扩大到工农群众，遂使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劳苦大众的结合成为一种历史的潮流和趋势。这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三，关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认识。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前，尽管对旧社会的黑暗腐朽深恶痛绝，对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也十分同情，并为救国救民进行了多方面的英勇斗争，但是，他们对引起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和实质缺乏深切的了解，因而也找不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方法和途径。在很长时期里，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由于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仅仅归结为思想史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对旧社会的思想批判也只限于纯理性范围，宣扬超阶级的永恒正义和一般民主。他们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种种方案，或者在封建制基础上作某些改良，实行君主立宪，或者以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谴责和否定一切暴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等等。实践表明，所有这些方案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都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美好理想。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根本方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①在十月革命之后至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斗争实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践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而使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认识到阶级的实质，人类历史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李大钊认为，“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①，这种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是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李达也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即阶级斗争—引者）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即三个组成部分联络起来，“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③。蔡和森也认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方法就是“阶级战争”④。他们还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认识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专政，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压迫和剥削，才能组织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李达说，国家的实质“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而“无产阶级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产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⑤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⑥不难看出，在十月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①③《李大钊文集》，下卷，第17、18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30页。

④《蔡和森文集》上卷，第28页。

⑤《李达文集》第1卷，第31页。

⑥《蔡和森文集》上卷，第35页

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而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找到了改造中国的根本道路和途径。

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蔡和森在1920年9月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指出，“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曾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探讨哲学问题，而这一探讨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从此，我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才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旧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才产生了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我国的革命才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于是，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中国的革命从理论到实践，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三 在斗争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十月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前后，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客观的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与他们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只是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在主观上作出艰苦的努力。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五四时期是中国革命发生急剧的根本性质的变化的时期。与以往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发生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在国内和国际革命力量初次汇合之下出现的一个新高潮。在这次运动中，不但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而且由此实际上开始了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过程，遂使中国革命开始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这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各阶级间的政治矛盾和思想矛盾必然加剧，原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营垒的知识分子也必然会引起分化。近代中国的历史已清楚地表明，在我国五四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运动的深入，原来结合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愈益脱离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走上了所谓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有的甚至堕入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营垒；而另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则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在炽热的时代熔炉锻炼之中，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实践考验和自我教育，终于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观，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

在我国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除了客观的原因或条件之外，就主观原因而言，是因为他们原来都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具有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有把对理论的探索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思想作风和思想特征。具体说来，促使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产生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上进好学，善于思考，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想理

论进行审慎的分析比较和深入的研究。大家知道，由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和革命任务的复杂性所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情况在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各个阶级的思想要求和文化倾向竞相表现，各式各样的改造社会的思想理论纷纷流传，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在五四运动以前，我国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在世界观形成或转变时期，对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学说和流派，如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等，大都有所接触并接受某些影响。比如，李大钊曾经接受过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和陈延年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李达和李汉俊曾幻想走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道路，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大凡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的巨潮中是不会停留在原来的观念轨道上的，实践和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把他们引向新的广阔天地。我国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深化自己的思想认识，他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实际境况中吸取了思想营养，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由幻想的破灭而表示了深重的怀疑；他们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由思想感情上的巨大震动逐步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和追求。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是与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最初时期，许多社会政治学说，如基尔特社会改良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作为“社会主义”的流派在中国传播的，这就为我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的思想发展造成很多困难。但是，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通过对现实生活和实际运动的悉心考察，通过当时社会上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争”的教育，通过对各种社会政治理论的分析比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钻研，他们终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比如，周恩来赴日留学不久即爆发俄国十月革命，他认真地阅读日本进步报刊，对有关十月革命的宣传、报导进行分析和比较，并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工资劳动与资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河上肇的《贫乏物语》、《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等著作，初步地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积极地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底，他到法国后对各种学说作了进一步钻研与比较，从而确定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21年1月30日他在巴黎写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① 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又如，蔡和森、陈延年和瞿秋白等人，都是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对国外工人运动进行实际考察和了解之后，确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其二，面向实际，注重调查，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理论，因而，只有同情、支持和献身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的人，才能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的道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只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面向实际，注重调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实现世界观和革命观的根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

①亲笔信影印件，见《光明日报》1982年7月6日。

者。如前所述，从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情况来看，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我国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思想革命同政治革命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和社会实际的结合成为革命发展的历史趋势。从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观情况来看，他们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要以很大的精力注重对社会实际和群众疾苦的调查与了解。比如，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时，就提出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周恩来在中学读书时，也认为“科学知识之产生实验与考察之中”①，主张“善求书外之学问”。②正因如此，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学生时代起就十分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比如，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曾利用假期邀集一些同学到湖南许多农村进行调查，后来他在一师毕业后去北京途中还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调查；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也经常深入工厂、矿山参加生产劳动，并到英、法、德等国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情况和工人运动状况，他赴英考察写成的《英国矿工风潮之始末》正是他深入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动体现。

革命知识分子到实际生活中去深入调查研究和进行革命宣传，并逐步实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对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克服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促进其思想感情的变化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就强调指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③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李大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作民

①《医学与中国之关系》，《敬业》第5期，1916年10月。

②《本社之责任观》，南开《校风》第63期，1917年5月2日。

③《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146页。

众的先驱，对民众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而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必须以民众为后盾，忠于民众并为民众运动服务。①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大约在1920年5月左右，我国的五四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两股革命力量相结合的阶段。于是，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劳工神圣"的声浪空前高涨，"到民间去"和"与劳工为伍"等口号遂成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社团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使得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认识水平和奋斗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邓中夏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就是明显的一例。邓中夏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组织过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演讲的范围和对象却仅限于市区"平民"，即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商人。五四运动以后，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范围和对象发生很大变化。1920年3月，讲演团接受邓中夏建议，决定今后"除城市讲演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①此后，讲演团则经常到长辛店和南口铁路工人中以及丰台、通州农村中进行工作。据杨东莼回忆，邓中夏经常到长辛店、南口"车辆修理厂中活动，与工人同志打成一片，工人同志很主动地接近他，在他和他们之间，殆已结成了深厚的友谊。"②正是在同工农群众结合的基础上，邓中夏大约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飞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其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斗争实践中把理论的学习

---

②参见《李大钊选集》第308页。

①《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6日。

②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卷，第381页。

同个人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者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他们自身的思想改造过程。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他们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必然会接受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影响；在他们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定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基本内容的理解难免是肤浅的，甚至产生某些误解，划不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界限。但是，由于他们自身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以改造中国为已任，因此，他们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善于把自身的意志和情操的培养、思想认识和觉悟的提高同对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吸取思想营养。比如毛泽东，他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和抱负，他和当时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认为社会的改造须以人（包括进步青年在内）的改造为前提，而人的改造既应包括个人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顽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的锻炼与培养，亦应包括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学习期间，经常与老师和同学交流思想，并把自己的日记在同学中传阅，以求得大家的帮助；他还善于在和老师、同学的通信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青年毛泽东特别注意从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一师毕业后，他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想在长沙岳麓山下找一块地方搞“新村试验”，试图用教育的办法来改造社会；后来，他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又主张用“呼声革命”、“忠告运动”的办法劝说统治者“回心向善”。然而，他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和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认真比较，特别是通过对切身斗争经验的总结，使他终于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清除了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从

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和革命观的转变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也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类似的思想发展过程。

二十世纪初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它是近代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开始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为从组织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加以解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几次论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只是从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合乎中国国情，即中国革命要不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至于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这只能在尔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去加以回答和解决。

第二章

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

毛泽东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共产主义者之一。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在哲学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深入研究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可以从一个侧面具体地揭示近代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转变的具体途径和机制又有它自身的特点。青年毛泽东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他的世界观曾经历过从一元唯心论向二元论的发展过程，《〈伦理学原理〉批语》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后，他的世界观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唯心主义和二元论逐步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必然结果，而这转变又是通过他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在斗争实践中实现的。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意识。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满旧中国的封建腐朽制度，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1年春，他离家赴长沙学习；1914—1918年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夕，社会上新旧两种势力和新文化运动内部革新与改良两种社会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他的早期世界观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说过，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①毛泽东早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主要是从学校教育和书籍报刊的学习中获得的，反映在《讲堂录》、给黎锦熙等人的信和其它文章中。

一　《讲堂录》中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及唯物论辩证法因素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写的课堂笔记，时间为1914年10月到12月，共有一万多字。笔记中反映出他在广泛阅读古书、古籍的基础上，对于课堂教学内容的接受和吸取。从总体上看，《讲堂录》表明青年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唯心主义的，但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是那种僵死的、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而是具有某些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的唯心主义，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讲堂录》中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唯心主义的。

在心与物、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这个划分两种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

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上，《讲堂录》强调前者具有本源的地位。其中谈到："人心即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①这里，表现了程朱理学的影响。把人心等同于天命，而天命又等同于抽象的"理"。这种"理"并非出自"我心"。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不是那种夸大"小我"的唯我论，而是儒家所称颂的以宇宙精神为本质的客观唯心论。在"理"和"我"的关系上，提倡"无我"。1914年11月15日，毛泽东的笔记，关于孔孟儒学的"无我论"曾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笔记中还引述了孟子的话，阐明重视"大我"的意义"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那么，什么是"宇宙之我"呢？回答是"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从这里可以看见，儒学的"无我论"，一是强调"无我"；一是片面跨大精神的力量，称颂宇宙精神。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的儒家的这种"无我"思想，同他当时的希望世界大同的年轻蓬勃向上的、自我牺牲的心理状态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儒家的"无我论"强调"宇宙精神"的唯心主义实质之外，也应该看到儒学的这种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提倡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这对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很有影响。

《讲堂录》中还很强调理想的意义，但是，在对于理想与事实关系的看法上，又一次反映出唯心主义的基本倾向。其中说："理想者，事实之母也。"而且强调"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在这里，提倡人要

①毛泽东《讲堂录》。本节中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文。

"高尚其理想"是对的，而且认为理想能指导行动也是对的。但是，把"理想"对于"事实"的派生地位，作了颠倒。理想绝非空想。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符合客观规律，不仅能够而且必然实现者为理想。脱离或违反客观规律，根本不能实现者为空想。而当时的毛泽东却认为理想是"事实之母"，这恰恰反映在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上，他是站在唯心主义一边的。

同对于精神产生本原的不恰当认识相适应的是认为精神永存。这一时期，他明白地表述了"灵魂不死"的思想，"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①

与这种片面夸大精神力量相联系的是在社会历史观上表现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片面夸大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讲堂录》中，在谈到王船山、孔子、孟子之主张后，提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以什么人作为自己的楷模，常常是可以窥见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毛泽东当时以"承三圣者"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表现了青年人的雄心大志，也表现了世界观的基本倾向，即以"定人心"为第一要义。

第二，《讲堂录》中具有辩证法因素。

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且不仅是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其中包含着质的变化，这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基本界限之一。从这个观点去考察《讲堂录》，应该说它是包含着辩证法因素的。《讲堂录》承认事物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认为"天下事物，万变不穷。"而且，这里所讲的变化，不是一

---

①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16年。

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而是一种前进的运动。其中说："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

当时，年轻的毛泽东，还不具备量变引起质变的鲜明的辩证法思想，但是，认为量的积累，在事物变化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已有披露。《讲堂录》中形象地提出："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之学问，珠积寸累而得知。"

但对变化从何而来，毛泽东则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在《讲堂录》中，还看不出毛泽东此时已经具有了一以贯之的关于事物的矛盾观念。而且他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且说这种"并行不悖"的道理，应该成为"庶几道往之理想矣。"如仅从这点看，倒有些无矛盾的和谐的倾向了。但是，《讲堂录》在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同时，还谈到事物"相生相克"的思想，其中有："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

从上可见，"讲堂录"中的思想是有些紊乱的，辩证法思想和非辩证法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但其中确有辩证法因素，这也是事实。

另外，《讲堂录》中关于时间连续性的思想，把"现在"作为连续昨天和未来的环节，并提出"重现在"。"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已）（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

据惟目前（通今）。”毛泽东的“无我”思想后来有变化，但《讲堂录》中并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这里的“贵我”思想和“无我”思想，不是相互冲突的。“无我”是相对于“大我”即宇宙精神来说的，认为后者长存，前者为个体生存，较为短暂。所谓“贵我”的含义是不责人，遇事反求于已。而这里讲的“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又有夸大个人作用的成份。在对待“我”的问题上，此时，毛泽东思想中有模糊之处，是无疑的。当分析《讲堂录》中的历史观时，我们还将看到这一点。

第三，在知与行的问题上《讲堂录》中反映了相当多的合理思想。

哲学上的知和行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一个反复被提出、而哲学家们也一再试图给予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讲堂录》中，很强调行的重要性，反对说与做脱节，认为谨言慎行即是学，古之为学重在行事，只有从行中才能获取知识，“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讲堂录》极力反对空谈，提出：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好。应当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讲堂录》认为，“懒惰为万恶之渊薮”，“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应该说，强调行，做事，奋斗，是《讲堂录》的突出特点。

同这种对于“行”的价值的积极估价相联系的是，《讲堂录》中的思想态势，是强调“求实”精神，“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讲堂录》一书，将“务实”、“求实精神”提到转移“世风”，即改变

社会风气要义的高度来认识，这是颇有见识的。《讲堂录》中还萌发着要作实际的调查研究的思想。“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在提倡重视行、重做事等的同时，《讲堂录》中并没有忽视知的作用，很提倡勤于思考。“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从《讲堂录》来看，对于认识过程中“知觉”的作用，流露了有一定深度的认识，认为“知觉”有由此及彼的推理作用。“知觉类化，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人的知觉之所以有如此的推理作用，是因为宇宙内部事物有其相通之处。“万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即“知觉”能把握万象相通的“类”的共同点，也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讲堂录》中还很重视学以致用。其中谈到，选读古籍或选读古文，以切时令为贵，“读史必重近世”。年轻的毛泽东，其思想高度已达到了重现实，古今之比，重“近世”，要求学以致用，去旧出新。

第四，《讲堂录》表现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讲堂录》中所阐明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史观，其主要表现是：崇尚圣贤，片面夸大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认为他们的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声言“圣人者之道……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而且认为，“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哉。”作为邦，即国家，需要有它所信守和提倡的“道”，这是无疑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统治思想。但是，任何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阶级不同则统治之“道”亦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因此，绝没有对于一切国家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

从空间上讲，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从时间上讲，也不会有什么“百世而不惑”的“道”。再正确的思想，也要发展。可见，《讲堂录》的上述说法，反映了对圣贤等少数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盲目崇拜，还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束缚。

在伦理观上，《讲堂录》中所反映出的是当时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的伦理观念。比如，只讲爱，不讲恨；只讲爱人，不讲向统治阶级作斗争。讲“恨”也只能恨自己。认为：“恨有二面，恨己则可，恨人则不可也。”《讲堂录》还提倡仁义礼智信，认为“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心民意之类。”仁义礼智信，这是封建社会所提倡的伦理观念。对这五个字的内涵，历代学者都作过很多阐述，但中心要义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重点在于要求于臣民，而不在统治者自身。作为统治阶级，他们所处的剥削压迫劳动群众的特定的经济地位，使其根本不可能作到这一点。提倡这一切自然是虚伪的，有适应其统治需要的独特的意义与目的。可是，年轻时代的毛泽东，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根本道理，而错误地认为只要向圣贤学习便可以实现这一伦理观念，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以贤圣为祈响，而孝义廉耻即生焉。”这说明他当时的认识还是天真幼稚的，还没有掌握认识事物本质的科学观点。

青年毛泽东充满着革命激情，以献身救国救民为理想，因而很自然地推崇中国历史上那些胸怀“大公”，为国而不惜舍家舍身的人物。如《讲堂录》中很称道殷朝的宰相伊尹。说：“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讲堂录》中很称颂毒蛇螫手、壮士断腕的精神，认为仁人者非不爱腕，只是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彼仁人者，以天

下万世为身，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才得安宁。他以壮士断腕的事例，生动地表达了为大局之利益可以舍去身家的决心。

在伦理观上,《讲堂录》中有一种重义轻利的倾向，没有辩证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圣人不讲物质利益，只讲精神上的满足。“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这种观念，对毛泽东后来有很大影响，第一师范毕业后，欲在岳麓山下搞新村试验，有时每天只吃一顿饭，还坚持社会活动，以及游泳、锻炼、学习等等。

当然，关于义和利的关系，《讲堂录》中声明这种绝对对立是就一定意义来讲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并非凡士人均不贵谋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这就是说“温饱”还是不能不谋的，但一个人的理想不能在此，更不应对衣食有过分的讲究。一个人应有更高的志气。这一看法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给黎锦熙等人的信及文章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对某些问题的合理思考

在1915年至1917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等人的信和文章中，还依然表现着与1914年的《讲堂录》十分一致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但同时也具有某些辩证法合理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宇宙本源的认识是唯心主义的。

心与物，何者为第一性的，谁为本原，谁是派生的？关于

这个划分哲学阵线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当时的回答，从总体上看还是站在唯心主义一方面的。1917年8月，他在给自己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须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这段话如果是从欲改造中国和世界，必须先从宣传入手的角度来看，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超过了这个界限，而认为人心是大本大源，就不妥当了。这也说明他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真理。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人们对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如实反映，而他却认为真理产生于人心之中。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毛泽东因此认为，改造世界，必须号召人心，"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认为只要天下人心一动，天下事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很类似于中国自古流传的"人心齐，泰山移"一类传统的说法。这种说法不能说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但它表述的只是事物发展一定阶段的现象，而并非事物的本源。因为从根本上说：其一，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关系，而非人心。人的心理状态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的；其二，只有当经济发展需要时，才会产生人心的普遍要求。当客观物质条件不具备，社会无需要时，仅靠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是动不起来的；其三，只有当具备社会变革或自然变革的客观形势时，人心才能动作起来。只看到人心动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背后更深刻的经济动因，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这一点上，

唯物主义高于唯心主义。

当时毛泽东把人心当作大本大源，认为只要有杰出人物去改造哲学、伦理学，并借以去变动人心，社会变革即可实现。在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① 以"心"为大本大源去观察历史，便自然而然地步入了英雄史观。以为只要创造出一种什么新的哲学理论，就可以"大纛一张，万夫走集"，而且有"沛乎不可御矣"的效果，这显然是过份地夸大了思想理论的作用。

当然，毛泽东也正确地看到，中国旧社会旧的积习太深，不是以改良其旧所能奏效的，而是需要花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什么，要依靠谁？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从这一时期的书信来看，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当时他只看到，要改造中国靠作些枝节的改良是不行的，"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杂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② 在他看来，这种背道而驰必然会带来很坏的恶果，以致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局没有毫末富强幸福之可言。这里表现出毛泽东要求对中国问题作一根本解决的宏大气概和探求根本解决方法的强烈要求，这也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大多数青年人的地方。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对于既不背离"本源"，又能根本解决之"道"是什么，当时毛泽东尚未找出明确答案。

---

①②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17年。

第二，肯定事物处于不断运动之中。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批判了道家的“无动为大”的思想，主张动，表明了一种素朴的辩证法因素。文章指出，历史上有些人是主张静的。“朱子主敬，陆子主静，敬静也……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毛泽东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动的，反对鄙视运动。“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他认为运动有承续性，有一定的“道”即规律。“动必有道”，“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①他在文章中虽然指出世界是运动的，而且这种运动“必有道”，即受一定规律的支配，但对这种“道”是什么？则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

第三，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关于认识问题，毛泽东早在1917年夏为“一切入一”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表示，人的认识，人的智慧是无限的。虽然，他还没有认识到个人认识的有限和人类认识无限的统一，谈不上懂得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但是，比起形而上学的那种把人类认识看作是有限的错误观念，要有更大的合理性。

“一切入一”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肖子升为自己所订的一个学习笔记本所起的名称。他请毛泽东在扉页上题词。毛泽东应允，且写成了短序。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继承和发挥了庄子的学说，在短序中，毛泽东自己也谈到这一点。他说：“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年轻的毛

①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

泽东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概否定，而能继承其中某些优秀传统，应该说也是十分可贵的。

在谈到人的智慧无涯，即无限性后，本文又进一步作了解释，指出为什么是这样？回答是，这同人类的奋斗有关系。“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奋斗，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那么，人们都一样地去探索知识，为什么所得却有不同呢？文中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且作了回答：“顾究诘也同，而有获而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作者认为，关键是能不能自觉地积累知识。他认为，经过一点一滴量的积累，一定时候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一家所特有的学说。作者形象地比喻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从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其思想中具有辩证法的因素。

第四，对于社会变革的看法有了某些新的变化。

腐败的中国封建的旧制度，发展到二十世纪初，社会问题已“成堆如麻”，怎样改变这种状况？一种办法是零碎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另一种办法是从根本上来个彻底解决，即推翻旧制度。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曾对于零碎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提出过怀疑。认为变法，从枝节入手，不求其本源，“为不贯气，为支杂灭裂。”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贯气”，什么是自然的贯例？他认为社会改造避免不了大的动乱。历史的走向是一治一乱，变动不已，长治之安，或一个王朝永不衰败的统治，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肖子升的信中说，旧王朝数千年的统治，其成

败盛衰之迹还少吗？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是为前车之鉴！他还预言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在毛泽东后来留下的文字中，也一再阐发上述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他认为一治一乱的变化，是自然的惯例即常规。“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①在他看来，不能把乱都视为坏事，一治即有一乱，乱也是历史生活必经的一个过程或阶段，因而也就有其实际之价值。

在谈到社会变革问题时，还涉及到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看法。针对当时“全盘西化”与“复古”主义思潮的争论，毛泽东对于两种主张都持否定的态度，反对“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②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提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也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里，虽然有对东方思想缺乏分析的片面性的错误，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实际生活”，但却提出了对东西思想都要进行改造的进步主张，即对处于两个时代，即封建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都认为有改造的必要。故然，对于这两种文化该肯定的东西，作者的信中没有表示出认同，这表明年轻的毛泽东认识上的不足。

第二节　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二元论思想

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后期，已不满足于传统文化

①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

②1917年8月23日张昆弟日记。

给予他的从“人心”的变动上寻找“大本大源”的观念，于是，他开始面向物质生活，面向西方和苏俄，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此，他于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地阅读了杨昌济先生开设伦理学课程所指定的教材《伦理学原理》，并在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原书十万字左右。这是一部以二元论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论述伦理学为主要内容的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对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撰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带有明显的二元论思想倾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混杂在一起。《批语》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一个过渡阶段。

一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

在精神与物质何者第一性问题上，《批语》的回答具有明显的二元论倾向。《批语》一方面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又不把人的意志、良心等心理因素，看作对于一定的客观环境的反映，而认为是产生于一种内在的冲动。这显然不是唯心论的一元论。因为唯心论的一元论，只承认意识等心理因素为一切的本源，不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和客观存在。但这也不是唯物论的一元论，因为它不认为人的意志等心理因素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承认它的客观本源．而认为存在着独立的精神本源，即内心的冲动。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在《批语》中曾反复出现。比如说：“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自然者真也实在也”。很明显，这

是承认自然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唯物主义因素，即素朴的唯物论思想成分。但是，一旦谈到“意志”、“良心”同客观自然界的关系时，这种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便被扭曲了。《批语》中谈到：“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那么，为什么有些意志看起来会不一致呢？作者不认为这是由于客观物质环境造成的，而是认为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对于产生于冲动的意志，进行了节制。《批语》提出，我们的各种动作固然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终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并非反对。泡尔生的唯心主义的典型特点是主张生命冲动说，上述观点正是这种学说的反映。

“批语”中的二元论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十分明显，但是，作者当时并不十分自觉。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不能说这时的毛泽东为二元论者，只能说思想上具有二元论的内容。这是不无道理的。《〈伦理学原理〉批语》表明了年轻的毛泽东在回答世界本原的问题时，既认为是物质，又认为是意识；既认为是实在，又认为是观念，颇多地反映了二元论的主张。但是，他的有些看法，与哲学史上把物质与意识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有两个独立的本原的二元论，并不完全一致。他有时还把二者混为一谈，说什么“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

当然，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比起过去的文章、书信，表现了更多的唯物主义倾向，比如其中谈到“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把精神理解为来之自然，并受“实体”所制约，即“限于实体”，很明显这是唯物论的倾向。

《〈伦理学原理〉批语》还承认自然法则，肯定物质不灭的

思想。在谈到许多问题时，明确地肯定自然法则（即规律）的客观存在。这是其中的重要的唯物主义因素。例如，在谈到人类的生死问题时，认为“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者。”《批语》中还进而谈到，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可见，作者认为，人是愿意按着必然法则办事的，也能“成就其必然”。

这种看法同前一阶段有很大改变，已不象《讲堂录》中把人类个体（即“小我”）的存在，看作“大我”，即“宇宙精神”存在的结果，而把人看作是物质的存在，并且也不再认为这种个体存在受宇宙精神的摆布，相反地，认为它是受一种物质力量，即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在这种自然法则的支配下，人和一切物质世界，有生有死，有成有毁。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物质世界的变化，以及新陈代谢。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没能够以“新陈代谢”这一科学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这种观念，应当说已有披露。同时，毛泽东还看到人们不是盲目地受自然法则支配，作必然性的奴隶，而是有自已的意愿即意识，愿意服从自然，而不愿意违反自然。这反映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人们对必然性的某些尊重。同时，又认为人在自然法则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他愿意“成就必然”，也能够成就必然，即实现必然法则。这种思想，在当时看来，是比较深刻的。

承认“物质不灭”的思想，是《批语》中的突出特点。在读《伦理学原理》中的《论生死》一节时，毛泽东写下的批语反映出他从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已达到的水平中总结出的一个科学观点，即物质不灭的思想。但是，他是以泡尔生所宣传的哲学上的二元论，即物质精神同时不灭的思想来解释这一理论

的。《批语》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指出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的肉体和精神"非绝对相离之二物"，这是对的，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这里有一个物质与意识，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批语"中却没有能够正确回答。肉体，这种客观的物质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而没有思想，即"灵魂"也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活人。但二者从本源上看，并不是等同的。物质的肉体是第一性，是精神的载体。人的一切精神现象，意识成果，都是作为这个载体的一部分，即肉体的物质器官——大脑，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映。人死了，但作为物质只是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因此可以称之为"物质不灭"。但作为肉体的载体消失了，作为那个物体机能而存在"精神世界"，即灵魂也随之消失。因此，灵魂是不可能不灭的。"灵魂不死"的观念是原始的愚昧的观念，近代又以"精神不灭"的形式出现了，且为年轻的毛泽东所接受。当然，他所谈到的"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是正确的。因为，在客观上二者具有统一性，确实不能将它们绝对对立起来。然而，毛泽东在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二者"非绝对相离"时，看法出了偏颇。他说这是因为二者"其实即一物也"，从而完全抹煞了二者所存在的区别。事实上，二者之所以并非绝对对立，是因为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一个是反映者，一个是被反映者。反映与被反映者的内容是同一的。正如列宁所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① 可以说，毛泽东当时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148页。

还不懂得这种深刻的哲理。

关于"物质不灭"的自然科学道理，毛泽东理解为它反映了事物的变化。这同人们通常讲的物质不灭和相互转化的思想，是比较接近的。比如《批语》中说，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生死也皆变化。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上面的表述，作为对物质不灭思想的认同，从物质不灭的角度来讲，认为物没有生灭成毁，只有互相转化"成于此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是有其一定道理的。然而，这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总概念的物质来说的。作为物质现象每一个个体存在来说，还是有"生灭成毁"的。即每一物体的存在，同整个物质世界的存在，有联系又有区别。这反映了物质世界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对立统一。所以《批语》中关于"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的说法，深究起来，不甚妥切，不够科学。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前进的，但就每一步来说，又有其局限性。

有关时空问题，《〈伦理学原理〉批语》把时间空间看作是直觉的形式，而不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这显然反映了康德哲学的影响。首先是否认时间的客观实在性。这是《伦理学原理》和《批语》中都曾表明的观念。《原理》中提出："时间者非现实存在形式，而吾人感官直觉之形式也。""吾人之意识与此直觉之形式结合，而后现为时间之经历。"毛泽东在《批语》中，对于这一点企图作些正确的发挥，但发挥得并不确切，只是反映了部分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即把时间观念看作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吾意时间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设

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则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这是比较正确的看法，即认为时间观念来自地球之绕日而行的客观事实。但是，他一转笔又否定了时间的客观存在，只承认空间，认为“此可证明本无所谓时间，地球之绕日但为空间之运动也。”虽然年轻的毛泽东只承认空间的客观性，而不承认时间的客观性，但还主张时间意识必立其根本于实在意识，而后可以说明其发生及存在，即时间观念的产生首先来自对客观存在的承认，即“根本于实在意识”。这是正确的。

关于时间问题，《批语》中还有些可贵的思想。《批语》以中国的传统语言，清楚地表明，时间不能停留，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它的变化反映了现实的变化。《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原文说：“凡事物有限者皆无常”即有限的事物不是永久存在的。“互永劫而不失其现实性者，惟无限之实体而已。”即无限之实体，才是现实的，永恒的。毛泽东对上述议论的“批语”是：“只必然无常，而有常，此有限之内容终不能灭也。”这段话前两句是对的，后一句不妥切，但却在努力说明有限和无限的关系，认为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即无常的内容，又是“有常”，即现实的存在。后一句是说，就这个意义讲，“有限之内容”是永远存在，“终不能灭”的，这当然是把无限与有限混为一谈了。《批语》中还谈到：“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这里，正确地指出时间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虽然没有把时间提到“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的高度来认识，然而，却正确地看到时间同客观实在的关系。把时间看作是一片的，过去与未来都是“今人强分”的，说明他当时还不懂得时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毕竟是正确地看到了“一片之时间”中

的生活，都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这一点同他提倡“务实”精神有密切联系。

《〈伦理学原理〉批语》还提出了人与自然界、物质与意识的交互作用的思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哲学必然给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批语》中对此问题作了较好的回答。“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这里，毛泽东把自然放在第一位，肯定人要受自然“规定”，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同时并不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无能为力的。明确指出，影响是双向的，“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虽有强弱之不同，但互相影响，这就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因素。

对于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智力是怎样发展的问题，《批语》的回答也较前一时期有进步，明显地提出人类知识来自外部客观世界。他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知得此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而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则对上述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印证，提出“夫知识之事，认识时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①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在《批语》中强调“务实”，强调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事实，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

---

①《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第5页。

之责者，吾不信也。”上面的“批语”，强调重视现实是对的，但不重视历史的连续性，不承认现实的人有“继往开来”的责任，这表现了年轻的毛泽东当时的哲学观念，还很不成熟，有相当大的片面性。

《批语》中虽然已经有一些唯物主义因素，但唯心主义的东西也不少。这种唯心主义成分还突出地表现在唯我论方面。毛泽东同意泡尔生的如下议论，即“如何为人所喜，如何而于人有益，余所不顾也，余为精进而已”。对于此类充满唯意志论精神的警句，毛泽东不仅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作了发挥。《批语》说：“此节议论透切之至，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者，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表彰自我之能力也”，“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心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从上可见，《〈伦理学原理〉批语》既有唯物主义因素，也有唯心主义的成份，二者交互杂处，说明作者当时的世界观尚未定型，正处于过渡阶段。

二　知、信、行“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于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的特有表述，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也正是以知行关系来论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从《批语》的内容来看，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实践第一的道理。他认为，“夫知者，信之先也，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这里，他不仅把知、信、行三者并列，统称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而且实际上把知放在了首要位置。联系到他

在同一时期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他在该文中说："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这就更可证明，毛泽东当时是主张知先行后，是把知放到第一位的。此时，他对知行关系的复杂性还缺乏深入了解，还不懂得从总体上看，行先于知，有了实践经验的积累，才可能产生知识；而作为每个人的具体知行过程来说，往往是先学而后行，先有"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然后去实践。对于这种知行的辩证关系，显然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了解和掌握。

作为知与行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即人类经验，毛泽东当时是怎样认识的呢？从《批语》来看，他承认后天经验，认为人的认识是后天的，不赞成先验论。应该说，与青年毛泽东原来把心当作宇宙大本大源的观点相比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对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种否定。《批语》中承认"良知"、"良能"，但是，并不认为这是先天的，而是认为得自前人的经验，"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批语》还特别解释了良能的由来："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也，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既然认为良能来自于祖先"多代相传之经验"，形成为"社会之习惯"，从而养成人之"反射运动"，那么，这种"良能"，只能是人们的后天经验。《批语》还指出："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而得之，似为构成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此段批语直接了当地批评圣人生而知之的传说不可信，这对于当时一个省城的师范学生来

说，确实是大胆而又可贵的，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当然，也应该指出，此时的毛泽东在谈到知识的来源时，确实否定了先验论，但是，在谈到人的本性时，思想上又有向先验论观念回归的现象。比如，他相信人有天生的本性："豪杰之士发展其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批语》否认外因的作用，认为"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那么，这种本性中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依据泡尔生的生命冲动说作了回答，说："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可见，毛泽东在当时还不能完全摆脱泡尔生的生命冲动说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认为英雄豪杰具有"得于天之本性"。

在"知"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毛泽东当时否定价值真理观，强调真理的客观意义。《批语》强调客观真理的因素，而不赞成以主观的价值观念去评定某种"见解"是否为真理。《伦理学原理》一书中说："吾等之疑问在快乐论之见解果为真理与否，而不在其有无价值是也。"在这段话的上面，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批语："此言至切，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所谓"天然本质"是区别于后天人为的。主张要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是指从客观世界中求真理，寻出真理中的"天然"内容。尽管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天然"，还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但强调真理的"天然本质"较之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真理论，无疑是一个进步。这种强调并不意味要否定真理的价值，只是认为"有无价值抑其次也"。反对依据对"人事"的价值大小，来判定真理与否，是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否定。这种认识有社会意义。因为掠夺对

于掠夺者来说有价值，但并不是真理。在哲学上否定价值真理论，对于社会现实的变革来说，便于找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

有关理性认识的意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毛泽东是提倡学习理论，强调知识之作用的。他说："所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这里所说的"人心"，大体上相当于今日所用的"思想"。认为知识"大有影响于人心"，肯定人类之进步革命，都要靠新知识的指导，这当然都是对的。但这种正确的认识又是不彻底的。因为，《批语》认为这种知识对于指导人的行动，只能起一半的作用。另一半是什么呢？是"感情及良心"。而"感情及良心"从何而来？作者认为是来自知识以外的内心冲动。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毛泽东对知识和理论作用认识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当时他并没有从哲理上懂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精神的创造力量。对于《原理》一书的下述主张即"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力"的说法，《批语》不但表示"吾极主此说"，而且发挥说："种种著述皆不过钩通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著（作）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有）丝毫之创作哉？"这种说法，和毛泽东忧国忧民，渴望革命的本性相矛盾。它不能不给万事万物皆由造物主所安排，人只能按照上帝的意思行动，而不能有所创造的宗教思想，留下了余地。

三、“生死是对立统一，是有机界的必然现象”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期就有着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这就促使他能够较为深刻地去观察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变化，因而也就使他产生了较多的素朴的辩证法观念。这一情况，在《批语》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对于事物变化的原因，年轻的毛泽东虽然当时还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的深刻认识，然而已有了初步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一书中，已明确提到“对立统一”的概念。在读第四节“论生死”部分时，《批语》指出：“生死是对立统一，是有机界的必然现象。”《批语》强调事物的差别，强调“比较”的意义，反对佛学泯灭差别的观点，认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差别，不知其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批语》认为，世界万物均存在着差别或矛盾，如阴阳、上下，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无差别便不能构成历史，不能有社会的进化。《批语》还指出进化便是差别的更替，即新旧更替。“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也。”

《批语》还认为世界上“一切之事业与文明”，都是起于对抗双方的冲突与决一胜负的结果，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阐述上也有把斗争绝对化的偏颇。如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中谈到：“世界上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对于这种承认事物对立双方之存在，承认现实的即“非仙境”的矛盾的看法，《批语》形象地发挥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即认为事物在

发展过程中凡遇有阻力，就必然出现反对阻力的更大的矛盾力量。毛泽东还认为，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会愈来愈大，而不认为随着人对自然力的征服，使其会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关于人与自然等外界矛盾，泡尔生认为，随着人类力量的增强，外部势力会日益削弱。“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而毛泽东则认为，“此不然，盖人类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

从《批语》来看，已萌发有对立面的冲突是事物生存发展动力的思想。如在谈到抵抗和动力，障碍和幸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时，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曾谈到：“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他认为没有对立，就没有动力。“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对于这种观点，毛泽东极为赞赏，他在《批语》中说：“至真之理，至切之言。”

从上可见《批语》中确具有较多的辩证法思想因素，不过也应当看到当时他所具有的辩证法观念还是初步的，不彻底的，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如有时认为现实中存在着的矛盾双方，是相互对立、冲突，即“对抗”的，而看不到相互间的联系与渗透；有时又把二者简单地合而为一，看不见它们的差别与对立。比如说：“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如果，从一定意义来讲，比如从对立面的转化来讲，这些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变为自己的对方。但是，离开转化，不讲条件地把对立双方看作“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便把对立双方的同一性绝对化了。比如，实在可以被认识，即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观念，也就是物质变精神，反过来精神也可

以变物质，但这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离开条件讲“观念即实在”，将会引入唯心论。同样，“实在即观念”的命题，也可以被引入将唯物论庸俗化的境地。

概念上的差别，是事实上所存在的差别的反映。对于这种反映论的原理，作为二元论者的泡尔生是不承认的。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曾谈到："伦理学家误以概念之区别为事实之区别。”对此毛泽东未予纠正，在《批语》中还随同说：“事实本无区别，而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这说明他和泡尔生一样，不懂得唯物论反映的原理。应当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正确地看到了人们概念中的差别或矛盾。但他还不能对此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不懂得这些矛盾与差别产生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认为，这一切都不过是由于人类精神本身差别产生的。这也说明了毛泽东世界观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批语》说：“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

人们概念中的差别究竟是怎样来的？毛泽东认为：“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限界，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如果孤立地说，人们认识事物之所以有差别，“生于有限界”，个人皆有局限，这似乎是对的。问题在于这种“限界”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里有一个原则区别。而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是强调人的主观、思想、能力、活动等，他还不懂得人类概念中的每一差异，都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差别的反映。“差别之世界之成矣”，不是由于人们思维“划分”的结果，恰恰相反，概念的辩证法正是客观世界辩证法的反映。

四　“观念造成文明”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泡尔生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社会历史观虽有某些唯物主义成分，但从总体上说，同当时的许多进步分子一样，仍然停留在进化论阶段，他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与人生的。这一情况，在《批语》中有着明显的表现。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盖进化论者，以一切人事，尽自然之势而发展之”。毛泽东在这段话下面的批语是：“此说甚然，一切人事悉自然也。”他在另一段批语中还说：“国民之生活，若政治者若言语，皆人类进化以后之事，起源之时固不如是也。”

这两段批语中表明的进化论倾向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是否凡承认进化论者皆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恐怕难以作出这样简单的答案。因为，承认进化论并不等于已经弄清楚了进步的根本动因。而由于对这个根本动因回答的不同，同样可以有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根本区别。那么，当时的毛泽东是如何回答这个根本动因的呢？《批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豪杰之士发展其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而伟大的杰出本性，又是来自何处呢？毛泽东认为是来自内在的冲动，“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此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豪杰之士有一种“至伟至大之力”，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而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他认为来自人的本性，是一种内在的“自然之冲动”。对于为什么有的人会有这种内在的冲动，而很多人又没有？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回答。但可能的回答，只好求助于天了。他不懂豪杰的行为，成败与否，是受客

观条件制约的。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明显不过地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历史观并没有摆脱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范畴。

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不了解社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地位，以及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相一致的。这同不能正确回答历史领域的基本问题有关。

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毛泽东当时还不能正确作出回答。他还不懂得二者相互间的正确关系，特别是不懂得客观的社会物质生活的最终决定作用。

当然，他承认客观生活的存在，比起当时一些主张唯心史观的人，这是一个进步。当读到："游戏也，学问也……创作也，皆人之所欲也，"对此，《批语》进一步发挥说"此等皆所谓客观之生活内容。"但是，此种"客观之生活内容"是什么？是否包括最终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容呢？毛泽东还是不明确的。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批语》不能以物质的力量作解释，而只能以观念的力量去说明。《伦理学原理》一书认为人类文明历史皆"观念之所以管辖也"；《批语》则赞同说："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就使他在历史观上前进了一步，承认存在"客观之生活内容"之后，又倒退了一大步，把"观念"看作是"造成文明"的根本动力，而且用两个"诚然"，作双倍的肯定。这一情况表明，青年毛泽东虽然作了探索的努力，但依然是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框子里打圈圈。

能够说明毛泽东在历史观上基本的唯心主义倾向的，还有《批语》中所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念。

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德规律。一切以往的道德规范、信条、理论、规律，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

况的产物。而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作辩护，或者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但是，当毛泽东读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时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不懂得社会存在阶级，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到，在阶级社会，要联系人们的社会阶级利益，来看伦理道德问题。他把道德区分为客观的道德律和主观的道德律，并认为，“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意思是说，客观的道德律是在同别人发生关系时，“待人而有者”；主观的道德律则是指在不同别人发在关系时，“独立所有者。”毛泽东认为，“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之所以对道德律作这种脱离社会物质生活的解释，主要是和毛泽东的基本唯心主义立场相一致的。他认为，“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这里，颇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意味，强调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因此，毛泽东不仅由此区分了客观道德律和主观道德律，而且认为客观道德律也是主观道德律，“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可见，青年毛泽东认为，个人所具有的道德观念，不是为了调整自己同别人的关系，而是为了自我精神完善，即“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这样就把道德这一表达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范畴，完全变成了人们为追求自我精神完善的纯主观的范畴了。这里残留着中国儒家传统的讲究“修身”、“慎独”的影响。

什么是“善”与“恶”？这是伦理学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肯定了泡尔生下列主张，即“凡人之动作自客观界言之，能增进人我之幸福，自主观界言之又有自尽其义务之意识，则道德界之所谓善也，反之则为邪恶。毛泽东对泡尔生的这一思想的批注是“数语乃泡尔生主义之真面目，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在泡尔生生存的年代和社会中，存在的是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各阶级之间不可能有统一的利益和道德，不可能有统一的善恶观。因此，他所提倡的既有利于别人又有利于自己，能够同时“增进人我之幸福”的道德观念完全离开了阶级对立存在的社会现实，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主观空想。可是，毛泽东却表示了肯定，并给予赞扬。

这种“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的思想，说明毛泽东考虑善恶问题时，虽然已开始突破“人本性善”或“人本性恶”的先验论的旧的传统伦理观念，开始考虑到每人行为对他人的客观意义。但是，还不能联系社会阶级关系来观察伦理道德问题。这就是说，他在善与恶的问题上，既有前进，又有局限。

在这个认识前进的基础上，他指出伦理道德同社会生活的一定关系，反对提倡超然的善恶。提出“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因为，要考虑到此等道德行为对己对他人的意义，所以，《＜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提倡“道德意识”，而反对无意识的盲目的道德行为，这个思想至今还有意义。毛泽东在《批语》中申明“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这就是说，人要自觉地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批语》还指出：“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等等。能否根据上述引证，得出毛泽东在《批语》中已经

明确地提出了以“事实标准”分辨善恶呢?当然不能。因为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并不是“以事实为标准”的问题，而是又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即“主客观皆满足”。其中“客观满足”即对别人行善，这可见诸事实；“主观满足”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自己有“为善”的行为，精神上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在判明善恶时，自己坚持善念，这不一定见诸于事实，但在主观上即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满足。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其中的“实践”即行动，是说人要将行善作为义务，而并未提到“以事实为标准”评价善恶的问题。从上述情形来看，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分辨善恶的标准实际上是两条，而不是一条，即一是“以事实为标准”，二是以“主观客观皆满足”为标准，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说明他在从多方面思索评价善恶的标准问题。虽然当时尚未找到“以实践为标准”分辨善恶的正确答案，但是，这两条标准中，都有接近这一标准的朦胧意识，而前者同“以实践为标准”的观念更接近些。

毛泽东当时虽然未能提出评判善恶的实践标准，但能够初步地即使朦胧地意识到“以事实为标准”来判断善恶，已是难能可贵了。而且他反复强调，判断一个人言行的善恶，绝不能根据流传，而要看事实。同时，又提出对于历史上留名的人物的道德行为，也要作分析，重要的是看事实。“吾重在当时为善恶之事而已”，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也就是说，对于历史上流传的人物，不能盲目“欣赏”，而要以事实去断定。应该说，青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社会上流传下来的以帝王将相的功名利禄为主体的统治阶级的史书、文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

里有对其中的人物重新审视、再评价的成分，要求以事实判断历史人物的善恶，表明了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批判战斗精神，这同“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已有某些接近。

环境能锻炼人，能影响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这种思想，也反映了《伦理学原理》一书及《批语》中的唯物论因素。泡尔生在《原理》一书中谈到：“不幸之境遇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最高尚之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殆未有能完成者。”毛泽东对这段议论，认为是“振聋发聩之言”。

在谈到道德的善与恶的“对立统一”时，毛泽东对于传统伦理学所主张的圣人具有“生而知之”的善念的先验论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伦理学原理》一书肯定了善与恶有对立统一关系。认为“故恶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己之原质者也。”《批语》除对泡尔生的这种主张善与恶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观点表示赞同外，还进一步从认识论上作了引伸和发挥，提出：“所谓圣人者生而知之，是不可信的，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很显然，这里否定了圣人的观念得自先天的“先验论”，认为圣人之“善”是后天在与“恶”斗争中而获得的。

对于“恶”要作历史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加以否定，这种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在《批语》中，也有所披露。其中谈到：“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具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比例于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这就是说，对于

"恶"，在历史上，也不能笼统地一概否定。"在一时候"其"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但在另一时候，即在另一种时间与条件下，"不能谓无价值"。这种思想，比较深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恶"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时，曾谈到剥削、压榨虽然是一种罪恶，但它对于原始社会来讲，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也是历史的进步。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已经表露了否定宗教的无神论倾向。当然，他并不是以无神论者的面貌出现的，而是对"神"作出与习惯说法不同的新的解释。他说："（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本体或名之曰神""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神乎？"。这里的无神论倾向表现为：首先，他认为神是一切的本体，但并没有把它神秘化，而把神等同于人类；其次，认为主宰一切的不是神，而是人自己。《批语》中还谈到："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这似乎承认了一个与人类有直接关系的"本体"，即神的存在。但是，毛泽东对这个"神"有特殊理解。在泡尔生关于"一切事物皆属于神也，即皆属于人类也"的一段话下面，毛泽东批为"诚然,诚然"。再次，他反对把道德说成是神的命令，主张服从神不如服从人类自己。在读到泡尔生的著作关于不同意道德律出于神的命令的看法时，毛泽东表示赞同："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以奴之心理也。"批评了这种看法后，他十分强调"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事物之活动，事物自我活动而已。"显然，这是以人代替了神，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表现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和他同时代的诸多的反封建的志士仁人一样，反对封建的三纲五常，提倡个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他认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但是，毛泽东也和当时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提倡这一切都是在肯定“个人主义”的总题目下作文章的。《批语》中说：“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为实现“个人主义”即消除“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的罪恶，“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

在肯定个人主义的总题目下，提倡尊重个人，提倡个性解放，宣传个人存在的价值。这在当时不是毛泽东独有的作法，而是在辛亥革命后，引进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潮向封建主义冲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时代特点。当时被请到中国来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肯定个人主义有积极意义，为反封建而勇猛呐喊的斗士鲁迅曾肯定尼采所提倡的个人主义。这一情况的出现，是同长期的封建统治，压抑个人权利、个性、个人自由，剥夺别人的个人幸福等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提倡个人主义在当时对鼓舞年青的一代勇敢地冲破封建思想和习俗的罗网，勇敢地站起来面对现实，创造人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当时所说的个人主义和我们现代所讲的个人主义，在含义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的区别。从毛泽东上述批语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其中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和现在人们通常所讲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如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等，不完全一致。它含有尊重个人，承认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意思。其次，当时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同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也有相似之处，即夸大个人在

宇宙中的作用，由于过份夸大个人的价值，甚至颠倒了个人和宇宙的关系，比如《批语》中竟然提出："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甚至说："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个人也。"再次，当时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和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都排斥了"无我""利他"精神，这当然有消极作用。比如毛泽东提倡个人主义后，对过去自己的"无我论"主张，提出纠正。"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主张无我"即无宇宙"，是典型的唯我论。接着，他还进一步论证我是宇宙的中心，因而应受到尊重。"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而推之也。"这是以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想，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下面对于人权的侵犯，对人的尊严的摧残，对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害。诚然，这有积极意义。但是，把"我"膨胀为宇宙的中心的地位，"可服从者，惟我也"，这又导向对他人的存在，他人的价值，我对他人的义务，以及利他精神等等的否定。

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对个人主义思想的社会作用，也必须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当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冲破封建宗法观念束缚的时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曾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战斗武器。其积极作用曾是发挥主要作用的一面；而当面临的主要任务，已是建设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时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则会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发生腐蚀作用，而不能不引起严重的注意，花大力气去克服。因此，既不

能以今日个人主义之危害而否定七十年前个人主义之积极作用，亦不应以当日之有积极作用而否定今日对个人主义之批判。辩证的历史观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多余的。

《批语》中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也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比如，毛泽东曾提出："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他认为对于当时所流行的"自由"、"平等"、"博爱"，应加以分析。在谈到"大同"、"平安"等问题时，也反对将其绝对化，认为应该看到"大同"与"不大同"、"平安"与"不平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向往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向往平安。然而，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非人生之所堪，从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一入大同之境也，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不同之境。因此，"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从这种历史是处于变化发展的观念中，毛泽东得出了除旧布新的结论。《批语》中谈到："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必成于彼，无疑也。"上面所谈到的不能长治久安，"安"要变为"不安"，是同对社会变革的这种较为深刻的观察联系在一起的。这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腐化、苟安状态的严重不满。他期待着变化和革命，渴望通过"大革命"而使中国"涤旧""染而新之"。

第三节　毛泽东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了巨大

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最早是通过上海的《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特别是《民国日报》，在1917年的11月份，接连报导十月革命的消息。如《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11月10日）；《俄国大政变之混乱》（11月13日）；《俄国政局又有转机》（11月14日）；《俄国政局又大变动》（11月16日）；《俄国大局之混乱》（11月18日）；《俄国提出和议与乱象》（11月24日）等等。消息正式传入湖南，是1917年11月先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俄京政变记》。12月7日又刊出《俄国政变兵委会》一文。毛泽东得知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后，热心向同学们宣传。他努力组织年轻人出国勤工俭学，希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与此同时，他本人也两次赴京，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活动。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艰苦的探索，青年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而实现了早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一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18年夏和1919年底，毛泽东两次到北京。每次时间都不长，但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却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毛泽东本人也明白确认的。遗憾地是，在两次北京之行中，毛泽东留下可供分析的文字资料不多。因此，我们只能从他的活动，以及他与各方的联系中，概要地分析这种转变的过程。

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去北京是在1918年夏。1918年6月，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当时，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但还没有寻找到正确的出路，而对各种社会思潮，在选择上有所彷徨。他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

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特别是对日本武者小路的乌托邦的新村试验很是向往。所以，在一师毕业后，他设想在长沙市郊的岳麓山下，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建设他所理想的新村。后来，接到蔡和森从北京的来信，“极力敦促毛泽东同志速去北京，并在信中转告了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毛泽东同志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兼搞社会活动。”① 毛泽东听从了老师和同学的劝告，于1918年8月19日，同罗学瓒、张昆弟等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二十五人一起到了北京。不久，经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这时的北京，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一些进步报刊上已开始了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李大钊的文章对于毛泽东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介绍各种学说的书籍和报刊，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成了该会的成员。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团体很多，毛泽东热情地参加哲学学会和新闻研究会的活动。

在北大和社会上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在流行，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很有影响的一派。起初，毛泽东曾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在北大同极力提倡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学生朱谦之，还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这一段的情况时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

①参见《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91页。

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①但是，应当指出，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众多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便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1918年8月到北京，1919年3月离京去上海，4月回湖南。在这期间，由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他确如自己所说“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了。”他一直是《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热心读者。当时的《新青年》刊登了不少论述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对启发人们树立新的世界观起着某种催化作用。比如，在1919年1月15日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的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谈到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而且表示“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在同期发表的陈独秀谈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自杀的感想时，充分反映出作者早期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对于此事，不能一味指责，要作辩证的分析。同期发表的陈大齐的《恭贺新禧》一文，特别谈到宇宙无始无终，地球在太阳的周围，一刻不停地走。并且指出，凡事初创时，一定不能通行，只要有人提倡，慢慢地风行起来，未尝不可变成一种习惯。同年2月，李大钊还在《新青年》、《晨报》等杂志上发表了《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文章，着重从经济

---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128页。

关系上，说明不合理的政治统治，以及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新青年》第6卷第2号发表了陈独秀的《再问〈东方杂志〉记者》，指出鼓吹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会使精神界破产，国家灭亡。2月16日至23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晨报》上发表《祝黎明会》、《黎明日本之曙光》、《秘密外交》、《罪恶之守护者》、《青年与农村》、《死魂》、《普遍选举》、《光明与黑暗》等文。其中提出要实行革命纲领，反对倒行逆施地往死路上走，并提倡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等等。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不仅阅读报刊杂志，从中接受影响，同时，还参加北大哲学研究会等活动，并在北大旁听各种课程和名人报告。如听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等学者在北大文科大楼所作的报告，特别是以答复问题的形式，谈人生观和各种学术问题。诸如此类的哲学活动，对毛泽东寻找革命的道路、世界观的转变，都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李大钊还在北大图书馆大量扩充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供青年们学习。”①毛泽东此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了。

二　毛泽东的世界观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1919年4月回到湖南不久，就传来了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他立即积极联系各个方面，突破军阀张敬尧的控制，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动员各校罢课支援，投身到直

---

①《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第98页。

接的政治斗争中去。7月，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联会报《湘江评论》创刊。在这份激进的小报上，毛泽东写了多篇文章，包括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从北京归来后的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和哲学观点，表明他当时正处于世界观的急剧转变的过程之中。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十分重视哲学的社会作用。

在《湘江评论》第1期上，毛泽东就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介绍了北京大学的经验。他指出，北京大学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从"国学堡垒"变为新思潮的先锋，关键在于自从蔡孑民（元培）先生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以来，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正确方针，请了许多著名新派人物执教，给北大"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这里给了哲学以很高位置。同时，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些误解五四运动的论调。他引证说："或误认学生救国运动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实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① 这里把"新旧思潮之冲突"看成是五四运动之一个动因。

在1919年7月21日发刊的《湘江评论》第2号上，毛泽东的《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又从另一角度强调了哲学的社会作用。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时，说："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做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那末，德国民族是怎样的民族呢？"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

①《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第34页。

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毛泽东认为铸造德国民族的这种哲学思维，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我们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黩武，滥用强权，一面仍不免要向他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在赞尝某种特定的哲学，而是说“哲学一般”，是说一个民族要有哲学思维。德国历来被认为是具有哲学“头脑”的国度，德国民族对哲学充满了热情。所以，铸造德国民族精神的不是“三纲五常”，不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等封建伦理纲常，而是一种思辨理性。毛泽东很看重这种理性思维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在表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穷兵黩武所运用的具体“哲学”观念。因而，他把“高”都加了引号。

第二，反对尊孔，主张打破旧道统。

从《湘江评论》反映出的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即极力主张思想自由，主张打破旧道统。他认为：“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强调自由对于人类是最可贵的，“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①他反对“独断”，认为“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②主张学术自由，反对“独断态度”，主张“打破”思想界的强权，这些都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共同要求。这些文字表明毛泽东是站在进步思潮的前列

①②《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第35—36页。

的。

要思想学术自由，就不能不冲破儒家的思想罗网，就不能不反孔。“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毛泽东也是为之大声呐喊的。他说，象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他批评了推翻清封建王朝的革命者在对待孔子问题上的不彻底性，指出：“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在政治上有排满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在学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而对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①

毛泽东认为提倡尊孔、复活旧道统是一种“逆流”。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世界杂评”中曾谈到：“张元奇又说：‘什么讲求哲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尊孔逆挽潮流’。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②这里，生动地以扬子江、昆仑山为比喻，断定欲以“尊孔逆挽潮流”，是同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流向相背谬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一定要反对封建道统，对于摧毁旧的纲常名教不能惋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他以《全国没有明伦堂》为题，发表评论，批驳了康有为加给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以“侮圣灭伦”的罪名。康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③对于此事，毛泽东评论说，“难道定要留着那

①②《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

③《湘江评论》创刊号。

"'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①毛泽东认为，民国早该摧毁维系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的统治思想，可惜"民国"并未达到这一要求。

第三，提倡民众大联合，充分肯定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

旧中国腐败落后这是公认的事实。仁人志士们千方百计地寻求改造中国之方，提出种种主张，但均未能奏效。而青年毛泽东却力排众议，大声疾呼，提出"民众的大联合"的号召，确乎高人一筹。这说明在找寻根本改造中国之路方面，他已走在前列。

《湘江评论》第2号开始发表的毛泽东的著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一开头便提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②应该说，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对于年轻的毛泽东来说，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从而完成了从"无我论"和"唯我论"直到相信群体的力量，主张"民众的大联合"的重要转变。

在上面我们曾谈到，毛泽东在较长时期的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所用的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他声称"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是故，宇宙可尊者，唯我也。"③当时，毛泽东还不了解人的真正界定，极力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个人选择"，而不知道这些主张为什么在现实中总是行不通，他不了解"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①《湘江评论》创刊号。

②《湘江评论》第2号。

③《〈伦理学原理〉批语》。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显然，这时毛泽东还看不到群体的力量，只注视个人的价值、个人奋斗等等。这一情况的产生，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在追求革命真理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从强调“为我”逐渐变为强调“利他”。正是在这种积极心态的进一步发展中，后来愈益懂得了注重社会实际，突破了“个性解放”的要求，提出了“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的重要思想”② 在经历了这样一种思想演进过程之后，毛泽东终于在五四运动的群众斗争实践的推动下，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明确提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③ 他还结合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④ 文章要求先组织起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的小联合，然后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已向历史唯物主义大大靠近了。

第四，接受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改良主义影响。

从《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毛泽东认识到社会问题不能靠零碎解决。例如，他对于法英美的罢工风潮评述说：靠资本家的小恩小惠，不能解决工人阶级的困苦状况，“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⑤ 但同时他又没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

③④《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号。

⑤《湘江评论》创刊号。

有完全摆脱一点一滴改良的影响。突出的例子是毛泽东于1919年9月1日在长沙组织问题研究会。从当日发布的研究会章程看，较多地接受了胡适的“一个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章程中提出一百多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有些和胡适的提法差不多，如大总统权限问题，贞操问题，女子参政问题等等。而且，问题研究会主张它所研究的问题限于从学理上解决。这同胡适主张的从学理上对问题进行研究也很类似。章程中谈到：“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① 当然，这里也有同胡适主张不同之处。首先，不是主张少谈主义，而是提出“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并提出“特须注意研究之主义”十种，即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文学上之主义，美学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经济上之主义，法律上之主义，科学上之主义。其次，主张作实地的调查研究，提出“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②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从主张“无血革命”到摆脱这种思想的过程。在社会历史观方面，1919年7月，还没有具备暴力革命的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创刊宣言中，“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而“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③ 摆脱“无血革命”的思想，是在尔后的革命实践中完成的，其中主要是在五四运动和驱逐军阀张敬尧、以及湖南自治运动

①②《问题研究会章程》

③《中国共产党史参考资料》，党的创立时期〔上〕第415页。

等斗争实践中实现的。

第五，无政府主义影响仍明显存在。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崇拜无政府主义，在主办《湘江评论》时期，仍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其“高明之处”。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所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谈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刘师复时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①

把五个执不同主张的不同阶级代表人物并列，既说明认识之含混，也说明仍把无政府主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一直到1919年3月4日发表《民众大联合》时，毛泽东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还认为比马克思主义看得“更广，更深远”。他提出：“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从上文对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评价看，当时的毛泽东仍是较多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方面的。

毛泽东1919年3月回湖南长沙进行了半年多的实践活动之

①《湘江评论》增刊第1号。

②《湘江评论》第2号。

后，1919年12月18日，又第二次去北京。他是作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公民代表团团长”，率领代表团到京的。

当时，国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北京反映得比较集中，对于这一切应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到北京后，有一段研究、分析、比较、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在1920年。看来时间较短，但这之前的革命活动，对此已作了充分的准备。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讲："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瞭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①

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参加研究会的活动，且经常和李大钊、罗章龙等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当时，毛泽东也经常到黎锦熙先生家讨论“解放与改造”等问题。3月17日还到黎锦熙家讨论了“近代哲学派别”。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仅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而且还努力搜集各种著作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毛泽东是最早的读者之一。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正象他本人在同斯诺谈话时回忆的那样“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

①《毛泽东给周世钊》，《新民学会资料》第64页。

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根据毛泽东本人的上述回忆，确认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在1920年夏天。这个看法值得商榷。毛泽东在第二次去北京期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深入学习和反复思考与比较，初步地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的世界观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这当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从现有史料看，当时毛泽东的世界观尚处在激剧的转变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还尚未最终确立。

三　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的积极实践

1920年7月，毛泽东由北京经上海，在与陈独秀等多次交谈后回到湖南。担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组建共产党的筹备工作。9月9月，由毛泽东、彭璜、易礼容负责筹备，长沙教育界和新闻界不少知名人士参加发起的文化书社正式营业了。文化书社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地址设在长沙。1927年7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书社销售量最大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罗斯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书籍和《劳动界》、《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除售书外，书社还设立了书报阅览处，免费供群众阅读。文化书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湖南是近代中国文化比较发展，新旧思想斗争比较激烈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的省份之一。文化书社的成立，为新思潮的传播增添了一块新的阵地，并且日益使湖南省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很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都到文化书社买过书。读文化书社的新书报，成了当时全省各级学校的新风气。很多人以前连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读了这些新书，也懂得了苏维埃政府是代表工农利益的了，原来连马克思、列宁的名字也不知道的人，也懂得一点唯物史观的大意了。”①

在文化书社成立一周后，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被选为书记干事。该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②。会员发表文章，提倡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针对社会上某些人攻击苏联输出主义煽动暴乱，会员的文章指出：他们的主义……是要创建一个大同世界，创建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1920年毛泽东曾在北京指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主张让进步青年去俄国学习，并积极给予帮助。

此时发生在湖南的一件与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事，即1920年秋，毛泽东等人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毛泽东、何叔衡的领导下，运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意到怎样将这一科学理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此下大力去提高工人阶级觉悟。毛泽东等人举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等等，讲解马列主义

①参见《新湘江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157—158页。

②《新民学会资料》第354页。

的基本知识，还特别提倡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在1920年提出要作“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对于毛泽东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 新民学会政治方向的转变和对唯物史观的肯定

新民学会是1918年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倡导组织的进步青年团体。开始的宗旨主要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以求得“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但在五四运动后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团体了。正象当时各种思潮竞入中国一样，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思想主张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思想斗争和分化是难以避免的。1920年5月，毛泽东组织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的聚会，和7月在法国蒙达尼蔡和森住处召开的在法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会，对新民学会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团体，起了关键作用。在这以后，毛泽东有几封重要通信，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经确立。这些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明确提出要以主义作旗帜。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璈阶的信中提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变换过来。怎样才能造成“新空气”？他提出：“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

①《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

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①他认为："主义"是一面"旗帜"，应作为新民学会的方向。“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

指出以主义为结合的根本，而不是以感情作为结合的根本，这对新民学会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青年人的结合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这个主义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封信上没有直接点明。但同前后的其他通信联系起来，他所要立为旗帜的主义，无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坚信并自觉提倡辩证思维。1920年7月14日，罗学瓒写信给毛泽东，批评四种片面性的观点，称其为四种“迷”："感情迷"，即感情用事，“拿感情的好恶，来判断事物之是非”；"部分迷"，“就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一时迷"，“就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主观迷"，即"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对罗的观点极为赞扬，认为"四种迷，说得最透切"③，并对此从哲学上概括说："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④

毛泽东对于唯物史观的巨大历史意义，已有明确的自觉意

①②《新民学会资料》第97页。

③④《新民学会资料》第120页。

识。1920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①这是对蔡和森9月16日来信的回复。复信对蔡的信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在蔡和森的信中，关于唯物史观曾谈到："马克思的惟（唯——引者）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于有产阶级的惟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惟理观与惟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③信中批评那种否定唯物史观的看法。认为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而不高尚"，是"最足延长现政治之危险而暗杀工人阶级"。④而且谈到："惟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惟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⑤。上述有关唯物史观的各种观点，毛泽东都表示赞同。当然，蔡和森这时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是比较幼稚的，主要是片面强调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但态度和立场是十分鲜明而坚定的。毛泽东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首先是对蔡和森这种鲜明和坚定的赞成，当然也有对一些幼稚想法的赞同和"共鸣"。这反映当时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过程中的幼稚病，比如认为"修正改良派……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解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⑥可见，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决定论，片面地认为唯物史观主张'人''社会'是'单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而否定精神的作用，否定"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

---

①②《新民学会资料》，第162、163页。

③④⑥⑤《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55、153、154页。

虽然当时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有片面强调物质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精神力量的反作用的现象，但能够把对历史观察的基点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无疑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

第二，主张以社会主义对中国问题作根本的解决。

以主义为旗帜的主张是和主张总的根本解决的认识，紧密相联的。这对一度曾支持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去研究和解决的毛泽东来说，是思想前进的又一表现。

1920年7月25日罗璈阶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零碎解决，本来是很切实的入手处，于此，我只祝你成功。"①这本来是对毛泽东以前曾有过的主张的赞同。可是，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已前进了。所以在回信中，他又表达了新的思想，他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②可见当时主张"总解决"的认识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已经比较坚定。

但如何才能有总的解决，这是要有一个对实际问题的探索和认识过程的。当时，毛泽东还处在这种探索过程中。比如他曾企图把"湖南独立"作为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在1920年11月25日给罗璈阶的信中提出，"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③以为把湖南一省"自立为国"，就可以获得"总解决"。这很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毛泽东也并未坚持这种主张。

1920年12月1日在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中，毛泽东表明自己支持社会主义。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

①②③《新民学会资料》第95、96、97页。

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① 这里，一方面表明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表明对社会主义认识极为幼稚，把它看作“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加以认真区分。这也是当时进步青年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共同现象。对所谓“世界主义”，当时毛泽东也还缺乏科学的理解。而且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将社会主义和热爱祖国对立起来，提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②

毛泽东主张研究社会主义。1920年1月1日，新民学会会员开会，毛泽东提出，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他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

第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批评各种错误思潮。

关于中国如何进行社会改造？毛泽东比较了几种方法，认为最适宜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1920年1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的集会上，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毛泽东表示：“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② 无政府主义和所谓温和的共产

①②《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

主义，都是毛泽东曾经信仰和推崇过的。而上边这番话，表明经过认真学习和进行了自我批判之后，他已经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思想前进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否定了上面所提到的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等的所谓“共产主义”，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这里讲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不是贬意词，而是相对于罗素等的那种“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来说的。它是指用激烈的革命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以达到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1920年给肖旭东、蔡林彬等的信中，更明确地批判了他在《湘江评论》中曾赞扬过的无政府主义，他说：“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一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②可见，这时他已从肯定、拥护无政府主义，变为否定无政府主义了。虽然否定的理由还不充分、不深刻。如从所谓“人满为患”来批评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击中要害的。虽然，在上面的信中年轻的批评者还没能提出令人折服的理由，但同过去自己的看法决裂、批判错误思潮的态度，是坚决的。他郑重声明：“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③

①《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②③《新民学会资料》第150页。

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有些通信中，毛泽东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反复强调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行不通。1920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因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①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国家、世界和工厂一样，都不能没有管理工厂或国家的组织。无政府主义把它们看得性质完全各异，进而主张无政府，是极其不明事理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更不能提什么无政府，因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②

主张通过革命手段，而不是改良教育等改良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920年毛泽东已经不再赞美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否定温和手段，否定自己1919年提出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呼声革命”等等主张，而认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③”除批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外，对罗素所宣扬的改良主义思潮，毛泽东也给予了较有说服力的批评。1920年12月1日在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中，批评了罗素来华讲学有关以不流血方式，通过改良教育达到对旧中国改造的说教。这实际上，也说明自己放弃了“不流血革命”的主张。信中谈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异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

①②《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

③《新民学会资料》第149页。

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①毛泽东还明确谈到发展教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资本家久握教育权，鼓吹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首先需要夺取政权，从而握得教育权，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改造社会，在统治阶级握有政权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改良教育，来改变罪恶的旧社会，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当涉及夺取政权，革命所应采取的道路时，毛泽东在1920年的新民学会会友通信中，已明确谈到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谈到法国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争论时，他概括说：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另一种意见，即肖子昇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为俄国式、马克思式的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即蒲鲁东式的革命。毛泽东还转达了李和笙的意见，李的主张与肖子昇相同，不赞同俄国式的革命。对上述不同意见，毛泽东表示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在蒙达尼开会，大家有了分歧意

---

①《新民学会资料》第147—148页。

见，都来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对此，毛泽东表示："我对于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①毛泽东当时是积极支持蔡和森所主张的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蔡和森的意见的。在1920年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而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主张俄式，我极赞成。因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②

可见，年轻的毛泽东在经过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受五四时期革命风暴的洗礼，以及对社会实际的"实地的调查"之后，到1920年底和1921年终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此之后，毛泽东不但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而且还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

---

①②《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党和大革命中的初步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的土壤上和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经历了从萌芽、初步形成、系统形成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得到广泛运用、展开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以中国的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学习、研究和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应用为前提条件的。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进入了全面传播的新时期，并在中国革命中得到初步应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初步应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初步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矛盾、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上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开展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二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性质和

思想实质，对国民党右翼文人竭力宣扬的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反动政治主张及其哲学基础等，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清理和批判，从而有力地抵制了唯心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上述情况表明，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和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逐步实现的。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实现这一"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伟大思想成果。在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中，以及这一时期党的一些文件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些著述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阐发和应用都有某些创造性的发挥，并对尔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第一节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21年到1927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说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还是限于理论方面的话，那么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开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力图在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阐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

理，强调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与解决中国命运的工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　党创立初期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及其特点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组织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仅在1921年8月至1922年6月，就集中出版了15种马列译著。《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重要著作和读者见面。在此之后，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也刊行问世。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撰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论著也相继翻译出版。在同一时间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编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著作也与读者见面。在1923年春到1927年春短短的四年中，先后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多种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著述和《唯物史观浅释》一类的普及读物。这些著作比较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如《唯物史观浅释》一书在首次发行后的数月中两次再版，以满足社会需要。这些译著和专著的出版及流行，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刊物也纷纷创立，通过这些报刊和其它一些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体现

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应用。《新青年》（1921年7月至1926年7月）、《向导》（1922年9月至1927年7月）、《中国青年》（1923年10月至1927年1月）、《新时代》（1923年4月至7月）四种刊物在上述时间里先后发表了56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文章，其中宣传和介绍性质的文章有15篇，实际运用、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文章有19篇，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文章有22篇。在这批论文中，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恽代英等人的撰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中国国情，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使更多的人们由此认清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虚伪和荒谬，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更为迫切的理论需要。

在这段时间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在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各类学校或群众团体，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影响。设在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后，会员曾发展到二、三百人，并有京外会员，还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工人会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1921年8月于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同时又通过讲坛和报刊两条途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这所自修大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和提高干部的哲学理论水平曾起到很大作用，在社会上发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其次，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传播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可是在本世纪初，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接受并广泛传播的是唯物史观。从党创建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物史观一直

被当作宣传的重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唯物史观的传播比五四时期更趋向系统化、体系化。这一情况表明，唯物史观在我国的传播已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逐步扩大到辩证唯物主义领域。1923年以后，辩证唯物主义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进入了全面传播的时期，而瞿秋白的名字正是和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3年初，瞿秋白由苏联回到中国，并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了《自由世界和必然世界》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的理论批评了科学和人生观论战双方的错误思想，对这场论战作出了科学的结论，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揭开了序幕。此后不久，他的《社会哲学概论》一书由上海书店印行。本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其中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划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等内容。1927年3月，在《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中，他又第一次概括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分析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也作初步的论述。瞿秋白的这些阐述，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经得到初步运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认识客观世界，更主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去改造客观世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党

时期，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就提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①他很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中的政治主张。他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深受三重压迫，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②瞿秋白也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指出我们强调"理论、主义的问题，当然不能离开实践"。③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是革命者"断不可一日或缓"的工作。他从苏联回国后不久，相继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社会学》三部论著，全面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并力图运用这一科学的哲学理论，重新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途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篇章，更是运用马克思学说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运用还集中地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思想斗争。在分析评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批判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都能运用所掌握的哲学理论，去分

---

①②李达《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载《新时代》第1卷第2号。

③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第315页。

析和解释革命斗争中提出的问题，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哲学实质、阶级基础与社会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刻的剖析，有力地驳斥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谬误，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传播的过程，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结合的过程。深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又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二者的相互促进，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深入传播的步伐。

党的创建时期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建党前夕，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在理论上还处在未成熟时期。他们对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传入我国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尚缺乏明晰的认识，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线，曾幼稚地把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看成是朋友，甚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不同派别。这种状况无疑是由于他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所造成的。建党以后，这一状况逐渐得到克服。经过几年的艰苦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的锻炼，这支理论宣传队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素养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初步掌握了科学的、辩证的认识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曾存在的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状态有了较为清醒的头脑，能够初步地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

第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五四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视野拓宽了，产生了认识上的升华。如果说先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介绍主要是局限于个别观点和个别方面的话，那末，这一时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人类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认识，开始分析它与以往旧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开始把它把握为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优秀成果的集中体现，把它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来宣传，并将它运用于斗争实践中去。

第三，开启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为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分明显，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中，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文章，大大多于单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这个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倾向，即不仅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阐发，而且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途径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循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坎坷曲折的进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为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成为全党的统一指导思想创造了思想条件。

二　李大钊、陈独秀的《史学要论》、《马克思学说》等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介绍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在五四时期被人们称之“南陈北李”的重要人物，他们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早期领导者。

早在共产党创建时期，他们都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建党后，他们在唯物史观的继续传播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唯物史观上，这一情况的出现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就历史的原因来说，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要来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和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次历史性的证实。因此，在五四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宣传与介绍唯物史观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头等任务。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理论活动中也就必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就现实的原因来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从向劳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这个方面去看，唯物史观的内容直接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这样，就可以从唯物史观中直接引伸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用理论去解释党的政治主张，从而使它较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其二，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来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有一种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建党时期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建党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敌友等重大问题作出清醒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这样，只有用唯物史观武装全党才有可能

①《毛泽东复和森》，《新民学会会员通讯录》第3集第162页

解决上述问题。其三，从增强党在思想战线的战斗力来看，还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我国思想战线上开始的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大论争在党成立后仍在继续进行，同时各种唯心史观和腐朽的人生观也表现得十分猖獗。从世界观的高度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和批判各种唯心史观和腐朽的人生观，都要求扩大唯物史观的影响，使之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手中的有力武器。由于上述诸多原因，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在建党后继续从事唯物史观的宣传与介绍，就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于1922年7月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6号上面。它是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李大钊一直把史学领域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致力于唯物史观的宣传，《史学要论》是他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述史学理论的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综合起来看，他们首先对唯物史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唯物史观看成是区别其他一切旧史观的新的理论形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唯物史观的真正启蒙，认识到各种唯心史观都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也不能真正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李维汉曾撰文认为，观念史观即唯心史观已被现实生活证明是错误的，“只有唯物史观能普遍地解释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底社会历程”。①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见到相似的认识。

① 李维汉《观念史观批评》，《新时代》第1卷。

比如，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认识历史发展的"根本理法"①；陈独秀则把唯物史观的内容归结为两个要点，"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②在他们的心目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真理。他们认为，背离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不能真正理解历史"，③背离唯物史观去观察社会现象，也不可能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结合批判唯心史观种种错误观点，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首先，通过对历史发展最终原因的探讨，批判了多元历史观的错误，正确解释了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论证了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他们指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宗教、哲学、伦理、艺术等建筑在经济的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化观念、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政治、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够决定政治、法律、伦理等观念的形态。历史的发展，"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④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生活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发明，乃至是把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⑤的物质生产劳动，变动了社会的全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

其次，驳斥了唯心史观关于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他们

①③④⑤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第748、715、715、7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陈独秀《马克思学说》，《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93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指出，唯心史观宣扬的“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①的观点，是一种违背客观规律，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错误观点。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既不是神造的，也不是天命的，历史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②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给历史发展带来的影响都是相对的，从根本上说，劳动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劳动群众创造了历史。

其三，严厉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诋毁，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他的阶级斗争学说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依据唯物史观阐发出来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不但不存在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证明。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现象。古代有贵族与奴隶的对立，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近代以来则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这些对立从本质上看，都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对立的双方从来都是站在互相反对的地位，不断地进行斗争。近代历史揭开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新的对抗和新的斗争历史。因此，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还指出，近代资产阶级及与其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与发展，是和经济长期发展、生产及交换方式迭次革命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由近溯远，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发展，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党的这段时间里，唯物史观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逐步

---

①②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第764、764页。

从学理的介绍进入与中国革命实际开始结合的时期。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宣传和介绍，起到了加速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重要作用。

三　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论》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较系统的阐述

从1923年冬到1926年初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瞿秋白先后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等重要哲学论著。这些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进入了全面传播时期。在从事社会革命的斗争实践中，瞿秋白深深地感到要想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仅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还是不够的，只有全面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因此，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限于经济学说，也不限于社会科学，而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①是“唯物论与互辩法的综合，而且是这两种学说最发展的最进化的结论”。②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为中国人民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纠正一度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颇见解，具有重要意义。

瞿秋白向中国人民系统介绍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

---

①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新哲学—唯物论》附录，第205页，原野出版1949年。

②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同上书，第185页。

想。他明确地指出："'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①他用"我"与"非我"的对立、"认识"与"实质"的对立和"灵魂"与"自然"的对立表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是以各种较为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从实体与属性、基础与派生、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中论述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指出物质是实体、基础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意识则是属性、派生物和被决定的方面。他的回答实际上是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一种解释。他从分析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入手，对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同一性问题也进行了论述。指出历史上的不可知论有一个基本特征，即把人们的感觉经验同赋于感觉经验以实际内容的客观实在对立起来，分离开来，认为人们借助于感觉经验无法认识真理。这样，不可知论就割断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指出，唯心论哲学从精神统一物质、主观统一客观方面出发，企图说明"'客观'能存在于'绝对精神的自念，或自想中'"。②而唯物论哲学却通过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来证明：思维统一于存在，主观可以认识客观，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人类知识固然还不能完全认识客观，然而却能渐渐知道客观，把已知的整顿出来，那就得到一更利害的武器，再向'所知'进攻——一直到完全认识为止。"③这里，瞿秋白通过揭示不可知论和唯心论哲学的荒谬及理论失误，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就我们所能知道的，

①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2页，1924年上海书店。

②③同上书，第22、24页。

所能感觉的物质去研究，一切结论可以得而较正；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状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是非正误立刻便可以明白，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于物质现象，而物质是可以实际去按察的。”① 这个论述一方面反映出他对同一性的理解中贯串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可贵精神；另一方面，反映出他的理论研究活动是同从哲学上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阐述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提出“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合或混合的方式”② 的命题。这个命题是瞿秋白关于世界、关于宇宙的总体认识。他从四个方面对这个命题进行了论述。

首先，从现实中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物体的物质结构上去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他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和看到的那些固体的、液体的或者是气体的东西，都是各种原子互相错综交结的不同组合。在他看来，电子的发现不但证明唯物论，并且证明唯物论的一元论，这意味着宇宙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极微小时，只能求出一种唯一的质素——电。从这个方面去看，他以为“物质不过是‘电’的种种表现而已。”③

其次，通过分析各种物体的变化，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他指出，各式各样的存在物“都因内部电子的放射或原子的离合，而不断的变化：腐败、生长、变质、变味……”④ 各种物体都在经常的变动和变化之中，改变了形态，改变了性质，最后，“改组成种种式式的别种物质”。⑤ 这里，瞿秋白首先强调物质运动是以物质结构内部发生的“放射”或“离

①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25页。

②③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新哲学—唯物论》附录，第188页。

④⑤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讲义》第189页。

质的广延性。这反映出他关于物质范畴的理解还受到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局限。

第三、初步介绍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瞿秋白首先阐述了动力观和静力观的区别。他指出，动力观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动变和联系的科学理论，它有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其一，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处在变动当中，即处于所谓"历程"之中，世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和停滞不前的东西；其二，承认一切现象之间的联系，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相互作用中存在，而相互作用本身即是联系，没有可以和外界相隔离的东西。他还指出，与动力观相对立的静力观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它要人们在概念中和在理论上否认外界事物的运动，只从静止当中去识别事物、把握事物。这种思想方法，看不到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把运动着的、处在各种联系中的事物曲解为一个个独立的、无联系的、静止的个体。瞿秋白对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区别的有关论述，无疑是正确的。

瞿秋白还明确地阐述了矛盾涵义及其普遍性问题，并指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这些矛盾及其转化（互变）正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他认为，所谓矛盾就是"趋向不同的各种的力量之相对抗，"①"物的矛盾及物的互变便是最基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②瞿秋白不仅把是否承认事物的矛盾作为区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主要标志，而且还把它作为能否获得符合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的前提条件。他说：人们受到形而上学束缚时，"必定不能发现什么'矛盾'"，③"形而上学与现实的事物是不能符合的"。④

---

①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讲义》第65页。

②③④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48、47、48页。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数量与质量互变规律，瞿秋白指出：“宇宙及社会里的一切发展，——就是数量变更的渐渐积累，然而数量的变，到一定程度，必定变为质量的变。”① 他指出事物的质变使渐进过程中断，发生飞跃现象，从变化的形式看，事物的量变与质变的交替就是渐变和突变的交替。社会里和自然界里的一切渐变都必行向突变，每次必须经过一种突变，才能开始一种新方向的渐变。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是渐变和突变的交替过程。

瞿秋白还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普遍规律。他说：“自然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都是连环不断的‘否定’”，② 并且强调这个规律是“很重要的很广大的公律。”③ 他还认为，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就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④ 这就是说，必须把数量与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同揭露事物矛盾变化的某个方面联系起来。这种认识无疑是深刻的，并且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的基本观点。瞿秋白指出：“唯物论便以外界或实质为思想的基础。”⑤ 他阐述的唯物论的能动反映论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多方面展开的。

首先，他肯定人们的一切经验和知识体系从根源上讲，都来自客观实际。他指出：“一切认识都是从经验发生的，都由主观的‘我’，迎受外界的刺激而得来的”，⑥ “自然界里及社会关系里的种种观念都是经验得来的。”。⑦ 人们通过感觉而

①②③④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49、50、50、50页。

⑥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新哲学—唯物论》附录第198页。

⑤⑦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40、46页。

获得经验，然后才有可能形成各种各样的概念或知识的系统。在感觉之外有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通过感觉把"主观的'我'"和外界物质的刺激联系起来，从而开始了人们的认识活动。我们知道从感觉出发的认识论，可以通向唯物论，也可以通向唯心论。很清楚，瞿秋白阐述的认识论思想，走的是前一条道路。

其次，他指出人类的思想（思维）具有创造力。它"能观察外物"，获得一些直接性的经验，还能"有系统的综合或分析一切事实及现象"，"由实际的应用进于抽象的原则"。① 在这里，他对人类认识活动的分析和认识，由认识活动的表层进入它的深层，即由具体的、易把握的感觉、知觉深入到抽象的、不易把握的思维。他充分肯定人类认识由表及里、由粗至精、由具体进入抽象这个不断深化过程的意义，指出"抽象方法本来是思想进步的成绩"，有赖于此，人类的认识及其知识体系才有"日益丰富进步"的发展趋势。②

再次，他指出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要看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对象。他认为，"必须就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能感觉的物质去研究，一切结论可以得而校正；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状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是非误正立刻便可以明白。"③ 在这里，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的概念，但已经包含了人的认识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的内容。他还特别指出，经过科学的抽象得到的原则，是对经验事实本质联系的反映，这些原则可以用来指导人们进行新的认识活动，但是它却始终不能离开具体事实。倘若离开具体的实际情况，离开认识对象，仅从原

①②③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40页、25页。

则出发，进行主观的推理，用理论裁剪事实，所得结论就会发生偏差，“发生笼统不切实际的弊病。”①

最后，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人类认识活动的对象是个无限发展着的系统，而作为每一时代认识主体的个人的智力是受各种条件限制的，是相对的。因此，人类形成的任何认识，任何现存的知识体系，都是相对的、历史的，不存在什么终极真理的体系，认识活动没有终点。他的结论是“实质（客观实在）时时变易，意识亦时时变易”。②

应当指出，从总体上说，瞿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某些问题的提法和阐发还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他曾说，“我们的观念是切合真理的——只要这一观念确与外界物质相符合”。③在这里，他把观念的东西简单地看成物质对象的一种变形，认为二者可以直接相符合。显然，这提法还保留着旧唯物论的某些痕迹。

瞿秋白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他一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对于指导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活动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唯物史观具有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社会哲学概论》这部著作中，他对唯物史观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阐述社会的物质关系决定社会的思想关系的基础上，他指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为被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方

①②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40、41页。

③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论》，《新哲学—唯物论》附录第199页。

面，它一旦形成之后便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巨大的反作用。他认为，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积极的，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他说：唯物派并不否认思想是有所作为的。假使一种理论，能为群众欢迎与接受，它便能成功一种社会的力量；另一个方面是消极的，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他举例说："分配并不仅是生产与交易的消极的结果，他还能回过去影响到生产的交易。每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或交易形式，不但受旧形式或与此旧形式相符合的政治制度的束缚，而且受旧的分配方法的束缚。"① 瞿秋白的这些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在克服了唯心论的束缚之后，便在更高的起点上肯定了意识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作用。这一思想，后来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论证。

总之，瞿秋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全面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系统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大量的开创性与奠基性的工作，这对于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四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述

李达在1926年6月出版了《现代社会学》一书。这是一部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著作，也是一部集前此传播唯物史观之大成的著作。

首先，在这部书中，李达较为全面地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他根据唯物史观，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

①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讲义》第53页。

对立统一的概念，“生产力即生活资料之产出力，即制造物质资料之可能性”①；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分工协作、互相交换劳动等一定形式的联系和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有“密切之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的劳动带来新的生产力，扩大了的生产力要求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其二，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状况相适合，他说：“相适应，则生产力能在生产关系中发展”，②若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中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由促其发展的形式变成阻碍其发展的桎梏时，必须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这样，“生产力发展始有余地。”③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指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必然对社会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伦理、哲学、宗教、艺术等发生直接的影响。生产关系改造，则社会之全部建筑随而根本改造。上层建筑一经产生后，对经济基础便具有制约性作用。但是，要辩证地把握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和对待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要人为地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任意夸大，“吾人应当注意者，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之变动所规定，故上层建筑仅能成为经济之量的变化之助因，而不能成为经济之质的变化之主因也。”④

显然，李达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这些论述，较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有关论述，

---

①②③李达《现代社会学》第32页，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11版，下引该书只注明页码。

④第36页。

就显得更加精确了。这些论述对于正在从事社会革命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在这部书中，李达首次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理论，论述了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与本质。揭示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必然涉及到原始社会史、阶级的起源与本质等理论问题。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从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些问题。

第一、论述了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婚姻制度变革的历史和家庭的起源及其演变方式，并对氏族社会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类进入婚姻、家庭时代后，人类的婚姻家庭形式依次经历了兄弟姐妹结为夫妇的血族群婚家族、同胞兄弟姐妹间禁止通婚的半血族群婚家族、对偶婚家族等几种形式，当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家庭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他还指出："氏族制度托始于半血族群婚家族"，①群婚制时代父子关系难以确认，早期出现的是母系氏族社会。到对偶家庭后期，生产力提高，男子在生产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家庭中的共有财产渐渐转为男子的私人财产。同时，生父和子女的关系可以确认。以财产私有和财产继承权的出现为前提条件，母系氏族制度瓦解，出现了父系氏族社会。

第二，论述了氏族社会解体及其解体的一般经济条件，说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他指出，原始社会初期，狩猎是人们唯一的生活手段，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剩余生产物，人们非营共产生活，不能维持生存。游牧民族从野蛮人群中间分化出来以后，随着生产力提高和剩余劳动出现，生产中原有的平等状况被破坏，出现了在生产体系中占居不同地位的人们，即

①第65页。

奴隶与主人、被剥削者与剥削者，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阶级划分。社会发展进入铁器时代，“工业遂自农业分化而出”，①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私人财产进一步扩大，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于是，氏族解体，在全社会成员间形成了自由人与奴隶的对立。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货币借贷和土地买卖、抵押制相继出现，使社会财产迅速地聚集于少数人手中，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使更多的人沦为奴隶，“强制的奴隶劳动制度以成”②。全社会成员中形成了利益对立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由此可见，阶级是原始公有制瓦解，私有制出现带来的必然产物。

关于阶级的定义问题，他说：“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出，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历程中所构成之社会的系统而生者也”，③又说：“阶级云者，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经济的阶级之谓，如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者与一无所有者，如经济上压迫他人掠夺他人者与被他人所压迫所掠夺者是也。”④不难看出，李达关于阶级本质的阐述集中在两点上：一是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与人们在特定的生产体系、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结成的不同关系联在一起的；二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对立地位，主要是由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所决定的。由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区别，出现了一部分人（一个集团）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产生了经济利益对立的社会集团。李达在这个方面的宣传工作，对于中国人民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理论和私有制、阶级起源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①②③④第82、84、200—201、141页。

第三，根据唯物史观，对国家的起源作了明确的说明。李达指出，国家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内部建立起来的，它是阶级出现之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其一、是剥削的支配。国家是一种推行强制性统治的权力机构，它代表了只占社会少数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它的活动，体现了剥削阶级的意志，它“滥用权力以行其剥削之实。”①其二，是阶级的支配。任何国家中的统治阶级总是要以谋全社会的共同福利为增加利益的必要手段。他说：“阶级的利害者，目的也；共同福利者，手段也。”②其三，是管理社会机关。国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以一种超越阶级对立的公共权力实体面貌出现的。综合上述三点，他认为“国家乃社会之机关，由特殊阶级，以经济的剥削之目的支配下属阶级，并为防止内部叛变与外部攻击而造成者也。”③

再次，在这部书中，李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社会运动发展的实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李达把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作为研究社会革命问题的出发点。他说：“社会革命者何？即社会全体超升一进化阶级之谓，换言之，即社会由旧而且低之生产关系进至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并变更其上层建筑之全部是也。”④这个定义告诉人们，社会革命是经济制度和政权变革的统一，是促进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社会活动。社会革命的实质是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

爆发社会革命的根源是什么？李达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例，指出爆发这场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生

---

①②第92、94页。

③④第97、128、141页。

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个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李达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把社会成员（即个人）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放到广阔而又具体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去评价。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个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和个人对改造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努力，都是作为规模宏大、矛盾尖锐的阶级冲突构成因子在起作用的。所以，个人的活动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有绝对之必要”。①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这样的观点：“社会组织之历史，个人努力之结果也”。②其次，他认为个人虽然能创造历史，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意性的。个人只有依据时势提出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去进行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才会为促进社会发展增加一份现实力量。个人创造了自身活动的历史舞台，而个人的创造活动又不得不受这个历史舞台——社会条件的制约。他说：“个人而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必在确实之前提与条件之下”。③这里所说的“确实之前提与条件”，是指创造者生活于其中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一切现存的社会条件的总和。

李达还根据他对群众活动同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对两种片面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世之主观论者恒重视个人在历史上之活动。以为历史纯由个人创造而成，遂轻视社会发达之历史法则；反对论者又重视社会发达之进化的历程，以为社会之进化纯系自然进化，遂忽视历史由个人创造之实事，二者皆一偏之论也”。④

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介绍和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①②③第152、151、152页。

④第152页。

理论，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写下了新的一页。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深入传播，更有成效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对于提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进行斗争的批判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和反映不同政治倾向的哲学学说和派别，也就活跃起来，甚至彼此间还进行着激烈的论争。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在当时中国所流行的马赫主义、柏格森主义、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说和流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剖析和批判，在相当程度上是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进行的。因此，他们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而且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进一步结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一　陈独秀、瞿秋白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双方的唯心论观点的批判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论战，它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颇有影响的争论。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及其哲学基础柏格森主义，主要是反映了新儒家人生哲学的思想倾向。张君劢认为：“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是谓之人生观。”①其特点是“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因此，人生观就是“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②实质上是反对用唯物史观解释人生问题，否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意志是客观物质基础的反映，宣扬“意志万能”、意志决定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玄学派的看法，他们所宣扬的自然主义人生观及其马赫主义的理论基础，则基本上是反映了全盘西化论者对人生的一些见解。丁文江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人生观，但他所谓的科学并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否认科学是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认为科学没有客观必然性的意义，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推翻被修正。丁文江的这种实用主义科学观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他明确提出“存疑唯心论”或心物二元论，认为“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③物质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是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的，显然这是马赫主义

①《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②《人生观》，《人生观之论战》（上），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

③《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

然规律，不论玄学派还是科学派都是不能改变的。

陈独秀指出，张君劢对于人生观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人生观都要“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①他逐一分析批判了张君劢提出的九项人生观问题，并明确指出：“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理论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②同时，他还批判了梁启超的所谓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指出一切情感活动，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环境。所谓“孝子割股疗亲，程婴、杵臼代人而死，田横、乃木自杀等举动”，“乃是农业的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传说及一切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③

陈独秀指出，张君劢提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在各种社会现象中，只看见思想演成事实这后一过程，而看不见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过程，这是一切唯心主义者共同的中心的错误。其实“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们所以发生的背景，决非无因而生。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些事实的儿孙，如何倒因为果，说思想是事实之母？”④

对于丁文江等科学派的唯心主义，陈独秀指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他自号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从而走进了

---

①②《〈科学与人生观〉序》。

③《〈科学与人生观〉序》。

④《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死胡同。至于丁文江把所谓欧洲大战造成文化破产的原因，归结为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的个人行为，也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他离开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世界历史现象，结果也只能陷入历史唯心论的泥坑。

陈独秀还指出，胡适的心物二元论乃是唯心论的一种变种。“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但是，这决不是说唯物史观“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①这就是说，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人的努力和天才的活动，只是说它不能和经济立于同等的地位。

陈独秀的上述看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谬误，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革命群众。但是，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由于陈独秀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错误观点。例如，他看不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想是一对亲兄弟，并且早已结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盟。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还表示愿同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去共同反对玄学派复古主义哲学，从而混淆了哲学上两大营垒的界限。再如，他把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孔德关于宗教、哲学、科学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三时代”说，说成是“社会科学上的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在这场论争中，瞿秋白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

①《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

界》一文，批判了玄学派与科学派的错误，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其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尽管自然界里绝对无所谓愿望目的，而人类社会历史里却有一定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的进程之共同因果律”。“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张君劢先生以为自然界有‘相同现象’可以做科学的对象，人类社会间则有英雄豪杰等，不能发现‘相同’人，故不能以科学测度——这是很错误的。科学的公律正是在流动不居的许多‘异相’里所求得的统一性”。“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人若能探悉这些因果律，则其意志行为更切于实际而能得多量的自由，然后能开始实行自己合理的理想。”①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尽管一切人的活动都是有其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瞿秋白还正确地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驳斥了张君劢的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论。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必然就是指自然和社会的必然因果律；我们所说的自由就是人们对必然的了解而“处置自如”。“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而是在于“探悉其中的因果”，并“利用这些规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以达某种目的”。因此他说：“即使人能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服务，那时，人仍旧是服从自然。然而这种对自然之‘服从’却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人若服从自然则对于自然的权威反而增长，人的自由亦就增长。所谓服从自然，是

①《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说征服自然本身。”又说：“既然知道历史的必然，人的行动就更可以‘自由些’，——更容易达到目的些；我们可以看着自己的行动以为是某种必然的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之一。我们的行动因此更有意识些。所以决不能因为既有历史的必然便不要有意识的行动。”① 这就是说，真正的自由与必然是统一的。人们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必然性去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才能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自由并不排斥必然，而恰恰是依据着必然；违背必然，就没有自由。换言之，人的自由总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自由是根本没有的。

瞿秋白还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驳斥了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指出：“因生产力的状态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因此，“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知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知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可是新科学知识得之于经济基础里的技术进步及阶级斗争里的社会经验。所以个性的先觉化仅应此斗争的需要而生，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而已。”② 这里正确的说明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人生观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产物，这就从理论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科学与人生观论争所造成的一系列的混乱。

---

①《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②《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一定的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科学与人生观论争，是中国现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手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然而，历史要前进，社会要发展，“封建制必被资本制推翻，资本制必被共产制打翻；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封建思想必被资产阶级思想征服，资产阶级思想必被无产阶级思想征服，这是社会进化与思想进化的铁则，真可谓‘虽有大力，莫之能逆’的了。”①

二　瞿秋白、恽代英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戴季陶（1890—1949），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戴季陶主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映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也是中国现代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它渊源于自由派和西山会议派，形成于孙中山逝世以后。在政治上，他们极力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在哲学上，他们极力鼓吹所谓“民生哲学”，首先把人类历史归结为“生存”，然后再把生存归结为“生存的欲望”，用“生存欲望”解释历史的发展。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倡唯心主义的道统说与“仁爱哲学”。对于戴季陶的反动政治纲领及其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当时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进行了深刻的

①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第一，针对戴季陶的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谬论，瞿秋白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坚持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它的政治经济要求，还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在这革命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地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地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杂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①革命的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反映了工农群众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完全是现实经济制度下所必然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的本身，就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斗争，因此，国民革命既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反对本国资本家的斗争，而且工人农民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戴季陶企图“撇开大多数农工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②

第二，瞿秋白批判了戴季陶的“仁爱”理论，对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

①②《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11日），《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实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① 这里瞿秋白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指出阶级斗争是必然存在的，而且也有力地揭露了戴季陶之流的伪善面目，指出他们的“仁爱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

第三，戴季陶主义在组织上主张建立单纯的国民党，因此他要拿“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统一国民党的思想，借以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两党的合作。对此，瞿秋白指出：“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因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份，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正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如今要在这种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

①《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要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① 这里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戴季陶"统一"论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排斥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就是要把国民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四，瞿秋白还批判了戴季陶的唯心主义道统哲学，他指出："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当作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是要想暗示工农群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② 唯心主义道统说乃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思想体系，戴季陶把它拿来作为自己反动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这只能说明他妄图借助腐朽的地主阶级哲学武器，来愚弄广大人民群众，对抗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瞿秋白还揭露了戴季陶主义的阶级实质，指出戴季陶主义在理论上是以"纯粹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在实际上是反对

---

①②《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左派，反对阶级斗争，甚至是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他们标榜以国家和民族文化为最高原则，实际上是以此来欺骗人民大众，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

对于戴季陶主义的错误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也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首先，针对戴季陶把传统文化与民主革命混为一谈的谬论。恽代英指出，对于中国文化要进行具体分析，不应作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我们要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认为‘中国的一切’亦不过与任何国的‘一切’一样的有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犹如犹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样，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①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先进的党的组织，那种认为只有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配得上谈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只拿自己的文化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从而鄙弃外国文化；我们也不应单纯赞羡外国文化，从而如美国化的留学生一样陷入自我菲薄的地步。“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②戴季陶鼓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思想。主张用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要以封建主义文化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是戴季陶资产阶级

---

①②《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青年》第87期，1925年8日8日。

文化观的核心所在。

其次，针对戴季陶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唯心主义理论，恽代英指出，孙中山“限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就是代表农工利益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经济的斗争。他说：“民生主义原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自己本身便是一种阶级斗争，一个体现阶级斗争的工具。国民党以民生主义为骨干；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革命便是一种以要求实现民生主义为最后目的的经济革命。如何以农工阶级之利益为主要利益的国民革命，可以不要阶级斗争？”① 这就是说，以革命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民革命，就是一场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谁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

所谓国民革命也就是要进行反对国内外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恽代英说：“国民党是认定要对于已完全发展之帝国主义作战的。所以决不应当防止中国无产阶级对于此等外国资本家的阶级争斗。并且应当毫不畏怯的去促成此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且毫无疑惑的应当奖励此等阶级争斗。”② 反对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努力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对于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决不能等候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被诱发以后，再去组织训练农人工人；国民党在此时应当准备与障碍农人工人以组织训练的地主资本家相奋斗。遇必要时，为发展农人工人之组织与训练，便遏制乃至于

①②《国民党与阶级争斗》，《中国青年》第90、95期，1925年8月14、25日。

打倒这种反动的地主资本家，亦是没有不可以的。”否则，“若是不去防止个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去鼓励国内国外工厂的无产阶级厉行阶级争斗，若是不去负责发展农人工人的组织训练，若是在已发现之阶级争斗中不敢站在农人工人上面，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当在国民党中撵出去。”① 这里恽代英不仅在理论上坚持了阶级斗争学说，而且也主张在实践上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的打击。

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恽代英主张必须实行严厉的镇压，不能心慈手软，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他说：“不要把‘妇人之仁’，误了我们的事体！我们应当严压一切反革命派，毫无顾惜的扫除一切反革命派！我们在一切反革命势力之下奋斗的革命同志们，性命都悬在这些反革命派手里，只要不肯舍弃革命的工作，便没有我们妥协迴翔的余地啊！”② 在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不幸遇难的时候，他沉痛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革命同志，都应当有这种高度的革命觉悟。

三 恽代英、肖楚女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是一批以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反苏反共反人民为己任，以建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为政治目标的反动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在政治上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实际上却在极力反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统一战线，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鼓吹资产阶级的国家主

①《国民党与阶级争斗》，《中国青年》第90期，1925年8月25日。

②《悼廖仲恺先生》，《中国青年》第90期，1925年8月25日。

义，在哲学上极力提倡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与唯心史观。他们认为：“社会构成的要素有两大种：一是物质要素，二是心理要素。这两种要素在社会生活上是同时并在，斤量相称的。”①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终归要倒向以精神为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在国家主义看来，社会的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关系”，人类先天的“情感”或“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才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国家主义派也极力鼓吹唯心主义的国家论，否认国家是历史的阶级的范畴，认为“国家组织之起”，乃是“由于人类相依相助之需要与爱群之本性”。于是他们就拼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客观癖”或“科学幼稚病”，是马克思凭空造出来。对于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政治纲领及其哲学理论基础，当时恽代英、肖楚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

针对国家主义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恽代英指出：“我们所以主张今日最要的事是国民革命，并不是说中国在无论如何情形之下，均无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我们只是因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国主义的自己崩坏，所以要先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因此，“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②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固然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但是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是建立资产阶级政

①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歧点》，《醒狮》第44期，1925年8月8日。

②《与李璜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73期，1925年4月4日。

权，这是任何一个关心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所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

国家主义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只能是打倒帝国主义，因此要保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要实行阶级斗争。对此恽代英指出：“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么？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如何无理由的事”。“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阶，一方面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面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①这里恽代英用事实驳斥了国家主义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深刻地揭露了他们所鼓吹的国家观念的反动实质。

国家主义派反对阶级分析的方法，总是拿全民的“生之欲望”来观察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此恽代英说：“大商买办阶级的‘生之欲望’，在依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东政府，这都是明显的事例。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生之欲望’，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在内）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

①《与李璜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我们最注意的是顺着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努力参加他们的阶级争斗，以博得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① 对于“生之欲望”应该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欲望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要求，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为了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肃清国家主义派的反动影响，肖楚女也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谬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刻批判。

第一，针对国家主义派吹捧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谬论，肖楚女指出：“外国这样来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把我们桎梏得连气也出不来——上海、广州、汉口、重庆、南京的同胞，让他们用了达伊尔主义任意屠杀；我们还不应当去‘及汝偕亡’地向帝国主义进攻！就是去干涉他国内部组织——干涉这些压迫我们的仇敌的内部组织——譬如鼓动他们底下层阶级（平民）起来推翻他们现在的这种以侵略我们为目的的政府，又有什么在道德上不应该的处所？”而自命为“外抗强权的醒狮派：你们不但拥护资本主义，而且拥护帝国主义！你们反对‘打倒资产阶级’，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俄——一脉相承，都只是为了你们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的轿夫。”②共产党坚持对资产阶级斗争，坚持打倒

①《与李璜卿君论新国家主义》。

②《显微镜下之醒狮派》（1925年10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1957年版。

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这是矛盾的民族主义，醒狮派奉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是平等的民族主义。”① 这就是说，民族解放运动绝不能和国家主义同日而语。民族解放主要是指广大工农群众的解放，绝不是资产阶级继续压迫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国家主义派感是拿国家观念来压制阶级观念，用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适应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需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卖国主义。

第四，针对国家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肖楚女指出：“共产党是认定要求农工之彻底解放的，他认定非发展无产阶级势力以至于夺得资产阶级的政权，不能消灭压迫工农之地主资本家。共产党知道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农工之彻底解放是谈不上的；联合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力量以从事国民革命，这是求农工彻底解放之第一步——眼前必要的一步。但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工作，是要在反对帝国军阀的奋斗中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使帝国主义军阀的政权不至于将来又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去，以妨害农工之彻底解放。共产党是不肯让一切妨害农工彻底解放之思想及事实自由发展的，他并不因为从事第一步的工作——国民革命，反把他们为什么从事这一工作的意思（彻底解放工农阶级）丢掉了。归结起来说，共产党看眼前国民革命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但他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之理论与策略；换一方面说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是不肯丝毫放松的，但他同时很注意于眼前国民革命的工作。”② 这里肖

①《显微镜下之醒狮派》。

②《对于青年指导者的悲观》，《中国青年》第108期，1926年1月2日。

楚女正确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辩证关系，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只是革命的第一步。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要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一方面又要积极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

第五，对于国家主义妨害工农彻底解放的行径，肖楚女也进行了有力地揭露。他说："国家主义者不注意求农工阶级彻底之解放，他们还在否认中国有地主资本家，还在否认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有压迫工农的事情；同时他们又忽略或有意避开面前的各种政治争斗，内则国贼不除，外则强权不抗，藉着反共产三字争个不休，把怎样救现在的中国反置之度外。我们说国家主义者的什么'国家主义'，完全是骗人的，他们绝无益于中国的革命，他们反要妨害中国的革命——不但妨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妨害中国眼前的国民革命工作，我们反对国家主义，是为中国革命不容已的。"①国家主义派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敌，而且也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大敌，他们始终是站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斗争，因此，"我们要揭破他们虚伪的黑幕，让一般青年厌恶离开他们。"②

第六，肖楚女还批判了国家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他指出阶级斗争并不像国家主义派说的那样，是由共产党"鼓吹"起来的，"我们若有这么大的本事，岂不成了瞒天过海的八洞神仙？唯心主义的先生们太'从心所欲'了吧？"然而，"从唯物史观上认识社会进展的'时代'，却也可怜他们是被已往

---

①②《对于青年指导者的悲观》。

悟过来，公开的当'国家主义的叛徒'。"①于是曾经喧嚣一时的国家主义这一政治派别，到1926年下半年就土崩瓦解，曾琦之流也就在"赤焰熏天势难当，纷纷余子竞投降"的一片哀鸣中走向破产。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初步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根本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解决这一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和大革命时期，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课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历史进程，不但从建党时起即已开始，而且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党的二大《宣言》和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献和著作，正是这一积极成果的显著标志。这些文献和著作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农民问题等许多涉及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的进程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而为毛泽东哲学思想

①冒群：《破产的国家主义》，《中国青年》第145—146期，1926年12月20日。

的孕育和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一 党的二大《宣言》对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纲领的科学分析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制定和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通篇贯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一，《宣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指出中国正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的严峻形势之下，中国同帝国主义各国间的民族矛盾变得十分尖锐突出。《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的本性和近代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特点，指出，由于中国有广大肥美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万万廉价的劳动群众，也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落后，这就使得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中国相互争夺，从而也就形成了中国在国际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宣言》详细地分析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手法和表现，并着重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特点。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曾利用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迫使袁世凯签订投降卖国的"二十一条"，妄图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作法，遭到了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于是，美国就在"门口开放"的旗号下联合英、法、意、比、荷、葡等国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

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① 这一情况表明，二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争取民族的生存而英勇奋斗。

《宣言》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潮流，明确指出世界正在发生两种根本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②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宣言》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要想求得民族的复兴和阶级的解放，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反帝爱国革命运动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之中，一定要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宣言》正确地分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资本列强的入侵而引起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和对中国政治经济实权的操纵，中国已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际资本列强的入侵，一方面冲破了中国固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

---

①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又各自支持和利用中国的封建势力，保持封建割据，挑起军阀战争，从而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表明，“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① 所以，中华民族要得到复兴，中国人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任务。《宣言》十分明确地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和亿万中国人民历经种种苦难，而这些苦难的最终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理应成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宣言》在分析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任务时，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宣言》一方面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被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发展证实是一个伟大力量和先进阶级，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军”；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中国的贫苦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大要素，因此，只有实现工人运动与农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宣言》的这些论述，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宣言》还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对于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宣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①《宣言》同时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② 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向中国人民既指出了远大的光明前景，又提出了当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做过也做不到的事情。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提出，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已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本上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作为观察与解决中国命运的工具。

《宣言》在论述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问题时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而是要通过民主主义革命来消灭封建制度，并要在斗争中充实和壮大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是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务所决定的，只有认真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才能使中国革命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任务，并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人类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发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宣言》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上，阐述了中国革命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与作用也作了一些符合实际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揭开了可喜的序幕，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宣言》也存在着自身难以避免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例如，它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与妥协性的一面，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些缺点，后来就被陈独秀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领导工作中，集中发展成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二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买办阶级更加紧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同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国民党的老右派组成“西山会议派”，公开打起反共旗帜，分裂统一战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也建立了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大肆鼓吹“戴季陶主义”，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

及革命成果的阴谋活动。此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认清并维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领导作用，以保证民主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然而，此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开始抬头，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分析，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认为中国产业落后，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因此，中国革命的公式，就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革命的结局"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先后在《革命》、《中国农民》、《中国青年》等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阐述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发展规律。

文章按照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革命的实际运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指出了革命路线对于革命运动的决定性的反作用，以及正确认识阶级关系的重要意义。文章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而要不领错路，就必须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就必须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从阶级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向出发，实事求是的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

第一，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竭力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因此，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则“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所以中国革命必须打倒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只有这样才可以解放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第二，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根本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排挤压制；同时，由于他们也是一个剥削阶级，这样又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矛盾。这一经济地位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的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为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这个阶级是很不稳定的，当着阶级斗争激烈展开时，它又必然要发生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

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

第三，指出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主要包括有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阶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剩余。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但又胆子小，怕官也有点怕革命。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接近，故对革命取“怀疑态度”。这部分人是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二是“大体可以自给的，他们总想发财，但又总也发不起来。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军阀、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感到今天的世界不如从前，必须比过去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他们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但又认为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未必成功。因此，对革命取“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派，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三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一部分人是革命中颇要紧的一支力量，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部分人平日对革命的态度各异，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半自耕农和贫农，他们是农村中一个

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所谓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而“优于贫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一半不够，须租种别人田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所以，半自耕农的革命性是“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的。所谓贫农，是指农村中的佃农，他们没有土地，受地主的剥削，每年耕种只得收获的一半或不足一半。其经济地位也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这些农民一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通过种杂粮、捞鱼虾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等勉强维持生活。他们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是苦于半自耕农而优于另一部分贫农。“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这部分人生活十分困苦，荒年暴月只靠乞哀求怜度日。债务丛生，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其他如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第四，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业无产阶级大约有二百万人，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产业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之下。毛泽东十分重视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

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在修改他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时，更加明确地指出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此外，城市中的苦力和农村中的雇农，其经济地位也与产业工人相似，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重要力量。至于游民无业者，毛泽东指出，这些人多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根据时代的特点和世界革命的形势，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在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后决战形势下，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预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

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结论，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思想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素，为以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路线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三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发表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26年初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由广州出发的北伐战争，因为有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参加，进展也十分迅速，很快就打到了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与此同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长期以来，毛泽东就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为湖南农民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更有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千百万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普遍建立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使农民同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斗争立即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湖南农村的革命斗争成了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影响

着中国革命的全局。

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工人革命运动一样，严重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基础，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斗，在农民问题上就日益尖锐起来。

在农民革命斗争威力的震慑下，一切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极为慌恐不安，恶毒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叫农民运动“糟得很！”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猛烈发展的情况下，也起来阻止和反对农民，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面，说什么农民的举动“太过分”，农民运动是“越轨”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抑制农民革命。提出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反对组织农民革命武装，在地主豪绅买办阶级进攻面前，采取了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驳斥地主豪绅买办阶级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1927年1、2月间，亲自到湖南，用三十二天的时间考察了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从三月五日起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连续刊载。十二日又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转载了文章的前半部分。但是由于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彭述之的压制，没有继续刊登。瞿秋白对这篇考察报告非常赞赏，把它交给武汉长江局，用《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并亲自写了序言，给予热情的赞扬。序言中说：所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然而他

们却是解放中国的主力，“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彻底揭露并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各种反革命宣传，有力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充分阐述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才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他们在几个月内就做了孙中山四十余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创造了四十年乃至几十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明白：“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糟得很”是地主阶级打击农民起来革命的理论，是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是反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充分估计农民运动伟大意义的基础上，

还进一步把它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尖锐提出如何对待农民革命运动问题。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从而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必须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对农民的真正领导权，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二，坚持和发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理论，明确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因而，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这是农民革命的根本任务和获得全面胜利的保障。不把地主政权打倒，"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活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可见，"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就是政权问题。所以在农村革命中，必须坚持"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舍此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为了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办法：一方面夺取地主武装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建立农民的"新起的武装力量"，把所有青年壮年都武装起来，使人人都有一柄梭镖。只有建立起一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

起的武装力量”，才能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才能巩固与发展农民革命政权。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理论的运用和发挥，为全面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认识成果，这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论证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各异，富农是消极的，中农是游移的，只有贫农是坚定的。贫农在乡村中占绝大多数，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七十，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许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他们都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就不能造成乡村中的革命状态，就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也正由于贫农是最革命的，所以才取得了对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关系到农民革命成败的关键。所以党在农村中要中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农。毛泽东斥责了把贫农诬蔑为“痞子”、“惰农”的反革命论调，强调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泽东的科学分析，解决了农村中敌、我、友的重要问题，奠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理论基础。

第四，深刻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第四章

大革命失败后对形势和革命道路的分析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武装暴动为手段的革命道路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西欧和苏联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方法是否还适用于中国？中国国情需要一条怎样转败为胜、发展革命的道路？这是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第一节　对革命形势、性质和特点的哲学分析

认识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特点是一切革命活动的出发点。而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在分析社会矛盾，分析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分析社会革命发展趋向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科学的论断。

一　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革命高潮转入革命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一历

史转折关头，如何看待革命形势，革命的力量在哪里，革命还有没有复兴的希望。革命应当向何处去，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是什么，所有这些事关中国革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摆在一切革命者面前，需要他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抉择。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革命有它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不应当从个别人物的思想、观念或动机中去寻求，而应当从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分析，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去分析。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马克思用历史辩证法对这一事件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革命的失败没有也不能改变产生革命的客观条件，没有也不能解决产生革命的客观矛盾。失败倒恰恰使人们在痛苦和流血牺牲中认识旧事物，摆脱旧事物，失掉的只是那些旧传统旧观念，而不是革命。马克思认为，从革命遭到失败来看，可以说“革命死了”。而从革命的客观条件和客观矛盾仍然存在来看，又可以说“革命万岁”。

诚然，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未必都能读到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但是，他们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在观察形势和分析问题中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对待革命失败的问题上不仅得出了和马克思基本一致的结论，而且作出了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论断。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革命失败而矛盾依然。作为人民大众的对立面的旧军阀即北洋军阀，被新军阀即国民党反动派所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支持它们的帝国主义仍然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实质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大众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

处在反革命统治之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作为引起革命的主要矛盾也丝毫没有解决。

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既然没有解决，从属于它的一系列矛盾当然也不可能解决。到处是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矛盾重重，一触即发。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由于内部矛盾的加剧，也日益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经济势力伸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而这些国家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利益，又必然要竭力加强政治侵略，把矛头指向中国革命。它们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实施炮舰政策，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直接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采取怀柔政策，表面上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给以同情和谅解，实际上则力图从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和温和派，拉拢它们打击革命派，分裂革命阵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就成了帝国主义争取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境内就日益激化和发展起来。因此，中国革命就不能不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斗争中又必须把分析和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作为重要的策略手段。这都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矛盾状况所决定的。

从国内的状况看，由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利益的矛盾而引起的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起来，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随着军阀混战而来的苛捐杂税，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从而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和激化。由于帝国主义摧残中国民族工业而形成的矛盾，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从拼命剥削工人中找出路，从而也就加剧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帝

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使得地主阶级加重了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从而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在外货压迫、群众购买力枯竭和赋税加重的情况下，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士兵群众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下经常处于困苦的环境之中；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在灾荒匪祸和苛捐杂税的重负下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学生在教育落后和生产落后的情况下，既有失学之忧，又无就业之望；凡此种种，说明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遍及城乡，到处布满着干柴。全国处在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革命的复兴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粉饰太平或把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由于党派有意煽动的论调，都是无济于事的。

正是在对上述矛盾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一种冷静而热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们既冷静地面对现实，承认失败，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到了打击"①，"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②，从而摒弃了那种不顾事实，一味盲动蛮干的"左"倾思想；他们又热烈地从失败中看到希望，把事物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抓住它的实质，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看到革命必然复兴的前途，他们对革命的信心和能动精神是以科学地认识必然性为基础，从而摒弃了那种对革命悲观失望或采取取消主义立场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77页。

右倾思想。正如毛泽东回顾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①

二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革命重点转向农村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首先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整个链条的薄弱环节上打开一个缺口、从而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首先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这一规律的是毛泽东，他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提出来，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这一社会中，"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② 中国社会这种不协调、极其悬殊、极为矛盾的事物同时并存的局面，说明它的政治、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页。

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其发展较快的地方，往往为统治阶级捷足先登，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和长期占据的地盘，而发展较慢的地方，统治者往往鞭长莫及，难以控制，成为革命势力易于突破的薄弱环节，有利于它们的生存和发展。

正是上述情况，新军阀统治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而不可能放在极为广大的农村。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而革命的影响却较大，并且广大农民有强烈的土地要求和组织起来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经验，这些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因素，为革命力量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指出了一条继续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应当把自己的主要力量从反动统治较强的城市转入反动统治较薄弱的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充分发挥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力量的积极性和巨大作用，争取革命运动的复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就针对陈独秀放弃工农武装的投降主义主张，提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且深有远见地提出“上山”的主张，预见到“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①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瞿秋白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都体现了上述精神。随后，毛泽东又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且适应形势变化，进行三湾改编，向井冈山农村进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

①《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争。与此同时或稍后，方志敏、邵式平在赣东北，朱德、陈毅在湘南，周逸群、贺龙在湘鄂边，郭滴人、邓子恢在闽西，也纷纷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所有这些重大的革命活动，从实践上为革命重点转向农村提供了具体的经验，也从理论上为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总结了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他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由工农群众组成的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和由武装保卫的根据地政权不可分割地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政权。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思想完全适合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是工农群众继续革命的产物。

但是，党内的右倾悲观思想和"左"倾冒险思想，都不能正确认识当时的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尤其不能正确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前者只看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削弱，而没有看到反革命力量由于各自割据、长期混战也相对地削弱了，他们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不愿作艰苦的工作去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去夺取和建立政权，显然这种理论不可能将革命引向胜利。后者则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把"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诬蔑为"枪杆子主义"和"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不切实际地梦想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实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从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这种“左”的理论显然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顽固地把“城市中心论”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因而在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不难看出，上述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都根本违反了历史的必然。

同“左”右倾错误思想相反，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历史证明，它是中国革命重新集聚力量和进一步发展的最好的形式，是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振兴、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由之路。遵循这一思想，中国革命就会出现星火燎原的形势；而背离这一思想，放弃农村这块艰苦阵地上的艰苦斗争，则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就会受到沉重打击，中国革命前途就有被葬送的危险。所以，毛泽东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是一个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思想。

三　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特点的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任务，是一个需要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各方面矛盾作科学分析而后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把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析当时政治形势的基础上，基本上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这就既同右倾投降主义、

弱，敌人的力量超过了革命的力量，从敌人的内部来分析，它们又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矛盾的。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因此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暂时的妥协也只是酝酿着更大的战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总是继续不断的。这种情况既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又使小块的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和存在下去。当然，指出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战争是每天不停的，还要善于区分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以便采取不同的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在暂时的稳定时期，军事上应当采取逐渐推进的战略，地方工作上应当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切忌分兵冒进；在破裂时期，军事上则可以比较地冒进，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井冈山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了上述分析和思想的正确性。1928年4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由于针对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情况，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和逃跑主义，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等等，因而能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同八、九个团乃至十几个团的反动军队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不断扩大，军事斗争不断胜利；而八月失败，却完全由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了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毛泽东是针对当时农村中一种过左的政策而提出的。这种错误政策对于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不加区分，对他们和他们的土地，一律打击和没收，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也做得十分厉害，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过左的政策。毛泽东认为，这种政策的错误首先是看不到中间阶级的作用，不是减少他们对革命的阻力，而是增加这种阻力。农村中小地主和富农不仅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而且在农村封建的家族组织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他们如果打击过重，他们在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下往往反水叛变，成为革命区域内把握不住的一大难题。这种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实际上把中间阶级驱赶到豪绅阶级一边，成为反对革命的力量，同时也使贫农阶级孤立起来，对发挥革命的力量是极为不利的。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纠正上述错误政策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多次有针对性地提出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把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等等。

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首先是从它能够产生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分析的。诚然，在白色恐怖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史和世界革命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怪事，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具备了相当的条件。其一，由于半殖民地中国所特有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给红色政权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二，由于某些地区有民主革命的影响和受过民主运动锻炼的工农群众，也给红色政权和红军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其三，由于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总的革命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红色区域的继续发展就是毫无疑义的；其四，红色政权的存在，离不开武装力量

的保卫，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就谈不上工农的割据，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其五，从红色政权所肩负的革命任务来看，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核心，必须要保持政策上的正确性。

基于上述分析，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不论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客观条件来看，或从当时的共产党、红军和工农群众等主观条件来看，都具备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当时革命的力量也只有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才能生存和发展，绝不能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去发展。因此，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力量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成了势所必然，是最适合当时形势的最佳抉择。可以说，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不仅具备了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必然性。它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革命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对于革命者来说始终是一个革命过程中需要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在经历了两年多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活动后，在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有所深化的基础上，从哲学上特别从认识论上作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他在1930年初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首先从认识上剖析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从主观主义出发，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犯了革命的急性病，走上了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种同样从主观主义出发，不切当地看小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大了反革命力量，必然会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这两种错误都未能作到知己知彼，正确地认识敌我。毛泽东认为，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

点，就要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只能把事情的现象看作入门的向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要看到它在大革命失败后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更要看到这种削弱了的力量在中国农村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因此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将会是很快的；对于反革命力量，固然要看到它的反动统治和白色恐怖有所加强，但更要看到它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都是立足在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它的统治也是处在内外矛盾交困的混乱状态之中的，因此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反革命潮流实质上在开始下落。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首先要承认敌强我弱，从这一基本估计中来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其次又要从敌人的强中看到弱点，从我方的弱中看到长处，看到以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为基地，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高潮早日到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不是那种没有行动意义、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洞的可能性。当然，对于革命高潮到来的具体时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不能神秘地机械地规定时日，而只能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说出个大的方向。

当然，中国革命的特点将会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日益从更多的方面和更深的层次暴露出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将不断地提高和深化。往后的历史表明，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和长征的胜利结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分析，又发展到更全面、更完整的新的高度了。

第二节　毛泽东等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对托陈取消主义的批判

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首先需要从思想上、理论上、认识上解决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扫清思想障碍。而当时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对托陈取消主义者的批判，就是围绕中国革命的上述问题而展开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一　托陈取消派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

曾经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仅没有总结教训，改正错误，反而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结合在一起，对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革命转变和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分析的那样：他错误地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诬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将其驱逐出党。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理论观点，并不是

什么独创的见解，而是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某些观点的翻版。托洛茨基在1928年和1929年夏，连续抛出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等文章，认为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已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时期，革命已经遥遥无期，当前只有依靠民主选举出来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

从1929年7月到8月，陈独秀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央，表述了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对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他指责中央“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要求“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这种认识实质上取消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宣告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陈独秀也完全看不到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新军阀混战的事实，拒绝对它们采取不同的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他指责中央对蒋桂战争的分析“是一个极端右派的危险观念”，“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认为对于统治阶级之间的各种战争，“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

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这种对资产阶级不加区分、把它们看成是铁板一块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不可能对它们采取正确的政策，而是把它们一概推到反革命营垒中去。陈独秀断言：“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疑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这种不顾中国国情而作出的论断，既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从城市到农村的变化，也看不到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变化。因此，陈独秀认为“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准备力量”、“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

显然，陈独秀的上述观点，同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历史性转变是根本对立的。它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作出了完全错误判断，从而受到了中央的谴责和反对。1929年10月15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错误，指出这种错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看不见中国革命反对封建势力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不承认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并且肯定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从而否定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得不“在原则上

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到了1929年11月15日，中央鉴于陈独秀完全拒绝党的警告和党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且在行动上公开反党，于是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

实践证明，党在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反对托陈取消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关系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斗争。

二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系统批判

从理论上对托陈取消主义进行系统批判、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是蔡和森。1931年9月10日《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一文，本文对陈独秀思想的演变过程，陈独秀主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混合的必然性，同陈独秀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任务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剖析和精辟的见解，反映了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首先，蔡和森分析了陈独秀思想的演变过程。他认为陈独秀主义“是中国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之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陈独秀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发生着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最初，他在五四时期发挥过积极的革命作用，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唱者，美国式

的'科学'和'民主主义'的宣传者"；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他又"开始与胡适之派分化，改变自己的方向，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方向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俄国方向：由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改向远东民族会议（1922年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召集的）。由此，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同样，陈独秀从一个革命者转而成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1923年党的三次大会之前后建立了他的孟什维克的路线之一般的理论基础；1926年3月事变前后以至武汉时期建立了他的机会主义的实际策略；武汉失败至六次大会时期，是他的动摇和消沉时期；1929年中东路事变后，进到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总路线，由取消主义进到'资产阶级工党'之叛逆的社会民主党地位。"陈独秀在每一时期的蜕变，都是和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分不开的。

其次，蔡和森分析了陈独秀主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随着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失败，陈独秀从过去看重过工人阶级的力量转向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说什么"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等等。诚然，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这就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对于农民，陈独秀认为他们"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蔡和森指出，农民在陈独秀心目中"更是宗法观念，反动思想，神权帝王迷

信，散漫不集中的‘四不象’”。

陈独秀对工农两大阶级的错误认识，必然使他在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前途问题上作出错误结论。他“始终不认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内容，始终不认识而且不愿认识工农民主独裁制”，认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只有等待“国民革命完全成功”，“国内产业勃兴”，“普遍的农业资本化”以后，在农村才会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陈独秀这种“轻视无产阶级”、“忽视农民”的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在他当时提出的一些口号上，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等等。

第三，蔡和森还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混合的必然性。随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进到消沉与动摇时期”，“开始演进到取消主义和合法主义的阶段”。陈独秀在1927年7月底向临时中央局提出，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给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只能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的日常工作，进行反帝运动，工农运动则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免大的牺牲和保全自己的势力。在1927年11月，他又提出苏维埃口号现在不宜采用，农民运动应在四不主义（不纳税、不还债等）的限度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不能一党包办革命等取消主义的纲领。至此，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上，不仅有共同的立场，而且有共同的语言，它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阶级关系的。正如蔡和森分析和揭露的那样：“现在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完全过渡到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是由蒋介石所代

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封建势力不存在了，帝国主义让步了，现在所有的事情只是等待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以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要了，以后直截了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共同立场。”正是在这种共同立场的基础上，陈独秀和托洛茨基接着就提出“国民会议”作目前政治任务的中心口号与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独裁和苏维埃口号相对抗。陈独秀自来就不赞成采用苏维埃口号；托洛茨基咒骂在武汉失败后，采取此口号是犯了罪恶。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所应有的任务只是召集国民会议来做议会行动，合法运动，及“取得一些自由”罢了。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仍然是他们1927年7月底的取消主义大纲的继续发展罢了。这种合法主义观点是建立在对革命形势不会出现高潮而只能处于低潮的估量上面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反对“盲动主义”和“保全”革命势力的“英雄”，指责“一切罢工斗争，街上示威、游击战争都是盲动主义，都是土匪式的扰乱”，把反对“盲动主义”作为他们阻止和破坏革命高潮的一种借口。

第四，蔡和森还阐述了和陈独秀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任务。既然这场斗争直接关系到发展革命形势，还是扼杀革命形势，是支持工农群众，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因此，“对于这种斗争的丝毫犹疑或调和态度就是帮助了反革命”，“对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任务之一”。

同陈独秀主义的斗争，蔡和森着重阐述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看到陈独秀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自己的机会主义同盟，只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渗透，才能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另一个任务是不仅要在理论上

而且要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这场斗争。与"陈独秀主义斗争的任务，尤其要执行于一切实际工作，群众工作，党的生活及一切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各式的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之中"。这说明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斗争中已经注意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注意到理论斗争要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革命胜利发展。"一切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失败情绪，合法主义，和平发展倾向，党内调和倾向，盲动情绪，保守观念，极端民主化等等，如若任其发展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随时随地制胜这些倾向，其意义就是制胜陈独秀主义。"

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也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进程。1927年以来的革命进程，从国内来看，"无产阶级取得了中国之唯一的革命领导权；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之建立，无地的贫农，雇农，苦力以及地少的中农占乡村人口之绝对多数；城市大工业具有相当的经济前提"，加上"中国革命之反帝主义的特性，和反资产阶级的特性"等等；从国际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之大工业化与农村的集产化之异常迅速的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印度等殖民地民族革命之高涨，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稳定'不仅剧烈动摇而且开始崩溃"。这一切都说明革命实践是对机会主义最有力的批判，因此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也是对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最有力的批判。

可以说，蔡和森的《论陈独秀主义》，在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不仅在三十年代初期是罕见的，而且在以后有关的文献中也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三、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取消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危害，对奋战在中国革命最前列的毛泽东是具有特别深刻的体会的。他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正面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深刻批判了陈独秀取消主义的谬论。

革命实践是对机会主义最有力的驳斥。毛泽东用创建农村红色区域的革命实践来论证革命不仅没有熄灭，而且在深入。革命在向农村发展，革命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形式在重新积聚力量、发展革命形势。他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割据，其意义不仅限于几个县的范围，而是在更大范围发展革命势力的重要的军事根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在偏僻落后的农村，规模又比较狭窄的红色区域能够发挥"星火燎原"的作用呢？其原因一是红色区域有一套正确的政策，能够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二是它的存在和发展将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极大的威胁和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三是它能真正地创造和培养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为了建设好红色区域，真正发挥它作为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同样也必须和取消主义者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首先强调红色区域只能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而不能在统治阶级力量强化的城市建立。那种对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弱不加区分，对城市和农村不加区分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适合的。毛泽东还一如继往地强调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除仍然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外，还应实行

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在当时的湘赣边界，不仅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农民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而且由于豪绅阶级的统治和封建剥削的根深蒂固，农民还受到野蛮的政治压迫和思想文化的奴役。实践证明，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不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而且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精神，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的红色区域。取消主义者根本看不到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看不到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地位和作用，不认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在革命失败后找不到革命的力量，对革命悲观失望，就是势所必然的了。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还特别强调军事问题、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认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①他还十分明确地提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②毛泽东对待武装斗争的鲜明的态度，同取消主义者所主张的合法运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必须向农村转移，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必须采取武装斗争形式。而把它们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毛泽东所概括的工农武装割据或红色政权的观念，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相对立的则是取消主义者所提出的另一条道路，即认为历史的转变是转向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2、78页。

命。

为什么同样面临中国革命的失败，却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毛泽东认为，归根结底还要从思想认识上找原因，还要从哲学上作分析。

首先的分歧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陈独秀在1929年8月5日给中央的信中一再指责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说什么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低估了资产阶级所取得之“优越地位”，“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指责中央“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等等。显然，陈独秀在这里是以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的唯物论者自居，而把同他对立的一方斥之为不尊重事实的唯心论者。

是党不认识革命的失败吗？当然不是。问题在如何理解和对待革命的失败。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的产生有它的客观原因，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化的产物，只要产生革命的这些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革命就不会消失。因此，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的灭亡。毛泽东认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仍然占居统治地位，工农阶级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国内外的重重矛盾布满了中国大地，革命火种犹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面对这种情况，尊重事实就应当因势利导，引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而那种被革命的暂时失败所吓倒，不准工农群众革命，把行动局限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合法的日常工作，把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的第二次革命上，这样的态度难道是正视事实、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吗？

况且，革命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胜利，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还要看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革命后的很短时间内，“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① 对于这些新的事实，难道不应当给予尊重和重视吗？

至于对阶级势力的估量和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也完全不象陈独秀指责的那样，“把敌人的情形估量的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正因为毛泽东充分估计了革命失败后大资产阶级在城市统治力量的加强和实行白色恐怖，由此而提出了在广大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正因为毛泽东冷静地估计了革命失败后自己的处境和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由此而提出了必须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依靠正确的政策，进行艰苦的工作，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来迎接全国的革命高潮。

可见，忽视明显的事实恰恰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他们在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和分析革命转变时期的阶级关系上完全陷入了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革命形势、估量阶级关系上却严格地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坚持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

另一个分歧是坚持辩证法还是背离辩证法。陈独秀在1929年8月两次给中央的信中用一种教训别人的口吻说：“我们要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他指责中央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些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 等等。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空间去观察资产阶级。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所依存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发，资产阶级又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后者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两面性的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方面“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①。但是，打着辩证法招牌的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却不加区分，也不作具体分析，而是武断地认为“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就是反动的，全世界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更加没有例外。因此，陈独秀所要反对的是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认为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乃是一种“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从这里不难看出，真正超脱一切时间、空间而虚构一个“资产阶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

级”的，不是别人，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不懂得辩证法，背离辩证法的也恰恰是他们；而真正结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对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严格坚持辩证法的，恰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也要善于理解和运用实际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实际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中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就包含着极其复杂的矛盾。北伐战争的失败却引出了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资产阶级的胜利却导致了无产阶级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不以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把肃清资产阶级右翼势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如此等等。这一切对于根本不懂辩证思考的陈独秀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怪事。在陈独秀看来，既然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胜利了，随之而来的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从而也就宣告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放手让资本主义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不需要无产阶级领导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在这里，陈独秀以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恰恰违背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而陈独秀认为自己不能理解的，群众也不会理解。他以为“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这充分说明，陈独秀既不理解国情，又不理解群众，把自己局限在资产阶级思想境界里，顽固地用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观察一切。他把科学分析客观矛盾的辩证法斥之为“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这不是明确地把自己置于辩证法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说，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就要坚持从实践出发，坚持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于纷繁复杂的现象，要善于透

过它去把握事情的实质，把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样就会作出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逐步向城市发展、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而提出的发展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坚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是坚持从主观主义出发，坚持片面性、表面性的分析方法，只看现象，不看实质，对一般情况的实质和内在矛盾不作科学的分析，从而作出中国只能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放弃斗争，听任资本主义发展，而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而提出的断送和取消中国革命的道路。

四　托陈取消派的观点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争中受到的批判

托陈取消派的观点，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有影响，而且在一个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首先就是由托陈取消派挑起的，随后党内外一批进步的社会科学家参加了这场争论，形成了历史上持续十年之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从1930年起进入高潮，贯穿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双方发表的论文约一百五十篇，著作约三十余部，涉及的期刊约五十余种。由于托派的观点和文章是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又称“动力派”，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文章是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又称“新思潮派”。这场论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争论的继续，也是和中国革命在实现历史性转变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直接联系的，同时这场论战也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它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

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是这场论争的中心问题，它是了解中国国情、确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方法，明确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及前途的基础和出发点，尤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和历史转折时期，更具有迫切的和突出的意义，这一问题吸引了党内和社会科学界众多的革命家、理论家的关注和讨论，绝不是偶然的。

在论争中，以严灵峰和任曙为代表，坚持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他们在1930年和1931年连续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研究绪论》等文章，断言中国虽有多种经济成份存在，但毫无疑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地位，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视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势力的维护和力图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的野心，武断地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中国经济加入于国际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会引起殖民地极迅速的发生资本主义生产，使农村中的地主同封建时代地主在本质上不同了，推动着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等等；他们还强调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变动的动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来的；他们鼓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一致性，认为不应当在整个敌对的资产阶级中分彼此，找矛盾，不应当在整个资本主义中划分界限；他们指责对方"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中国境内华洋资本主义对立的庸俗见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新修正派的最反动思想的论据"等等。

以严灵峰和任曙为代表的"动力派"还进一步用哲学的形式把他们同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新思潮派"之间的分歧，

归结为坚持还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分歧。他们指责“新思潮派”用孤立、不动、直觉的观点去考察事物，所谓孤立的观点，就是没有看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联系。所谓不动的观点，就是认为革命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革命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而看不到革命性质是由社会阶级关系即资本主义关系决定的。所谓直觉的观点，就是只看到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紧张，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看到封建势力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发展对封建经济的削弱，等等。总之，“动力派”在上述问题中作出的“哲学概括”，中心仍然是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更带欺骗性的是把这场论争涂上了浓厚的哲学色彩，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者”，而把新思潮派斥之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篡改、曲解和庸俗化的“不肖门徒”。因此，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同时也是一场哲学上的论争，不仅涉及到哲学上许多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哲学上的是非界限，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责难和攻击，在这场论战中理所当然地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和批判。“新思潮派”作为论战的一方。以王学文、吴黎平、张闻天等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针锋相对地给以驳斥。

首先，他们批判了“动力派”主要错误观点的要害，即对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作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既进行统治，又进行剥削，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帝国主义经济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宗主国经济与附庸经济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的关系，诚然，在帝国主义经济统治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那不过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是一种只准在不触犯宗主国利益内的发展，它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到帝国主义的破坏、阻碍和压制的。至于帝国主义经济和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关系，后者是前者实现殖民统治的基础和依靠力量，是前者需要维护和利用的，它们在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上，在掠夺和剥削中国人民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既没有力量冲破这种束缚，更不可能得到发展。可见，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只能在帝国主义容许的范围之内发展，中国社会绝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其次，他们批判了“动力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揭露了“动力派”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并不一定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它们不是同一个范畴。只有当劳动力变成商品，从而产生了工人和资本家的时候，商品经济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不仅要看到商品关系，更要看到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并由此去识别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对立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资本取得平均利润的资本家和得到工资的工人之间的对立，而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租种土地、交纳地租之间的对立，这种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同样，农村中商人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剥削也是不相同的。“动力派”把一切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事物都看作资本主义，这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掩盖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实质，而且陷入了抽象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犯了脱离事物运动变化过程去机械地、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错误。

“动力派”所谓中外资本“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的观点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它一方面掩盖了帝国主义经济对华侵略和掠夺的本性，抹杀了统治的经济形态和附庸的经济形态之间的原则区别，另一方面又绝对排斥两者之间的对立，强调两者的统一，强调两者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量的差别，这种只见量而不见质的观点恰好暴露了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机械论。

“动力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还表现在它们用以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的思维方法完全陷入了排除矛盾和是——是，否——否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它们以为，既然帝国主义代表了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怎么可能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矛盾，并限制它的发展呢？既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处于不可调和矛盾，怎么可能有两种势力的联合，有封建经济的发展呢？要就是纯粹的封建经济，要就是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文明的进步的帝国主义怎么会同野蛮落后的封建势力联合呢？既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某些资本主义关系，又说帝国主义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世界经济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里怎么可能还有其他经济呢？如此等等。看来“动力派”已经深深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而这些矛盾恰恰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因此，他们骂别人不懂辩证法，而真正不懂辩证法的恰好是他们自己；他们骂别人机械论，而自己恰是真正的机械论；他们骂别人是机会主义的方法论，而自己恰是十足的取消派的方法论。

从共产国际内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以及在社会科学界反对严灵峰、任曙等托派分子的斗争，都是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展开的。可以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中国革命深入发展

的需要，是同中国革命实际斗争进程紧密配合的。这场论战一方面是党内反对托陈取消派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统计资料和现实事例直接配合和论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和社会调查工作。论战所提出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所揭露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掠夺、剥削和压迫的情景，论战所批判的托派取消主义的观点，论战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出路，无不在这一时期和稍后为毛泽东在理论上所深化和概括。毛泽东的红色政权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则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从批判陈独秀到批判严灵峰、任曙，批判的深入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理论上批判和肃清了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托派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为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扫清了障碍。

第三节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红色政权理论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不仅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而且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之途。

一、土地革命战争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确定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中国革命寻找到这条道路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但是，他并不是什么“先哲”和“天才”。他对

这条道路的实践和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周恩来在谈到“以乡村作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思想时，认为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说：“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①

应当说，周恩来的上述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深刻的哲学分析。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一般说经历了两个层次。首先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向哪里发展和转移的问题。对待传统的“城市中心论”持什么态度的问题；其次是革命工作的中心和根据地应当放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去夺取全国的胜利。就前一个层次看，毛泽东是在正确认识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运动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正确论断和处置的，1928年10月和11月的两篇著作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鲜明地反映了这种认识；就后一个层次看，毛泽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东是在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中，积两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明确作出这一论断，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鲜明地反映了这种认识。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他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必要的前提和准备，而他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又是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和丰富的必然结果。把两者混同起来或对立起来，既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也不符合逻辑的发展，都是错误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向农村，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发展过程。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党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正确规定了武装斗争必须同农村的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方向。瞿秋白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要求用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要利用农民武装暴动的极好时机去发动土地革命，稍后他在《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一文中指出，现阶段革命已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要使农村的游击战争达到建立革命地域的目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也强调了农民问题和军事问题的重要性，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为后来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了初步的酝酿和准备，但是对于从战略上建立农村根据地问题、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党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仍然长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里，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城市工人方面，甚至毛泽东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时也还是有过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这一切都说明，“1927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诚然，“城市中心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有根据的。在人类历史上两次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即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中，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但是，这种历史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帝国主义压迫，没有民族独立，内受封建制度压迫，没有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既无议会可以利用，也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进行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同时，中国农村的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村也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但中国的城市则不同，虽带有领导性质，却不能完全统制乡村，中国乡村广大的人力物力更是少量城市所无法领导和控制的。因此，中国革命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去攻打反动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把自己有限的实力暴露在强大的敌人打击之下，而只能也必须向反革命统治力量较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发展，开辟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的道路。

可以说，毛泽东作为提出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代表，在大革命失败后，经历了领导农村的秋收起义和游击战争，总结了攻打长沙失败的经验教训，又经历了转向创建井冈山农村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是比较丰富的、全面的，从而使他能够明确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是，最初提出这一思想，还主要是解决革命力量难以在城市立足的情况下向何处转移、发展的问题，解决农

村割据和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和工农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农村根据地问题。至于把这一斗争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联系起来，同中国革命发展道路联系起来，那是在1930年初积累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才会有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明确的思想，才会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纳入到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之中，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在更完整的意义上去把握“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才会从发展中理解这一思想的形成。

二　中国红色政权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不仅革命的成果要依靠政权来巩固，而且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也要依靠政权来组织和领导。因此，根据革命的发展和革命的性质，确定政权的具体的组织形式，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以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为基础，努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作出实际结论，而不教条式地照搬别国经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各地秋收起义以代表会议为民众政权的经验，提出在农村建立类似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中国红色政权，而建立了这种政权的地方也就叫作苏区。中国红色政权的建立和苏区的开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都是无先例可循的。诚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曾经开创过两种政权形式：一种是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政权，但那个政权是建立在法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巴黎，并且仅仅存在了七十二天；另一种是1905年俄国工人阶级在同沙皇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但它同样是建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样一些最大的中心

城市里，而且主要成份是由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就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来说，有类似于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但是就其他许多方面来说，又是同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有明显区别的。

中国红色政权作为领导和组织革命任务的司令部，作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归根结底是要经受革命实践的考验，而它能够胜任这副历史重担，正确规定自己的性质和任务，分析自己的特点和前途，增强斗争的自觉性，又首先需要理论的武装和说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先系统阐明中国红色政权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的，是当时领导农村游击战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

中国红色政权的性质是从属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因此，中国的红色政权虽然由无产阶级领导，但却不同于历史上巴黎公社和苏维埃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种性质的政权，一要坚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二要坚持民主制度。坚持前者，才能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完成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而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又要注意党政分工，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毛泽东曾针对当时由于许多事情为了省便，往往由党直接去做，把政权机关搁置一旁的情况，深有远见地提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要避免那种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坚持后者，才能有利于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为了真正组织起名副其实的民众政权，毛泽东借鉴苏维埃的经验，强调要有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他深有感触

地认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他指出现在民众还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政府或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现实生活中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和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即使委员会和政府本身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往往由少数人处决，民主集中主义也用得不习惯。因此他主张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他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过来。

同革命性质和政权性质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阶级政策问题。对此，毛泽东针对当时湘赣边界某些过左的错误，特别强调对小资产阶级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中，对于小地主、富农等中间阶级和大、中地主阶级要有所区别。对于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罚款也要恰当，绝不能用烧杀的办法，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纠正对小资产阶级过重的打击，是顺利进行土地革命的需要，是扩大以贫农为核心的阶级阵线的需要，是保证农村根据地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的性质所决定了的。

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特点，毛泽东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的。首先，他认为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长期存在下去，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怪事。为什么中国能有

这种不同于世界各国的奇特现象呢？这是由中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地区往往是那些由于白色政权长期分裂和战争而鞭长莫及、难以控制的地方，也是那些革命势力较有影响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政权能够从利用矛盾、趋利避害中求生存和发展，对白色政权形成直接的威胁。其次，他认为红色政权必须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工农民主政权和小块农村区域的割据于一身，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割据只能是武装的，离开了军事斗争就谈不上割据地区的巩固和发展。因此，红色政权要把军事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甚至要作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对人民军队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一是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二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他提出党代表制度必须坚持，党代表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党支部要建设在连上，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还针对红军物质生活菲薄战斗频繁的状况，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建立民主主义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等等。这样，红军就成了一个大熔炉，许多俘虏兵过来后，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他们不再是为他人卖命，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内部的这种民主主义制度成为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当然，“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强调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并不忽视建设政权和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反对单纯游击主义和流寇思想。毛泽东剖析了这种思想的表现，一是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是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

"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是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种种，如不把它作为思想斗争的重要目标，"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不能全面实现，根据地和红色区域就建设不起来，扩大革命影响和发展革命形势就会因缺少稳固的基础而落空。

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是把它同总的革命形势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的，红色政权作为革命的工农民主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首先，它的长期存在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早在1928年10月就提出，只要全国革命形势在向前发展，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里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对于从小块红色政权到全国政权之间的道路已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对小块红色区域的战略意义和战略目标已有了大致的认识，而不是把它作为权宜之计和应急措施的。其次，红色政权的战略还应当密切联系统治阶级内部的情况和动向，视其暂时稳定或政治破裂而有所不同，在前者的情况下，必须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切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不论是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都切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后者的情况下，则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总之，军事上的攻守进退，都必需在具体分析战争情况的基础上决定。最后，红色政权虽然还是局部地区和比较狭小范围的，但是对它的意义却要从更广大更深远的方面考察。毛泽东在谈到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时指出，这种割据的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一可以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中有很大意义，二可以在斗争中使红

军得到锻炼，得到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三可以为军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培养人材。他在谈到这种红色政权对敌我双方的影响时还指出，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而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也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既不能照搬巴黎公社，又不能照搬苏维埃的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提供了在小块农村地区和偏僻山村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系统阐述了这一政权的性质、使命和前途，从原则性的纲领路线到具体的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等等，都体现了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结合，这不仅为以后形成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为日益扩大的革命政权和全国政权积累了经验，而且以富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三　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及其伟大意义

如前所说，“工农武装割据”或红色政权的理论，为进一步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道路，还需要在上述基础上继续前进，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彻底批判“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树立以农村为中心思想；其二，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放手发动农民战争，建设农村根据地，批判畏惧农民革命势力的观点；其三，要有农村包围城市、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

1930年1月毛泽东为批评林彪和党内一些同志的悲观思想而写的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原则上解决了上述问题，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一，树立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形成中国革命道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在农村战斗、打游击，却总是想着到大城市去搞武装起义或武装暴动，怎么可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夺取全国胜利呢？如果把希望寄托在中心城市，不愿在农村进行艰苦的工作，中国革命的依托和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又在哪里呢？可见，问题不是在不在农村战斗，革命力量要不要向农村转移，这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必然结果，是被反革命逼出来的既成事实。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真正树立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为此，不批判和肃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就不可能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但是，“城市中心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有历史根源的，是不可低估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革命形势下，曾经以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为革命的根据地和出发点，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也都是把大城市作为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也是确认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开始的。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使党内一些抱着教条主义不放的同志或盲动蛮干，或消极悲观，用“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来指导革命，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其中尤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最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两个方面抵制和批判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一是在实践中用踏踏实实的艰苦工作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用根据

地的巩固和发展从事实上批驳“城市中心论”；二是从哲学上和思想理论上分析这种论调的错误。他在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在分析了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国情以后指出，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仍然想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①随后，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从哲学高度剖析了“唯上”、“唯书”、照搬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求共产党人树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就把全党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引向实事求是的原则。

毛泽东针对“城市中心论”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要树立依靠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这一观念把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同全国革命高潮联系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所能办到的，而必须依靠根据地的逐步扩大，人民武装的逐步扩大和政权的逐步扩大才能办到。毛泽东把这种扩大和发展看作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这种农民斗争的充分发展，才能给全国革命群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

众以巨大的鼓舞，才能给反动统治以很大的困难和动摇，也才能给红军以极大的锻炼，从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可见，毛泽东在1930年初提出的这一深刻观念，已经充分肯定农民斗争的重要性，把农民斗争提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地位，实质上也就是把以农村为中心、用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农村革命形势不能脱离全国革命形势，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有极其深刻的分析。他从分析国外的矛盾到分析国内的矛盾，从分析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到分析它们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从分析众多的阶级矛盾到分析广泛的社会矛盾。他用"星火燎原"形容全国各种矛盾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认为，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应当因势利导地放手发动农村的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把农村红色区域真正建设成为革命的坚强阵地，成为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在当时条件下进行革命的唯一可能的抉择，也是最佳的抉择。当然，这一抉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去排除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才能做到的。

毛泽东早就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强烈的要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和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一切重大问题。农民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工农红军实际上是以农民为主体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红军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可见，确立以农村为中心的思

想，还必须真正把革命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真正用主要力量作好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工作。为了真正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好农村工作，毛泽东还批判了当时一种畏惧农民革命势力发展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名，说什么农民势力的发展如果超过工人的势力，是不利于革命的。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① 这里重要的是应当认识，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工人阶级，但是它不能脱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而孤军奋战，相反却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同时，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在于它的先进性，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少。作为人数众多的农民革命只要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不仅不会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只会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沿着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革命道路前进，只会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也是最好的证明。北伐战争最初由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而得到迅猛的发展，而后来由于农民运动受军阀地主的摧残和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压制，终究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毅然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使遭到惨重损失的中国革命又重新出现了生机和活力。

第三，以农村为中心，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其根本目标是发展革命力量，用农村革命战争逐步把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转向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绝不是消极的图一时的苟安，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而是积极地发展和推进革命事业。对此，毛泽东在1930年初批评了当时中央提出的要求分散队伍、隐匿目标，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队伍的消极主张，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领导，丧失应变能力，被敌人各个击破。他提出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而且集中应当是积极的。“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① 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积极方针，即通过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通过由点到面地扩大红色区域，使红色政权由小到大，农村根据地联成一片，实质上也就是用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的农村必然会日益发生扩大政治影响和促进革命高潮的作用。

综上所说，由于上述三个问题的正确解决，不仅明确了以农村为中心、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的指导思想，而且具体设计了革命发展和前进的基本构想，从而对于革命高潮到来之日能够作出科学的预测。这说明，毛泽东在1930年初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已经初步形成，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结出了硕果，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有力地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页。

第四节　游击战术的初步总结和军事辩证法的初步形成

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相适应，毛泽东及其战友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游击战争以弱胜强的基本思想，又在反“围剿”战争中创造了应用游击战术的光辉范例。

一　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毛泽东、朱德等对其战术经验的初步总结

在毛泽东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各地农村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开辟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仅1929年和1930年两年，由于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朱德等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又联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在川东、豫东南、皖西、广西、湖北洪湖地区、鄂豫皖边区、湘鄂西、赣东北等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约六万人，江西中央区的红军已有三万多人。红军的迅速发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说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正确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游击战争的战术也是正确的。

红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作战，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愈战愈强，是和它采用的正确的游击战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1928年总结湘赣边界割据的经验时指出，敌人数倍于我之兵力，不但不能破坏割据，而且也不能阻止割据的发展，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其中包括军队作战的战术也是正确的。作战中能够区分统

治势力在湖南和江西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守势和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对于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后来的失败，正是由于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当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反而采取了分兵冒进的政策。他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反复强调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① 后来，经过三年来的战斗，毛泽东对红军的游击战术又作了系统的总结。“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② 这一总结，不仅为游击战争的战术奠定了基础，而且也闪耀着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周恩来在1929年9月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根据实际经验作过重要的阐述，他在分兵和集中问题上，也批评了那种在红军中存在的分散红军，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的观念，他认为红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他对于游击战争的战术，主张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关于一般战术问题，如前委来信所提出之波浪式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101页。

推进，兜圈子以及十六字诀等办法，应就实际情况去运用，不能定为一个原则。”①

朱德也根据红军实际战斗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在1933年出版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第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他明确地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战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战术的原则应当根据任务、敌情、地形的变化而不同，这对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二，在作战中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集中最大兵力进行决战，避免不分主次，平分兵力的战术。第三，在一般情况下，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要争取战术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战略的目的。第四，在共同的战斗中每个兵团和部队要保持通信联络，协同动作，在情况变迁和联络中断的情况下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第五，侦察主要是弄清敌情，地形，侦察应当先行于下定决心之前，但侦察又不可迟疑徘徊，贻误时机。第六，在山地战中，以弱对强要注意秘密、迅速、各个击破，在决战时机、决战地点要集结优势兵力。朱德提出的上述六个基本原则。以第一条为纲，贯串于其他各条之中，而其他各条又都从作战的不同方向，阐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基本原理的运用。可以说，这一初步总结，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述，又是当时红军游击战争经验的哲学概括，标志着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的其他红军将领曾中生、徐向前等也都在游击战争中提出了一些极其深刻的战术思想，诸如，专击敌人弱点；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尽力发挥夜战效果；红军作战尽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35页。

量号召群众参加；集中力量，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人如有坚固工事，不与作战；等等。方志敏又进一步提出了富有辩证法思想的"五十三字的游击战术"，即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所有这些都充实和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成为以后形成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　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在反"围剿"战争中的应用

如前所说，在三十年代前期，在农村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起来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又进一步推动着战争的胜利，创造着战争的奇迹。而红军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四次反"围剿"战争则是创造性运用军事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根据"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取得了龙冈战役的胜利，毙伤俘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多件，并活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随后，红军乘胜追击，又在东部歼敌一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两千多件。至此，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江西重组南昌行营，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指挥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十六天内先后由西向东横扫七

百里，在东固、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多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红军仅以相当于敌十分之一的人数即三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以一个多月时间，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八百余支，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以少胜多，先后粉碎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敌军的“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南、闽西已经联成一片，包括二十一座县城，成为最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胜利，是切合中国特点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胜利。

最能说明红军战略战术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对当时革命战争重要意义的，莫过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这次战争对红军威胁之大，处境之艰难，都远远超过前三次反“围剿”战争。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不仅提出一条“左”倾的政治路线，而且提出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并且把毛泽东等排挤出红军的领导之外。但是，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仍然坚持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终于粉碎了这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

首先，红军在这次战争中抵制了当时中央要求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城市南丰的错误命令，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周恩来在1933年1月27日的作战电报中指出，“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在1月30日的电报中他又进一步历数了这种攻城的缺点，“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因此他“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而主张把“消灭敌人尤其主力”，作为“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在2月13日的电报中他提出“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①；总之，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始终把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主力的作战目标同强行围攻城市的作战目标对立起来，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并采取谨慎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

其次，红军在战斗中执行了迅速、秘密、坚决的作战原则，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树立了红军战术的范例。朱德在总结这次反“围剿”战争中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时指出，由于红军战术原则的正确，“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

①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59—69页。

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①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在中央错误领导的干扰下，终于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声威大振，迅速扩大到八万多人，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共产党员也发展到三十万人。土地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从红军战争中总结和概括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和军事辩证法思想，有多么巨大的威力，又产生出多么辉煌的硕果。

同四次反“围剿”战争形成鲜明对比，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等所坚持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第五次反“围剿”，在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要求分兵把守，“节节抗御”、“短促突击”，继而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遭到惨重的失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失败是违背了切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而受到的惩罚，也是蔑视军事辩证法所必然受到的惩罚。

---

①《朱德选集》第9页。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在开创民主革命新局面中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同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的、对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危害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它的形成和发展又必然同我国哲学战线上的斗争紧密相关；30年代我国哲学战线上开展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及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条件。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显著标志。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旦初步形成，就会自觉地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也将在斗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我国30年代初期初步形成的。1930年

5月，毛泽东在其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样一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雏形，因此，可以把这篇论文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产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指导规律的认识已前进了重要一步。

一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工作指导上面临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哲学。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必须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特别是要着重研究大革命失败后我国的复杂社会矛盾、以及我们党在工作指导上面临的主要任务。

与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不同，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以几亿农民为主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中进行的，中国的革命有其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发展规律。要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1919年，列宁在对东方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40页。

他指出，“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① 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乃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一项根本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即已开始。如前所述，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但开展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并胜利地进行了北伐战争，从而推动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而且在思想理论上也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建党初期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和这一时期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述中，对于诸如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民主革命中的统一战线，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都有过许多正确的论述。其中，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问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问题，以及农民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问题的分析，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当然，应该指出，从总体上说，由于我们党在当时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由于我们党在建党以前就缺乏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理

①《列宁选集》第4卷，105页。

论方面的准备，在建党以后又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之中，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中国革命最紧迫的斗争实践问题上，而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尚未进行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产生一个明晰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一历史课题。这是我们党处在幼年时期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缺陷，而这个缺陷正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①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言简意赅，从党自身的状况和从认识论的高度深刻地揭示和总结了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中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正表明我们党由于处在幼年时期，因而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当时我们党还缺乏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历史表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卓越的领导人，在当时都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提出和解决思想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路线问题，更没有自觉地向全党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只能在尔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形成和解决。

大革命失败后，近代中国固有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形势。

其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卑躬屈膝、实行投降卖国政策，遂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日益加深。比如，在经济上，大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对华投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22亿5770万美元，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增加到34亿8760万美元；他们的对华商品输出，在1927年中国入超为9431万海关两，到1931年增加到2亿2401万海关两。与此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起的民族工业，象棉纺、缫丝、面粉、火柴、水泥、烟草、五金等业，在大革命失败后都遭到直接打击。其中，中国民族工业中最重要的纺织工业，纱绽和布机在全国总数中逐年下降；1930年纺织工业部门的外资增加80%，五金工业部门的外资则增加90%。在政治上，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争夺，甚至象日本帝国主义那样，不惜采取公开的武装侵略等手段，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就更加激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争夺亦更加激烈了。

其二，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建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的反革命政权，但这一政权的本质是以新军阀统治代替旧军阀统治，代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并为各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各派新军阀间矛盾和斗争，依然十分尖

锐。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历史也确实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的怂恿和支持，中国的新军阀非但继续保持着以往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而且军阀间的战争此伏彼起，连年不断。军阀割据局面的存在和军阀战争的进行，一方面加深了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为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三，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实行对外妥协投降和对内残酷剥削压榨的祸国殃民政策，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阶级关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在政治上对内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军事专政，他们一方面不断强化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中统”、“军统”等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并建立和加强反革命地方武装保安团和保甲制度，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在经济上，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用攫取的政权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进行贪婪地掠夺和残酷剥削。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经营的许多经济部门濒于破产，农村经济破败不堪，致使大量自由职业者和青年学生失业、失学，农民流离失所，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就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起来，为深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48页。

入开展民主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同时也使得大革命刚刚失败后暂时依附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中间阶级有可能转向同情和支持革命，从而为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条件。

其四，在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摧残和削弱，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宁、汉合作，蒋、汪合流，对中华民族的精华——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施行最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这二、三年中，约有45万人被杀害，其中主要是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如彭湃、向警予、蔡和森、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恽代英、罗亦农、马骏、郭亮、夏明翰等，正是在这一期间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杀害的。这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革命力量的削弱，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被迫进入低潮时期，党在城市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也由城市逐步转向农村。当然，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使革命由低潮时期进入高潮时期，这里的关键在于作为革命领导者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

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上述种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大众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就必须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应该说，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肯定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则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在此基础上，六大提出了为彻底实现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目标和现阶段革命的政治纲领，并提出了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大革命失败后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许多紧迫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又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艰苦探索，从而促进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贡献。如前所述，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发展规律，从而提出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应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蓄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中国的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特别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实践中，还提出了关于加强党和红军建设的理论，关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等等，所有这些，都为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上述这一切情况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

历史任务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但是，应当指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从总体上说，当时我们党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中国革命的许多主要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比如党的六大，如同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对于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性等等，都缺乏正确的估量和分析，因而在当时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不可能提出和解决中国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争取中间阶级的策略重点问题。① 这些原则性的错误，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其二，毛泽东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政策和策略，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所接受，未能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初年代里，他就对中国革命面临的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入探索，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和策略。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理论、战略策略原则和红四军的斗争经验，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并兼管军事部工作的周恩来曾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1929年9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

①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页。

基础的产物。”①应该说，指示信的这个论点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理论的肯定。1930年1月15日，他在中央军委创办的军内刊物《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并亲自加了按语，对毛泽东、朱德建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这样，就使得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红四军的经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和发扬。但是，应该指出，毛泽东的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虽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但并未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随后不久，中央领导权就被犯“左”倾错误的人所把持，他们非但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思想理论，反而把这些意见和理论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和“狭隘经验论”，在全党范围内强制推行“左”倾错误路线。

其三，当时全党还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认识路线，还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大革命失败后连续犯了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大家知道，在我们党内曾经长期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其共同的思想特征是割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这两种错误倾向中，教条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以“左”的革命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在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王明的教条主义从1931—1934年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而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危害也最为严重，使党的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综上所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面临着新的复杂而严峻的局面，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根据新情况和新经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以推进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而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克服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二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同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在列宁指导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它是“由各国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一个世界共产党”。①中国共产党是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而成为它的一个支部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国际的党都必

①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64页。

须执行。此外，各国共产党还必须尊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的指导。这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国际代表的指导正确与否，就势必对各国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成败发生直接影响。

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总共存在了24年，周恩来把这24年分为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1927），中期（1928—1935）和后期（1936—1943）三个八年。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说它（指共产国际——引言注）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① 我们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这一期间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一期间，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发生过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我们党自身的状况和党的领导人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引起的，因而应当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负责。但是，中国革命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一期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的原则问题上有许多重大失误；而这些失误不仅直接导致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大革命的失败，而且也直接导致了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遂使中国革命蒙受惨重损失。正因如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问题时，从思想理论上研究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中深入探讨和总结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认识论根源，则是完全必要的。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帮助。它不仅在组织上和实践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

立，并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从而使第一次大革命在初期和中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且在思想理论上也帮助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初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基本上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和策略，这对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的指导上都存在着严重失误，这一点在1925—1927年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的决议、指示和文章、讲话中反映得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与分析上。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对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代表人物的革命性和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则估计过高。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弱小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国民党则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甚至是“工农党”或“人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和指导上的根本性错误，正是从这一错误的估量出发，才引发出在有关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革命武装问题、农民同盟军和土地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错误决策和指导。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既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十分弱小，而国民党又是唯一的重大革命力量，那么，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就应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革命军队就应该完全置于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而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只能依靠国民党自上而下地加以解决。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在国民党的领导下

进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只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帮助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并为将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准备条件。这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把支援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国民党身上，非但没有指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发展自己的独立力量，反而指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妥协退让的路线，从而使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处于无权被动局面，以致在国民党叛变革命时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应付力量。显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些失误是大革命后期产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在1927—1935年期间即共产国际的中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和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其根本的思想特征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照搬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机械地搬到中国，主观武断地提出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论”。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把中国革命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民族革命阶段；第二阶段即“四·一二”政变后的武汉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土地革命阶段；第三阶段即“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时期，是“苏维埃革命”即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阶段。十分明显，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论”，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这实际上是从俄国革命的经历和经验中照搬来的，所谓中国革命发展的“三阶段”，也正是俄国革命过程中所经历的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三个阶段的翻版。斯大林的这一主观主义

观点，必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后果。按照这一观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就开始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阶段，这就否定了我国民主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由此必然引发出我们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其二，把俄国革命中对待资产阶级和富农的经验照搬到中国，在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同盟军和斗争策略问题上犯有“左”的错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由于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特点，把我国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关系的某些变化定型化即凝固化，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加区分，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否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存在，因此，在有关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方面，必然会作出许多错误指示。比如，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共产国际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指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在对待中间营垒和第三派问题上，认为这些势力是反革命集团，“是工农革命运动的死对头”，指示中国党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他们；在农村斗争策略问题上，特别强调反对富农，指令我党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变为反对富农的政策，即使他们参加抗税运动和反军阀运动，也要加以坚决反对；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然无视中国中间阶级和各党派政治态度的变化，仍然坚持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等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些主张，是把俄国革命过程中对待资产阶级和富农的经验与作法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缩小了同盟军，扩大了打击面，从而导致“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其三，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革命象俄国革命一样，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中指出："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这是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搬用到中国，指示中国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全部革命工作，诸如加强农村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展农民运动和进行土地革命，壮大红军力量和发动游击战争，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动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加强军阀军队内部工作和瓦解国民党政权等，所有这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或配合组织城市武装起义服务。这种"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和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惨重损失。

其四，在组织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分强调集中制，实行家长制统治，否定各国党有独立自主处理本国问题的权利。共产国际是适应特殊的形势需要创建的，在它创立的最初一些年代里，采取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对于实现国际革命运动的统一可能是有利的。即使如此，当时指导共产国际的列宁也没有忽视党内的民主方面，他认为国际的某些决议"充满了俄国味道"，其结果可能是"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①。但是，在列宁逝世后，特别是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国际的集权主义倾向逐步加强，并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党带来严重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是共产国际为了贯彻其错误主张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教条宗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在国际的支持和保护下，使王明路线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8—389页。

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二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组织上实行惩办打击政策，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这种过火的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凡是对王明错误路线持异议或反对的，都要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党的大批优秀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和诬害，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党。

在1935—1943年即共产国际的后期，由于中国党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减少，也由于中国党和国际内部的许多情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党已经成熟，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国际的"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①等，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好的。但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还是有影响的，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抗战初期形成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把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拖住日本后腿、避免苏联在两线作战作为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把工作重点和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37年王明自称带着共产国际的路线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导方针。王明的新投降主义政策，在他领导下的长江局得到具体贯彻，使党丧失了在长江沿线大发展的有利时机。

不难看出，在我们党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对于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应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决不能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从总结历史经验看来，必须充分重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影响。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产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直接相关的。我们党作为幼年的党，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党内之所以出现和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原因正在于，当时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及其实际的核心领导人斯大林，存在着把苏联经验凝固化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贯彻和推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许多“左”的思想和政策。我们党内和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一方面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同时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认清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工作指导的严重危害性，认清了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一时期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显著标志。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主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

以实事求是为精髓或核心内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而逐步形成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和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文章中。其中，《反对本本主义》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3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就曾经坚持过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在他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从事实地的调查与研究，坚决反对任何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他在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农村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的结果；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正是以大量调查所得事实为依据去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驳斥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为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制定和确立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乃是摆在全党面前急待解决的尖锐课题。应该指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过程中，为寻求和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付出了巨大代价。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斗争实践中提高了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但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从而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而且还陆续建立了海陆丰、湘赣（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心实际上已开始由城市逐步转向农村。我们党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建的这些农村根据地，虽然先后大都经历了开创、发展和大部份丧失的曲折斗争过程，但是，千万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中却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各个根据地党和人民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提出的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科学理论，正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进程中已经取得了真正创造性的巨大成果。这一科学理论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找到了一条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而且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于中国国情和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基础。

以实事求是为精髓或核心内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形成是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坚持和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直接相关的。大家知道，调查研究工作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把调查研究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也就必然会引发出关于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亲自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社会调查工作，而且还大力倡导和组织红四军的干部作社会调查，使社会调查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以此作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的依据。对于红四军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和经验，当时的中央曾予以充分肯定。1929年9月周恩来根据陈毅报告代表中央主持起草的给红四军的信中特别提到："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

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① 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把对调查工作意义的认识和阐述提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即提到肃清唯心观念（后来一般称之为“主观主义”）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决议在分析当时党内和军内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时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② 这里，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关于党的工作指导上的思想路线问题。决议在论述纠正这种主观主义工作指导的方法问题时，着重强调了以下两条：

其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其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③ 这两条办法所强调的中心思想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前者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后者则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难看出，古田会议决议已经生动地体现和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当然，这里还应当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本身尚没有直接地和明确地提出和表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而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提出党的思想路线，则是在古田会议决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90页。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名《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江西寻乌写的。本文曾在红四军中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印成小册子，后因战事而失传。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一位农民将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献出；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作者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1960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这篇文章时这样说过：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才写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他还说过，他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而对这篇却是十分喜欢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犀利的笔锋、凝练的语言从多方面阐明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其一，《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地概括和表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特别是对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作了哲学上的分析和批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文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这是对党应该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概括和表述。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提出在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上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的初步的然而又是明确的概括和表述。

---

①《毛泽东著作选集》上卷，第55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卷，第51页。

毛泽东在论述和倡导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时，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工作指导作了哲学上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脱离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坐在房子里邀集一些人去冥思苦想，是无论如何想不出好办法、打不出好主意的；讨论问题和决定政策和策略，不去审察和研究实际情况，而是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或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神秘观念和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这种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保证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因而也就必须洗刷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唯心精神。

其二，《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认识论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和贯彻正确思想路线和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并初步提出和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和论断，并从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深刻论述，指明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正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指出，对于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问题能否获得解决，这首先不是一个什么才力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和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只要对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言简意赅地表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他形象地指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卷，第49页。

解决问题。”①他强调指出，为了纠正当时党内和军内严重存在着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以调查得来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来制定政策和指导工作。

同时，鉴于当时党内和军内存在着轻视调查研究的倾向和不懂得调查研究科学方法的情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短文中还专门论述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问题。当然，毛泽东在文中所论述的有关调查研究的某些具体方法和技术，在社会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和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看来，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则显得很不够了；但是，文中所阐发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至今仍然是继续适用的。

其三，《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还初步地提出并阐发了关于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思想。本文针对当时党内和军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以十分明确的语言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这样一个论断，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独立自主”这一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种生动表述和体现。与此同时，在这篇专门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中，还论述和阐发了关于群众路线的某些主要思想。本文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有“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③，只有向群众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才能形成正确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相反，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则一定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一定会把事情弄

---

①②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卷，第50、54、55页。

糟。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上述情况表明，在这篇文献中已经明确地提出并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已经提出了后来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应当指出，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提出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路线，在当时虽然尚未被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提出却清楚地表明，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到了哲学高度，我们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认识上的某些质的飞跃，对这一“结合”的自觉性已经大为提高。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开展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在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同新康德主义和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的激烈斗争。这场论战的结果，对于肃清当时中国思想理论战线流行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和实质

唯物辩证法论战始发于1930年前后，到1936年遂形成高

潮，并对尔后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唯物辩证法论战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和哲学领域的斗争，它和五四以来中国的其它思想文化运动和哲学斗争一样，是同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直接相关的，它是我国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形势和社会关系变化的哲学表现，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传播形势下两种哲学思潮斗争的必然结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取代旧军阀，攫取了全国政权，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于是，国共合作破裂，革命进入低潮时期；一些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脱离革命阵线，投入大资产阶级怀抱。大革命失败后我国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使得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重新活跃起来。

但是，应当指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非但没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削弱，反而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地发展着。这一方面是由于对于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亟待从哲学上加以反思和总结，以便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得一部分革命者提高了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以便教育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于是，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上，《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等中国学者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也纷纷问世；与此同时，李达、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北平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高等学校中直接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响。

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不仅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且在普通群众中、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成为不少学者公认的研究一切学问的基础，甚至一些不懂辩证法的人亦以谈论辩证法为时髦。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分子感到极大不安和恐惧。张东荪惊呼"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可以说是一个事实。"①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既是侵入了哲学领土，则哲学家便不能置之不理"，并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反对赤色哲学"的角色。

张东荪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重要代表。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挑起过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宣扬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因而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大革命失败后，他仍然坚持其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以哲学为主要阵地，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从1931年起，他陆续发表了《道德哲学》、《阶级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吗》、《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等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全面歪曲和攻击，特别是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而挑起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持续多年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张东荪是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发起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在论战中他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他以攻击唯物辩证法而名噪一时，被尊为"新唯心论领袖"。

张东荪攻击唯物辩证法的主旨，在于论证唯物辩证法并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此，他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对唯物辩证法加以歪曲、丑化和污蔑。他玩弄语源上的把戏，以古

---

①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35页，民友书局，1934年10月版。

希腊的辩证法原为辩论术、问答法、修辞学为论据，证明从康德、黑格尔至马克思，把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完全不符合原意的；他为了驳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首先集中攻击黑格尔辩证法，认为黑格尔的“正反合”没有什么新内容，黑格尔的“奥伏赫被”（扬弃）违反了形式逻辑的“排中律”；他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区别，认定马克思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重新倒置过来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出于“战略”需要，是为了用一种历史定命论公式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在张东荪看来，唯物辩证法并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马克思出于政治目的制造的牵强附会的东西，是一种宣传上的策略。

我国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潮中，既有象张东荪这样的一向与马克思主义公开为敌的唯心论者，也有象托派分子叶青那样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并以张东荪哲学批判者身份出现的另一种唯心论者。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叶青撰写了《科学与哲学》、《方法论问题》、《张东荪哲学批判》、《哲学到何处去》、《观念论不可吸收吗？》等论著。当然，应该承认，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叶青在一定程度上曾揭露了张东荪观念论哲学的错误，并给新唯物论作过一些辩护。但是，叶青并未由此走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他批判张东荪是为了宣传和推行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即“物心综合论”。叶青宣扬的“物心综合论”貌似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与唯物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唯心论，其目的是为托派的政治主张作哲学论证。

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叶青把哲学与科学对立起

来，以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为理由，提出“宗教——哲学——科学”的发展图式，鼓吹“哲学消灭论”，力图证明一切哲学（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离开宗教而独立之后，现在又被科学所代替和否定。在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主张把辩证唯物论与唯心主义观念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在认识方面，是存在决定思维；而在实践或行为方面，则是思维决定存在。于是，他提出了“思想者事实之母”、“理论就是实践，实践就是理论”等论点和“理论——实践——理论”的认识论公式。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他否定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改造，诬蔑唯物辩证法的创始者马克思只是把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公式简单地拿过来同唯物论相加，马克思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检证者。在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夸大外因的作用，宣扬“外烁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全由外力造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有功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张东荪、叶青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是在我国大革命失败后的特定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下发生的，它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需要，对于变化了社会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所作出的哲学反响。我国30年代发生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持续很长时间，涉及广泛的哲学内容，但其核心内容是围绕着唯物辩证法是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进行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继续，论战中各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观点都鲜明地反映了不同阶级和阶层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前景的政

治态度与阶级倾向。唯物辩证法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次尖锐较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深入传播和广泛应用的必然结果。

二　艾思奇、邓拓等人对张东荪、叶青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批判

张东荪、叶青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肆意诋毁和攻击，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击和批驳。以艾思奇、邓拓、胡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了大量论文，对张东荪、叶青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和批判，从而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鉴于张东荪、叶青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攻是多方面的，因此，艾思奇、邓拓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攻击所进行的批驳和反击，也必然会涉及广阔的哲学领域和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针对张东荪、叶青等人散布的所谓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马克思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继承者和检证者等错误观点，邓拓和艾思奇分别于1933年和1936年发表了《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等文章，对这些错误观点加以驳斥，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的伟大意义。他们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唯物辩证法正是在黑格尔之后、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法却又与黑格尔辩证法完全不同，马克思剥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装，将其颠倒过来，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转变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从而创立一个划时代的新哲学。他们还明确指出，张东荪等人混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并拼命攻击黑格尔辩证法，其真实的目的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伟大意义。

第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张东荪等人极力非难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质，否定它既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在他看来，辩证法所讲的“矛盾”，并不是事实上的或经验上的，而只是名学上即逻辑上的东西，与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无关。他拼命攻击唯物辩证法的真实的政治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辩证法的总原则若是立不住，则阶级斗争的实例亦必减其可靠性。”对于张东荪等人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这些错误论点，邓拓和艾思奇都撰文予以批驳。他们指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都是有规律地变化发展的，唯物辩证法正是宇宙一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辩证法有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之分，主观辩证法同客观辩证法是一致的，而名学上的矛盾也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只是客观事物中矛盾的反映。为了阐明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邓拓和艾思奇等人还就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作了具体论证。

第三，关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和伟大指导作用，张东荪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只有观察法、实验法、归纳法、测量法、统计法等等，而不是唯物辩证法；叶青则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即消解

于科学之中，哲学为科学所消灭。对于张东荪、叶青的这些观点，艾思奇、邓拓等人给予了有力驳斥，并正面地论述了哲学同具体科学的关系。他们指出，不能把哲学同具体科学、哲学方法同具体科学方法对立起来，不能认为哲学没有自已独立的研究领域。与“哲学消灭论”的观点相反，“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引者注）却不把哲学消散在各科学部门里，它使哲学仍然保持着独立的领域和对象，那对象就是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则，也就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的总法则（即辩证法）。自然，这总法则的研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须以各科学部门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它也可以反过来指导各科学部门的研究。”①显然，这些论述正确地指明了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的一般与个别关系，坚持了哲学与具体科学各自独立存在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第四，关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在内外因相互关系问题上，叶青玩弄折衷主义手法，诡称要把内因论和外因论结合起来，但是他拼命鼓吹的却是外因论，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变化“全面由外力造成”，中华民族的前途要“受外力的左右”，中国的历史发展“显然是外烁的”。对于叶青鼓吹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的所谓“外烁论”，艾思奇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于内因论与外因论》等文章中，结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艾思奇指出，叶青宣扬的“外烁论”其理论错误在于夸大了外力的作用。诚然，外因是不可忽视的，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上外力有很大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外因不能决定事物的

①艾思奇：《几个哲学问题》，《读书生活》第2卷，第12期，1935年10月25日。

必然性，决定必然性的是内因。他明确提出，“在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里，辩证法要强调内因的第一义的决定作用。所谓内部作用的原因，才算作必然的原因”①，“内因是基础，是本质，是发展的必然性的决定的原因”，也就是说，“辩证法是把内因看做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②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完全是按照中国自己的规律不断前进的。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应以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矛盾作基础，研究种种外力怎样通过这些矛盾而发生影响，研究中国在这些外力的影响和刺激下怎样发生和解决自己的矛盾和运动。叶青等人打着维护辩证法的旗号却极力鼓吹“外烁论”，这“不外是和敌人、汉奸的反共嘈声相呼应”。艾思奇的这些分析和批判，对于澄清叶青等人在内外因关系问题上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和揭露叶青的假马克思主义伪善面目，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涉及到认识论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在论战过程中，叶青提出了许多错误论调，比如他认为辩证唯物论是“物质论与观念论底统一”，提出“思想者事实之母”、“实践来于理论”、“认识就是实践，实践就是认识”等论点，以及“精神——物质——精神”、“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等等。为了回答和批驳叶青的这些错误论调，艾思奇在论战期间撰写了《认识上的问题》、《思想方法论》、《哲学讲话》等论著，着重从正面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和观点。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

①艾思奇：《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读书生活》第4卷，第2期，1936年5月25日。

②艾思奇：《关于内因论与外因论》，《读书生活》第4卷，第4期，1936年6月25日。

题上，他既强调思想是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人类的行为都必须依循着事物的必然法则，同时也强调主观对客观有着能动的改造作用；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他一方面反对夸大理论的作用，反对把理论当作万能的图式随意套用，阐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忽视理论重要指导作用的错误，他把理论比作地图，指出有了理论才能指示前进的路程，才不至于为了眼前的阻碍而失去前进的信心。

30年代前期和中期在中国哲学战线上进行的围绕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展开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传播和广泛运用的背景下两种对立的社会意识和哲学思潮直接冲突的表现。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所进行的种种歪曲、诋毁和攻击，起着混淆视听的作用，严重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正因如此，艾思奇、邓拓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叶青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作的驳斥和批判，对于廓清张东荪、叶青等人所制造的理论混乱，对于提高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理论水平，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广泛运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也应该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叶青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观点所作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观点所作的阐发和论证，不论就其理论的深度、广度和表述的准确性而言，抑或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紧密程度而言，都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认真吸收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积极成果、并对这场论战作出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的，正是毛泽东及其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

论》。

三　唯物辩证法论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过程中，就在他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经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形成与发展就不能不同中国哲学战线上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斗争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并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日益紧密结合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进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

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开始形成自己的哲学的重要历史时期展开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发生的，都是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艾思奇等人在批判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和毛泽东同党内主观主义斗争中所使用的理论武器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唯物辩证法论战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或前后相继的关系是必然的。就唯物辩证法论战而言，它对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唯物辩证法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从而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它的产生和形成只有当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深入传播和发展、并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可能。而三十年代在中国哲学战线上发生的持续多年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正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这种必要的思想条件。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深入传播和发展的形势下发生的，而唯物辩证法论战本身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来看，从新文化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介绍和提倡，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现于中国的思想界，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三次论争”而兴起，再到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以及关于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和拓宽的过程。由于政治形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从五四时期到建党初期的一个很长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者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唯物史观方面，以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根据，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尚缺乏充分认识和完整掌握，对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内容亦未及给予全面的和系统的阐发。这一情况，在经历唯物辩证法论战之后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论战中，以艾思奇为

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张东荪、叶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原理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而这些论述不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抑或就其表述的通俗程度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等人对张东荪、叶青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是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从总体上说，这场论战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革命有无指导作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的，这显然是同当时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紧密结合着的。而就论战的具体内容来说，虽然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以及论战内容本身的制约，使得艾思奇等人对张东荪、叶青的批判具有纯理论论争的某些特征；但是，艾思奇等人对张东荪、叶青的这些批判，在不少重要问题上也还是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的。比如在批判叶青鼓吹的“外烁论”谬论时，艾思奇既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又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要以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矛盾作基础，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完全是按照中国自己的规律前进的。

唯物辩证法论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通过这场论战不但大大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入传播，而且也使得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其次，从理论内容上说，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作了

必要的理论准备，而《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则为唯物辩证法论战提供了科学结论。

应当指出，在唯物辩证法论战期间，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战，在毛泽东的“两论”中也没有直接批判张东荪、叶青等人错误观点的论述，当时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解决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上。但是，不能由此作出否定唯物辩证法论战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的结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它是一部深入批判张东荪、叶青的错误观点、并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著，毛泽东称这部书是艾思奇“著作中更深刻的书”。① 此书出版后，毛泽东迅即阅读，以后又认真读过数遍，并作了几千字的摘录，还于同年10月专门邀请艾思奇在延安讨论此书。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延安写作“两论”前后，不但通过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以及国内其他一些著作，了解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观点，而且对论战中所涉及到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已作了深入思考和研究。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从“两论”的具体理论内容来看，“两论”同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在“两论”中，毛泽东对论战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矛盾论》原稿中有“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一节，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作者删去），内因与外因，差异与矛盾，理论与实践

①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4页。

等等问题，都作了正面的论述和回答。从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写作“两论”时不但认真吸收了艾思奇等人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所发表的正确观点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且在论述的深度、准确性和系统性上又大大超过了艾思奇等人在论战时期所达到的水平。比如，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时，他不但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一伟大理论，从而在人类认识史上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而且还进一步从人类认识史角度把辩证法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古代中国和欧洲的朴素辩证法、18世纪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又如，在论述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他不仅系统地和全面地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和能动性，而且还深入具体地分析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规律和公式。再如，在论述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时，他不仅吸收了艾思奇在论战中提出的关于内因第一义、外因第二义的正确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论断，从而使内外因关系的表述和概括更加鲜明、深刻和准确。凡此种种，不拟赘举。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撰写的“两论”既是对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批判和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错误思潮的回答和对论战积极思想成果的升华。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两论”为论战提供了科学的结论。

我国30年代哲学战线上开展的持续多年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唯物辩证法论战以其广阔的内容和积极的成果，

为以“两论”为标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形成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条件；而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所取得的胜利，又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广泛应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开创我国民主革命新局面中的历史作用

30年代初期，正当毛泽东刚刚提出并阐发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革命“围剿”，而党内也连续出现李立三、王明这两次教条主义错误，遂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以《反对本本主义》为标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一经初步形成，它就必然在清算教条主义、确定和完善党的各项具体的路线、方法和策略方面，在开创我国民主革命新局面的斗争中，发挥其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　深入开展农村调查，制定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中国的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遭受资本列强侵略和奴役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实行土地革命理应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和实行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应该说，我们党领导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通过全党集体奋斗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的，其中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制定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起了重要的作

用。

我国的土地革命是在特殊的国度里和极其艰难和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因此，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需要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及时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确认“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而为制定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此之后不久，即在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领导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存在“左”的认识和采取了若干“左”的政策。比如，在对中国的土地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上，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剥削不加区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在对阶级关系的看法上，认为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都是反革命的，因而都应予以打击；在对土地改革任务的认识上，把废除封建土地关系误认为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等等。这些“左”的错误，曾经给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在纠正上述“左”的错误和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与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六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的意义，指出中国经济和土地关系的明显特点是半封建制度，因此，推翻地主的封建剥削和统治，使农民获得土地，是现时革命的主要内容和斗争目标；六大还提出和规定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指出在土地革命中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不放弃对富农

的斗争，但为了解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能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此外，还应保护工商业。应该说，六大对土地革命的这些认识和政策是正确的，因而促进了我国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当然，党的六大对我国土地革命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加以很好解决。比如，六大对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提法比较含混，把当时封建制度下的土地买卖说成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富农的土地没有具体政策。

对于六大提出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共产国际是持反对态度的。1929年6月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提出在农村应反对一切剥削压迫，认为六大提出的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提法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富农路线”。此后，在1930年6月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土地革命的决议中，多次明确指示中国党在土地革命中要坚决镇压富农高利贷分子，实行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这样，就为李立三和王明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推行“左”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依据。

应该指出，我们党在制定和形成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土地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本身就包含着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这样三个相互联结的内容，其中土地革命则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本社会内容。因此，毛泽东在提出和解决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问题时，必然会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提出指导土地革命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在土地革命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提出、形成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毛泽东所提出和坚持的关于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也必然会发挥重大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时期（1927·10—1928年底）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的土地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井冈山时期土地革命的经验，集中地反映在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讨论通过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同年11月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这两个文件中。《井冈山土地法》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尽管这一土地法尚存在着某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如毛泽东1941年在《农村调查》按语中指出的那样，该土地法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以劳动力为单位分田而不是按人口分田，和禁止土地买卖等；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一方面同缺乏土地革命经验有关，另一方面又同当时中央的政策直接相关，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后来的斗争实践中都逐步得到纠正和克服。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深入发动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从红四军进入赣南、闽西到撤出中央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一期间毛泽东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比如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同年10月的兴国调查和11月的水口村调查，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毛泽东的这些调查，对于深入了解农村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经济与政治情况，从而对于制定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对于促进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在1941年回忆他所进行过的农村调查时说，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进行了六、七年农村调查，感到获益很大。寻乌调查使他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对待富农的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和修改，以便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活下去；①而兴国调查则使他弄清了贫农与雇农

的问题，才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样，毛泽东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他领导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也吸取了党中央土改政策中的正确部分，从而制定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基本政策。毛泽东提出和制定的这条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土地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伟大成果，同时也是党和人民的集体创造。

毛泽东提出和制定的这一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曾遭到王明一伙"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和否定。他们攻击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非阶级路线"，污蔑"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办法和"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这样的正确原则是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他们鼓吹和实行的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等这样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从而给土地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虽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这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土地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其一，在中央根据地内，由于这一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热情，从而保证了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其二，正是由于这一正确路线深入人心和一批革命同志的坚持，才使得1933年开展的查田运动取得很大成绩，才使得"左"倾盲动主义得

①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和克服；其三，毛泽东提出和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经过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它不仅对土地革命时期、而且对我们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胜利地领导农村的反封建主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　总结反“围剿”的历史经验，从军事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消灭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从而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实践中，红军的作战已由游击战向着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诸如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党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惨重失败，使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于是，全国红军主力不得不先后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同以往的“左”倾错误相比较，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具有更加完备的形态，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表现得十分充分；因而在全党的流毒和影响也极深，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极大。单就军事斗争而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不是打运动战，而是打堡垒战、阵地战。这种拼消耗的阵地战，对于当时兵力少、装备差、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其二，不是诱敌深

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分兵把口”、“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就使红军主力分散，处处薄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对敌人的防御和进攻；其三，在处理福建事变问题上，不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支持福建人民政府，而是实行“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这样，就丧失了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的有利时机；其四，在战略转变时，不是采取有计划的战略行动，而是实行仓促逃跑。这样，就使红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困难局面。王明在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上所犯的这些“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受到系统批判。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长征和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有其思想理论根源的，是由其错误的思想路线决定的。为了认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影响，从而保证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12月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以此为题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坚持和运用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总结和对几次“左”倾错误的批判提到了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这些认识是：

其一，关键的问题是主观指导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指导战争同进行任何工作一样，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力求做到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有的胜利了，有的则失

败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战争的指导者是否遵循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能否做到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符合。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 而所谓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符合，具体到战争来说，“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② 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相反，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者指导战争根本不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和想象出发，因此，他们的工作指导必然会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其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要着眼于事物的特点和发展。为了实现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的符合，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用开篇第一章的显著位置和整章篇幅着重提出和论述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他指出，为了争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指导者对战争的一般规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战争这个事物尽管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却具有反映战争共同本质的一般规律，它指明了战争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给人们从事战争的实践活动提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2页。

了可指导性、可预见性。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①，“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②但是，毛泽东又同时强调，对于战争的指导者说来，研究战争的特殊性尤其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战争不但区别于一般战争，而且也区别于一般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③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述战争问题上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时，提出了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应当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④的科学论断，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定内容作了深入的具体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阶级力量对比等条件的不同，因此具有与其它国家的革命战争相区别的四个主要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1927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由于第一和第四个特点的存在，即有了经过革命锻炼的共产党和民众的支持，就造成了红军发展的有利客观条件，就基本规定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胜利的前景；也由于第二和第三个特点的存在，就规定了战争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必须持久作战，而且如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165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157页。

果弄得不好可能会出现失败的局面。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概括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带根本性质的规律。他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些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与此相反，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者则不了解战争问题上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不去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过程中反"围剿"战争的特殊规律，把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混同于一般战争，机械地搬用一般战争中进攻和防御的经验，或者教条主义地推行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同敌人打阵地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招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其三，认识是一个过程，人们应当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增长才干。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深刻地论述和发挥了列宁提出的关于主观和客观的符合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他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有计划建立之前的认识情况过程和计划建立以后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这两个过程也就是后来《实践论》中所归纳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两个认识阶段或两个飞跃。在第一阶段，人们运用可能的和必要的手段进行调查或侦察，然后将所得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连贯起来的思索，然后形成判断、决心和计划；在第二阶段，则将已经形成的判断、决心和计划等理性认识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其是否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如果符合就继续进行，如果不相符合，就修改原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定计划。因此，那种孤立的、静止的和表面的研究战争的形而上学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过程问题时，还深刻地阐明了认识的相对性和近似性问题。他指出，由于战争双方是成群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守秘密的缘故，所以指挥员的认识只能作到大体符合情况，即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符合情况，那就为胜利奠定了基础，至于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①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们所达到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真理，脱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企求什么完全的绝对真理或把真理绝对化，是认识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的过程及其真理性问题时，强调人的认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斗争实践中增长才干。他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是离不开学习的。但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呢？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②“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③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无疑是重要的，但尤其重要的是，应当把前人的理论、经验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用自己的实践来检验、丰富、补充、修正原先已有的理论、经验。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切中了王明教条主义者的要害，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没有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战争的亲身经验，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只是照搬书本条条和第三国际指示，凭主观臆想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因而必

①《毛泽东选集》第163页。

②③同上，第165页。

然到处碰壁。

其四，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同时，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尊重客观条件与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认识和处理这两者关系上，应当防止两个极端：一是忽视或否认客观条件，无限夸大主观指导的能力和作用，这在战争问题上就往往表现为轻敌蛮干的军事冒险主义；二是夸大客观物质条件的作用，无视人的自觉能动性，这在战争问题上往往表现为畏敌、怯敌的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情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都有明显的表现。而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尊重客观的物质条件与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辩证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又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虽然是一篇专门论述军事问题的著作，但它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展开；他在军事领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域中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他全面清算和批判王明教条主义的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已经提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而为尔后《实践论》的产生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三　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复杂矛盾的变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30年代初期和中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间经过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和1933年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到1935年"华北事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加紧独占和灭亡中国的武装侵略，引起了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遂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蒋介石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于是，激起了全国人民、其中包括国民党内部爱国官兵的反蒋抗日的广泛而英勇的斗争。1932年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1933年以抗日同盟军成立为标志的抗日复兴运动的兴起和福建事变的发生，以及1935年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爆发，等等，正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为适应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为推动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必须作相应的转变，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论从全党的认识来说还是从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说，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不但要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作坚决斗争，而且还必须同党内长期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顽强斗争。应当指出，“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带有全党性质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这一思潮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国际和国内的、社会的历史的深刻根源和复杂背景，它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长官意志，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残酷屠杀，同中间阶级叛变革命，反复无常，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当着国民党反动派仍在继续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实行严酷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要化敌为友，要把昨日的背叛者认作同盟者，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主要敌人，这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对“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逐步产生了新的正确的认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由单纯的下层统战发展到上层统战，由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应当指出，30年代中期我们党确立和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同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密切相关的。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的七大纠正了自身长期以来的关门主义错误，转而执行统一战线新策略。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影响下，1935年8月1日以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已基本形成；1935年12月下旬我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完成。而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则是对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转变的理论概括和说明。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我国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一，他指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②，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这就势必会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就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形势来规定自己的任务；我们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依据也正在这里。

其二，他着重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②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软弱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所以他们的显著政治特点是始终在革命和妥协这二者中间摇摆。在斗争的一定阶段上，“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③在国家面临深重危机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又表现出了抗日救亡的要求，并有了一定的实际行动，因此，同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用大量的历史事实阐明了“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指出，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并不

---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8、13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是统一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分析和变化的。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既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代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一定会分化出一部分人来，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成为我们的朋友。"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动；进攻江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军在宁都的起义；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同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同盟；冯玉祥在察哈尔同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等等，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四，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被许多帝国主义共同争夺的半殖民地国家，由此所决定，在中国的地主买办阶级内部也就分裂为不同的派系和集团。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从而威胁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时，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根据其主子的旨意，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生暗斗以至明争。这样，就有可能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作了科学的阐发。毛泽东根据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与任务。他指出，过去的革命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现在"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①，原来的工农共和国应改为人民共和国，它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

期内的基本任务，既不反对资本主义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②。毛泽东还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强调阐明了关于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他指出，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为了防止地主买办阶级继续在统一战线内部搞“纵横捭阖”的分化破坏活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坚持“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方针。为此，就必须不断加强党和红军的力量，使之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成为坚强的台柱子”③。毛泽东还论述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国际援助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应当坚持自立更生的革命精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④；但是，也同时必须尽力争取国际援助。这是因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⑤，因而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⑥。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对党内在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上长期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作了哲学上的分析和批判，把政治路线和策略上的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解决。他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⑦，而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就必须从事实出发，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从当时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2、143页。

④⑤⑥同上，第147、148页。

⑦同上，第138—139页。

形势的具体特点出发。在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加紧侵略、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革命的形势存在着两种特点或两种事实：一方面，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持久作战。“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①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观察问题、制定路线和策略却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现象和书本出发，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②他们闭眼不见我国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兴起和敌人阵线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变动，认为地主资产阶级营垒始终是统一和不变的，民族资产阶级会永远反对革命；他们否认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上存在的敌强我弱特点，否认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和长期性，否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只想单枪匹马地在小圈子里打转，幻想革命营垒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这是一种呆板的、凝固的和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是一种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③

毛泽东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它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140、141页。

础和策略基础，是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在毛泽东哲学发展史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是继《反对本本主义》之后的又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它既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次深刻阐发，又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一个极其重要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运用、体现和展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产生，不仅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也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成为党中央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本文所阐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策略思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蓬勃发展，亦为我们党胜利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可靠保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毛泽东哲学思想史　第１卷
作者＝
页数＝３４９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是一门科学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基本内容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任务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初步形成
二、在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三、在中国革命高潮中多方面应用和展开
四、在胜利形势下的曲折发展
五、在历史的暂时倒退中经受严峻考验
六、历史转折后的新发展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特点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的历史
三、集体智慧结晶的历史
四、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历史
第四节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的方法论
一、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思想体系，不拘泥于个别词句
二、紧密结合革命实践和党的活动，不面面俱到地作学理推
究
三、重点研究特色和贡献的形成过程，不简单复述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一般原理
四、重点研究集体智慧和发展规律，不纠缠于历史细节和个
人活动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第一节　中国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斗争
二、资产阶级“新学”及其局限性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意义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四、“三次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扩大
第三节　我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产生
一、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
二、由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转变
三、在斗争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第二章　毛泽东早期世界观的转变

第一节　　毛泽东早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一、《讲堂录》中的唯心主义基本倾向及唯物论辩证法因素
二、给黎锦熙等人的信及文章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对某些问题的合理思考
第二节　　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二元论思想
一、“精神不灭，物质不灭”
二、知、信、行“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三、“生死是对立统一，是有机界的必然现象”
四、“观念造成文明”
第三节　　毛泽东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的世界观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成立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的积极实践
四、新民学会政治方向的转变和对唯物史观的肯定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党和大革命中的初步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党创立初期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及其特点
二、李大钊、陈独秀的《史学要论》、《马克思学说》等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介绍
三、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较系统的阐述
四、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述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
一、陈独秀、瞿秋白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双方的唯心论观点的批判
二、瞿秋白、恽代英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三、恽代英、肖楚女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初步结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一、党的二大《宣言》对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纲领的科学分析
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
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发表
第四章　　大革命失败后对形势和革命道路的分析
第一节　　对革命形势、性质和特点的哲学分析
一、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革命重点转向农村的必然性
三、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特点的分析
第二节　　毛泽东等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对托陈取消主义的批判
一、托陈取消派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
二、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系统批判

三、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四、托陈取消派观点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受到的批判
第三节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红色政权理论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一、土地革命战争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二、中国红色政权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贡献
三、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及其伟大意义
第四节　游击战术的初步总结和军事辩证法的初步形成
一、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毛泽东、朱德等对其战术经验的初步总结
二、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在反“围剿”战争中的应用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在开创民主革命新局面中的历史作用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工作指导上面临的主要任务
二、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主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问题的论战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一、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和实质
二、艾思奇、邓拓等人对张东荪、叶青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批判
三、唯物辩证法论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开创我国民主革命新局面中的历史作用
一、深入开展农村调查，制定和完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二、总结反“围剿”的历史经验，从军事上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三、分析和把握国内外复杂矛盾的变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